

批判右派分子
林希翎等论文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批判右派分子
林希翎等論文集

本社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門13號老君殿11號)

北京青年出版社登記證京市出字第001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787×1092 1.32 5 1/2 印張 117,000字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5,000 定價(5)0.38元

统一书号：7009·08

定价三角八分

批判右派分子
林希翎等論文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 北京

1000

1000

編者的話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每一个青年都要积极投入战斗，在战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现在斗争刚刚开始，斗争还要更广泛、更深入地展开。总结一下初战的成績和經驗，將有助于今后的战斗。本着这种想法，我們編輯、出版了这两本反右派斗争的論文集。

这两本論文集主要是給青年同志們（首先是高等学校的青年）看的，因此所收集的主要是批判高等学校青年中右派分子的文章。第一集中所收集的全是北京大学批判右派分子譚天榮等的文章；第二集中所收集的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的文章。

文章有的选自各学校的校刊，有的是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的发言記錄。这些文章不是坐在書齋里从容写出来的，而是在緊張的战斗中产生的，在說理、結構和文字等方面都沒有經過反复推敲，难免留下粗糙的痕迹，甚至有缺点和錯誤。但是，它們經過了战斗的考驗，击败了敌人；它們是“真枪真刀”，具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战斗性。

文集所涉及的都是帶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問題，例如：党的領導問題，人民民主專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問題，民主和集中問題，自由和紀律問題，等等。在这些問題上，很多青年的認識是模糊的、动摇的，有些人甚至对右派分子的观点引起了

共鳴。在廣大青年中，就這些問題展開辯論，進行學習，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此這兩本文集不僅富有戰鬥性，而且還有長遠的生命力。

我們還要向讀者說明這兩本文集在編輯體例上的一個特點：我們將有關右派分子的主要言論，附在批判文章的後面。我們認為這樣做，一方面便于讀者對照右派分子的論點和手法，去閱讀正面的批判文章；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便于大家進一步對右派言論進行批判。我們決不希望這兩本文集成為教科書或問題解答；只是希望它們能夠启发大家自己去思索，能夠推動大家親身參加這場辯論和批判。

現在，我們將這兩本書鄭重地推薦給讀者，並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意見或建議告訴我們！

最後，我們謹向幫助我們編輯這兩本文集的諸位同志，致以謝意！

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1957, 8, 20.

目 次

林希翎販賣的是什麼？……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 孫洪通	7
駁斥林希翎……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 若 素	19
批判林希翎的兩個根本性論點 ……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 張培森	24
斥“肅反擴大化”和“沒有法制”的說法 ……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 張燕征	32
林希翎論戰手法的批判……	中國人民大學講師 許征帆	38
附錄：		
林希翎在中國人民大學5月30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49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5月23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51
林希翎在中國人民大學6月13日的辯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54
	* * *	
反共就是反革命——駁斥“豈不令人深思” ……	北京師範大學學習社	56
附錄：		
豈不令人深思……	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 呵欠伯等	67
	* * *	
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破壞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的謬論 ……	吳文學院研究生畢業班集體創作	69
論個性解放——駁右派言論 ……	外交學院1957年本科畢業生集體創作	78
論獨立思考……	外交學院1957年本科畢業生集體創作	97

附录:

外交学院右派学生沈以光的反动言论(摘要)..... 111

外交学院右派学生冯圣葆的谬论(摘要)..... 112

* * *

党能领导科学.....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霍虹 113

高等学校必须由党来领导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张德华 孟怀仁 李黎明 117

驳薛克昌“马列主义过时了”的谬论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蔣有绎 122

驳薛克昌“中国没有自由”的谬论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甘天箴 128

附录:

农业大学右派学生薛克昌的右派言论(摘要)..... 134

* * *

透视马云凤的“杰作”.....北京航空学院 剑芒 136

绝不容许任何人攻击和破坏我们的选举制度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李湘麟 141

马云凤对人事档案的看法实质是挑拨党群关系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刘金锁 147

附录:

组织手段过时了(摘要).....北京航空学院学生 马云凤 151

* * *

驳S.C.....清华大学教师 清林 吕谦 藩生 154

附录:

为历史辩护.....清华大学助教S.C 170

再为历史辩护(摘要).....清华大学助教S.C 171

林希翎販賣的是什麼？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 孫映通

一

“為了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為了過真正人的生活而鬥爭！”就在這個虛偽的挑撥性的口號下，右派分子林希翎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起了瘋狂的進攻。林希翎所選擇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我們的上層建築，是我們的政治制度。她認為，“三害”的根源，在於上層建築和公有制根本不相容，如唯心主義、形而上學觀點和與此相適應的具體制度，“龐大的官僚機構”等。那麼，她對我們的上層建築是怎樣分析的呢？

關於黨和國家機關：她認為黨存在着危機。老黨員蛻化了，新黨員是投機。她把黨員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投機的“混蛋”，要清洗出去；第二類是“老實”而不起作用的，要動員他們退黨；只保留第三類，即所謂“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可見，她是要求從根本上調整我們黨的成份。她主張入黨要經過百分之七十的群眾通過，群眾也可以“罷免”黨員。可見，她是要求修改我們黨的一項基本的組織原則。對於黨所領導的人民政權，她認為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制度不合理，共產黨對於人民是統治階級，有統治階級的局限性。她公然宣稱我國“根本沒有法制，法律不過是形式主義”。她把我們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都描述成為一團漆黑、暗無天日，她認為“閉、婦

联、人代大会、工会这些紐帶都是形式”。

关于制度：她对于我們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制度，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她用具体制度（所謂“等級制度”、人事制度、保密制度以及党內的汇报制度等）方面的缺点，来說明我国根本制度的不合理。她說：“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談一些具体的制度”，“这些小的制度組織（成）了总的制度”，“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可怕的不是現象本身，而是这些現象的慫恿者和产生这些現象的条件……”。

关于政策：她对于党和政府的在政法、經濟、文教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政策，也提出了根本性的不同意見，例如：“肃反扩大化”、“新聞不自由”、“工資政策不合理”、“定息應該立即取消”等等。

可見，她的論点所涉及的問題，乃是我国无产阶级專政的整个体系問題。从她的发言里，人們对于这个体系，只能得到一个所謂“官僚化机构”的概念。她所認為不合理的，乃是我們党的成分、組織原則、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和若干重要政策。她声言不要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要根本变革，也就是要求变革我們党和国家的这些最基本的方面。請問，如果这不是对我国无产阶级專政体系的全盤否定，又是什么呢？

从上述的荒謬論証中，林希翎在我們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論点，即我国的上层建筑和經濟基础已不相适应、严重脫节，需要根本变革。

應該承認，馬克思主义确实有这样一個原理。讓我来讀段書給大家听听吧：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生产关系基本上不能再同它相适应；經濟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的上层建筑基本上不

能再同它相适应。在这样的時候，就必然要引起根本性質的变革。……这一規律，以不同的形态适用于一切社会。这就是說，也适用于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一原理正是在“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中所清楚地闡述了的。可見，这并不是林希翎的創見。問題在于，我国目前的具体情况与这一原理所指出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同。林希翎不加区别地把它搬用来混淆人們的視听，是有其惡毒的用心的。

“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紧接着指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輕的，它所走过的時間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經濟迅速发展的事实証明，苏联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經濟基础的需要的。”至于我国的上层建筑，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算起也还不到八年。八年，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短暫的时期，是不是經過这八年我国的上层建筑已經过时了呢？

林希翎肯定說，我国公有制的經濟基础是好的，但是上层建筑有毛病，需要根本变革。她以公有制基础“捍卫者”的面目出現，来攻击上层建筑。林希翎說“三害”是我国目前上层建筑的产物，上层建筑是不合理的，要加以根本变革，即所謂“要在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而我們則認為，在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上，确实存在着缺陷，但是只需要及时地加以調整，而不需要根本变革。目前国务院提出进一步开展增产節約运动，正是这种調整的具体措施之一。因此，我們的爭論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們的房子里积了一些灰塵，我們認為灰塵形成的原因很多，有从屋上落下来

的、也有从外面吹进来的，等等。我們主張徹底打扫干淨；如果不經常去打扫，过一个时候必然又积有灰塵。而林希翎却認為，灰塵都是从屋上落下来的，这房子已完全腐朽了，打扫只是一种“改良”，无济于事，必須采取“彻底的革命措施”，把整个房子拆掉，只留一块地皮，一块基础。

既然上层建筑是如林希翎所說的这样不合理，那么我們不禁要問：我国公有制的經濟基础是怎样建立的呢？当然，这不是国民党留給我們的，而正是由中国共产党領導人民政权，依靠广大干部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的結果。缺乏这三个基本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公有制的經濟基础都是不可能建立的。

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础逐步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上层建筑在八年之間很快地变質，如林希翎所說的党和国家机关变成了一套統治人民、沒有民主的官僚化机构，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公有制的基础又如何能够繼續維持得下去呢？如果事情是象林希翎所描述的那樣，那么只能产生两个結果：

第一个結果：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严重阻碍基础的发展，甚至使基础趋于崩潰。然而，事实却是完全相反。八年来，我国发生了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划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公有制的基础是扩大了而不是縮小了，是发展了而不是停滯了，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生产力在飞速地发展着，拿鋼产量來說，国民党統治中国 20 多年，年产量不过几万吨，而在我国人民政权建立的七年間，就达到了 450 万吨。

第二个結果：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上层建筑，推翻所謂“官僚化机构”，重新建立新的上层建筑以适应于公有制的基础。

然而，在这方面，既沒有任何事实，也沒有这种事实將要出現的征象，甚至连这样提出問題的本身，都是十分荒誕可笑的。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这历史的大变革中，尽管对新的生活方式还不完全习惯，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还有种种意見，然而，从根本上說来，他們对于我們党和政府始終給予了最热忱、最衷心的拥护。別要夢想他們会起来推翻代表自己利益的党，恰恰相反，如果誰胆敢起来向共产党的領導权挑战的話，他們將在工农劳动群众的鉄拳下被击得粉碎！事实已經証明并将繼續雄辯地証明这一点。

根据林希翎的論点，我們便无法理解我国的公有制基础是怎样建立起来、怎样維持下去和怎样不断巩固的。

那么，对于我国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即党和国家机关，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地估价呢？在这方面，不能不同意195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論中所說的話：

“我們的党和国家机关，不同于任何剝削階級的党和国家机关。它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沒有任何一点私利。我們的党和国家机器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性，保証我們不会同人民群众有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矛盾。”

二

“我們要求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的民主”。我不懂得她所說的“真正的民主”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她明白地表示反对現行的选举制度，認為事先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單进行酝酿是不民主，是“形式主义”，是“劳民伤財”。根据林希翎的观点，也許最民主的方法是：不要先提出什么候选人，发給每人一張选票，高兴选誰就选誰。你瞧，这該多民主呀！同

志們，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研究一下无政府主义的觀點，便可以知道這實在並不是林希翎的什麼創造！林希翎談到：蘇聯沒有真正的民主，中國也沒有真正的民主。那麼，在這個世界上，真正的民主國家究竟在哪兒呢？現時代基本上只有兩種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林希翎的民主是屬於哪一種呢？還是听听她的回答吧！她說：“資產階級國家的部長可以辭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好的。”“幹部經常換一下也好，資產階級的兩黨制可以競爭一下，在我們的國家里，當然這不需要，但能夠多提意見是好的。”仔細玩味一下，便不難領會她對資產階級民主是心嚮往之了。同志們，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來我國訪問後，都贊成“有領導的民主”，不要西方民主；而林希翎却要我們放棄社會主義民主，接受她的關於民主的“新見解”。而接受了她這種“新見解”，結果只有引導到西方民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西方民主，這才會使上層建築和基礎嚴重脫節！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林希翎肯定地說，她沒有享受到什麼民主權利，她沒有感到自己是主人。她還向大家高聲問道：“同志們，過去你們感到作過主人嗎？”“你們究竟取得什麼民主權利？”林希翎，我現在就回答你：我們大家——包括你在內——都已取得了很多的民主權利！你在北大講演，在城內講演，在西郊又講，你能够在幾千人面前自由自在地講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一直說到你疲倦了，不願再說時為止，這難道不是你享有民主權利的證明嗎？同志們，在林希翎發言的時候，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場面：一方面，她正在享受着民主權利，在這民主的講台上自由自在地發表意見；另一方面，她又大聲叫嚷說，她沒有民主權利！她沒有作主人的感覺！這樣，林希翎就使

自己处在一种十分尷尬的地位。林希翎，我很想帮助你摆脱这种尷尬的处境，可是这是事实呀，又有什么办法呢？

同志們，我也要問問你們：你們有沒有民主權利呀？（听众高呼：“有！”）是的，我們有民主權利。如果要你們來談一談你們已經享受到哪些民主權利的話，我想，也許每个人都可以象林希翎那樣講上几个鐘頭。但是，我們並不滿足於我們已經享受到的民主權利。因为一方面，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妨碍我們更充分地享受这种權利；另一方面，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民主的範圍还要不断地扩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專政发展的趋势。

“肃反扩大化！”林希翎叫道。当然，这是对民主權利的严重侵犯。大家知道，肃反的基本方針是：“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錯必糾。”难道从这里面能够找出“肃反扩大化”的任何根据嗎？我們不否認，在肃反中有少数搞錯的，因此中央才提出要大檢查，要平反。但是，难道能够由此得出“肃反扩大化”的結論嗎？可以肯定，在肃反中仍然有漏網的反革命分子，今天在大陸上，也仍然有极少数的特务分子。那么，按照林希翎的邏輯，难道不是應該由此得出“肃反縮小化”的另一結論嗎？在这方面，已經有一个在公安机关工作过的同志列举大量事实反駁了，我再补充一点材料。林希翎說：“据说鎮反时南京一夜逮捕了兩千人，第二天，社会很緊張。”然而她回避了这样的問題：逮捕了誰？是誰緊張？同志們，我敢肯定，我們大家都不会感到緊張的，緊張的是我們共同的敌人。我在南京工作了四年，我就沒有听说过一夜逮捕了兩千人这回事。即使逮捕得多一些，我也毫不奇怪，因为南京是蔣介石的老巢，是反

动的大本营。就在这个反动大本营，仅雨花台一处，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我党先烈、爱国志士和革命人民就不下 20 万人！同志们，南京社会上的确紧张过，那是在解放初期，晚上一两个人不敢出去，因为有人抛石头，打黑枪。同志们，自从镇反以后，南京的社会上就不再紧张了。夏天，人们在外面可以从晚上睡到天亮，也没有人抛石头，打黑枪了。

林希翎为反革命分子呼吁，要求我们的政府实行“人道”。没有抽象的人道，有对敌人的人道，便没有对人民的人道。根据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我们的政府决不对敌人“施仁政”。林希翎在“人道”的幌子下，射出了“肃反扩大化”这支毒箭，乃是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肃反，否定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之一，从而大大削弱这个专政，使人民民主专政陷于瘫痪。

林希翎还要求按照她的民主原则来改造我们党。她主张入党不仅要支部“批准”，还要百分之七十的群众同意了才行。而且，群众也可以罢免党员。不要忘记，群众是多种多样的：有先进的群众，也有落后的群众；有劳动人民，也有尚未改造过来的剥削阶级分子。如果实行了林希翎这条异想天开的原则，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党就会成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群众的大杂院，一个热热闹闹，熙熙攘攘，人们来来往往，可以随便从前门进，后门出的大杂院。同志们，这究竟是如林希翎所宣称的“爱护”党呢？还是企图根本上取消党呢？她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们再继续听一听林希翎新奇的见解吧。“统治阶级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有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要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主观能动性起主要作用”，等等。我要问：这是唯心主义呢，还是唯物主义

呢？說是唯心主义吧，唯心主义当然也有爭鳴自由，但是林希翎是公开标榜拥护馬列主义的。說是唯物主义吧，可是，同志們，你們听呀！“……社会主义社会有克服这个规律的可能性，要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主观能动性起主要作用。”我虽然分辨不清，但是，至少有一点对于我是很清楚的：林希翎已經充分發揮了她的“主观能动性”，由于發揮“主观能动性”的結果，她已經為我們創造了一條規律！

我来談一談我个人对这个問題的看法。“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領導和群眾”，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不能混為一談。我認為，領導和群眾是矛盾的統一體，是矛盾着的雙方，失去了其中之一，統一體便被破壞。不能設想完全沒有領導的群眾，而領導如果完全脫離了群眾，也必然要為新的領導所代替。領導的本身，便存在着脫離群眾的可能性。百分之百地不脫離群眾是不可能的，不能從絕對意義上理解，因為，這里面有一個主觀和客觀的關係問題。否則，領導便不再有改進的必要，事物也便不再發展了。領導機關的任務，就在於主動採取種種措施，來防止和克服脫離群眾的現象。在這方面，我們黨有着實行群眾路線的長期的優良傳統。目前所展開的整風運動，正是這條路線的生動體現。在階級社會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處於完全對立的地位，存在着對抗性矛盾。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領導與群眾之間存在着非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不好，在特定的條件下也有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這兩者之間具有着質的區別，林希翎把所謂“統治階級局限性的規律”解釋為各個社會的共有規律，正是抹煞了這個質的區別。林希翎說：“領導和被領導有矛盾，因為統治和被統治的地位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我們知

道，在階級社會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由於利益相反，對同一事物，常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那麼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情況又是怎麼樣呢？存在決定意識。領導和群眾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然而決不是什麼“統治和被統治的地位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也可能不同；但是，還有相同之點，而且，“同”是基本的方面，否則，黨便不會開展整風運動，整風運動也不會獲得廣大群眾如此熱烈的支持了。林希翎正是不懂得這一點。不僅如此，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處在領導地位的人們，也有正確的联系群眾的領導者和錯誤的脫離群眾的領導者的區別，有無官僚主義的區別，官僚主義程度大小的區別。處在被領導地位的人們，由於社會出身、歷史經歷、所處的具体環境尤其是思想方法上的差異，對問題的看法也有許多不同。有的看問題比較全面，有的看問題比較片面。一般地說，片面性人人都有，但是程度大不相同，表現形式千差萬別。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動搖性、自由散漫性、偏激和狂妄、個人主義的野心和欲望、無政府主義的狂熱等等弱點，往往使這種片面性獲得惡性的發展。甚至有少數人由於嚴重的片面性而形成一種觀點，一種偏見，一套“思想體系”。同志們，這就是林希翎所以會和我們發生種種意見分歧的原因。

然而，我們和林希翎之間的分歧，決不僅僅限於思想方法和觀點方面。必須注意，立場和觀點、方法是一致的。一方面，立場決定觀點、方法；另一方面，一個人由於觀點、方法的錯誤，久而久之，也會影響和動搖他的立場的。這是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仔細分析一下林希翎的言論，便可以看出，她的錯誤已遠遠超出了思想方法的範圍，她已經離開了正確的立場，離開了社會主義。這樣，在我們和林希翎之間便出現了嚴

重的立場的分歧。

三

林希翎思想方法的特点之一，是以局部代替整体，以个别代替一般，以树木代替森林，抓住一点，否定全盤。例如，林希翎說組織疗法是从苏联照搬来的，教条主义，一点用处也沒有，害人不淺。如果說在推行組織疗法中有严重缺点，硬搬硬套，这我同意。但是，說它一点用处也沒有，我就是不心服。林希翎，你在台上这样講的时候，台下，新開系和經濟系的兩位同学就在議論說，他們的鼻炎正是組織疗法治好的。再告訴你，我以前有一个熟識的同志，患胃潰瘍，也正是用組織疗法治好的。这些事实至少說明組織疗法还有一点用处吧？否定一切，抹煞一切，这是一种絕對主义的思想方法，这不是形而上学又是什么呢？林希翎，請別怪我扣帽子，我只是把你扣在別人头上的帽子再送还你而已。

林希翎說：“社会主义是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就說明社会不再发展了。”我們說：所謂“最”，如果是和过去比較而言，又有什么不对呢？林希翎又說了，“你們总是向后看，不向前看。”是的，我們要向前看，但也不能忘記走过的道路，因为在这一条道路上，我們斬除过重重的荆棘，因为在这一条道路上，洒遍了我們同志的鮮血。为了今天的社会制度，我們付出了极其昂貴的代价，这是我們一时一刻不能忘記的。請林希翎告訴我們，要和还没有出現的共产主义社会比較，要和你所說的五百年后的“X社会”比較，究竟怎样比法呢？

林希翎对“最”字很反感，認為“最”就是形而上学。可是，

当她認為需要的时候，当事情变得对她有利的时候，她就毫不客气地使用起这个字眼来了。她在5月31日晚城內大会上大言不惭地說她是“肃反中的最积极分子”（据法律系同志揭发，并非事实）。林希翎，我真为你担心啊！如果你是“最积极分子”，那么根据你的观点，你岂不是要停止发展了么？那有多么危險啊！

林希翎，我对你的概括力确实感到惊讶，你往往根据有限的事实甚至是浮光掠影、空不可靠的事实，便很快地作出了結論。对于只見树木、不見森林的人們來說，要搜集这一类事实，是并不困难的。“在社会生活現象极端复杂的情形下，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單个事实，来証明任何一种意見的。”（“列宁文选”，第一卷，第921頁）尽管你在发言中提出了許多“新見解”“新論点”，然而，片面性的論点終究是片面性的論点，即使它們很新鮮，很动听。建立在局部事实和表面現象之上的片面性論点，正象建筑在沙灘上的高塔，看起来巍峨高大，然而一陣风来，便会倒塌的。俗話說得好：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人們在生活中总是要遇到各种各样发光的东西，这里面有的是金子，有的并不是金子，尽管它們看起来很象金子，也确实有人一时把它們当成金子。

四

这次辯論会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使我懂得了一些过去不懂得或不很懂得的东西。我倒也发现了一个也許是規律性的現象，即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有时候很象一对孿生子，修正主义往往是作为对于教条主义的懲罰而出現的。同是一个入，也許他昨天还信奉那几根干巴巴的教条，而当今天批判教

条主义时，他由于缺乏真正的馬克思主义修养，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便很容易失去辨别力，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观点抛得一干二净，被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俘虏去了。同志們，我們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我們决不是为了替資本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打清道路。我們必須認清，林希翎所販賣的并不是什么新鮮的貨色，而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陈腐的毒藥。由于她的反动观点在許多方面是以“左”的面貌出現的，是用馬克思主义的辭句伪装起来的，因此便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揭露和彻底粉碎林希翎的反社会主义观点，为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而战斗，这是我們每个有觉悟的大学生义不容辞的神圣責任。

1957年6月4日

(原載“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駁斥林希翎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若 寒

林希翎在六月十三日辯論会上的发言，其主要点归结起来就是：否認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專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她說苏联、中国現存的社会制度都不是社会主义，其理由是生产力还没有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还有定息，特别是还有无产阶级專政。她說：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必須在全世界同时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專政只能存在于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建成，国家就应该消亡；而斯大林認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保存无产阶级專政

的观点是錯誤的。

我們的看法跟她完全相反。我們現存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社会主義的，其所以說是社会主義，是因為我們基本的經濟制度与政治制度是公有制与无产階級專政，其所以說是基本而不是完全，是因為我們还有私有制的残余，它就表现在公私合营企业与半社会主義合作社当中，但决不能因为这点残余就否定我国社会主義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来。至于說生产力沒有超过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那是荒謬的生产力論。馬克思主义認為生产力是归根結底决定生产关系的因素，但不是直接标志社会性質的因素，直接决定社会性質的是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就是基本的經濟制度与政治制度。假如按照林希翎的生产力論說来，那么美国才是社会主義，而苏联、中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都不是社会主義。可是她自己在前兩次发言中又說南斯拉夫是社会主義，这不是自相矛盾嗎？再说，无产階級專政是否与社会主義相容呢？它不仅相容，而且在现在的条件下，沒有无产階級專政也就沒有社会主義，这是与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主義革命理論相联系的。馬克思、恩格斯当然是正确的，他們关于社会主義在全世界同时胜利和社会主義在国内建成后国家消亡的观点，是在19世紀資本主义还是上升时期、不平衡規律还没有充分起作用的时候提出的，而且是經過巴黎公社的實踐証明了的。列宁、斯大林也是正确的，他們关于社会主義在一國或几国首先胜利的观点是在帝国主义时期、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規律已經充分起作用的条件上提出的，而且为最近五十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所完全証实。在这样的条件下，外部还有資本主义包围或者是两个陣营对立，国内建成了社会主義公有制，无产階級專政能不能

消亡呢？当然不能，因为国际帝国主义勾結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刻都在企图用武力来顛复我們，所以說沒有无产階級專政就沒有社会主义。过去有考茨基与托洛茨基反对列宁、斯太林的这个观点，他們当然是机会主义，不幸今天还有一个林希翎教条主义地抄襲了这个机会主义观点。

其次，林希翎說“三个主义”的根源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現制度，現制度与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有无产階級專政。如此說来，林希翎就把“三个主义”的根源归結于无产階級專政。这也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的看法跟她恰恰相反，无产階級專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不是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而是坚决反对“三个主义”的力量源泉。从道理上講，一切剝削階級的国家为了統治人民、阻碍历史的发展以及自身的相互傾軋，所以它們需要官僚主义、唯心論和宗派主义。而无产階級專政是劳动人民的政权，为人民服务，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它需要而且完全可能团结，又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的，所以我們坚决反对“三个主义”。从事实上來講，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剝削階級国家进行过任何認真的反对“三个主义”的斗争，相反的倒是全身腐朽，終生不治；而在我們这里，尽管它不过是个別残余的瘡疤，我們仍然发动广大群众掀起偉大的整风运动，坚决地进行反对“三个主义”的斗争。难道这一切还不是最好的証明嗎？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我們社会中是有的。但是必須說明兩点：第一，它只不过是个別現象，而决不是我們上层建筑中的主体，更不是整体。正因为还存在这种现象，所以我們才有必要来反对“三个主义”；正因为我們上层建筑的主体是好的，所以它能够有力量和有信心来反对“三个主

义”，否則就象一切剝削階級國家一樣全身腐朽終生不治。第二，“三個主義”的根源決不能在現存的基本的社會制度中來找，因為它正是反對“三個主義”的力量源泉。“三個主義”在我們社會的現階段來講，主要的是由於舊的思想意識作祟的緣故。如果硬是要追究到制度的話，那麼其根源就是舊的社會制度。因為社會意識的改變是落後於社會存在的。其次，現存制度中的個別缺陷和不足，也是助長了“三個主義”的為害的。正由於此，我們認為克服“三個主義”是從整風著手，首先是解決思想問題，接着是貫徹邊整邊改，這裏也包括糾正制度中的個別缺點和錯誤在內。但是，這一切都是加強和鞏固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不是削弱和動搖它。林希翎從錯誤的前提——“三個主義”的根源是現存的社會制度——出發，必然作出荒謬的結論：要消滅“三個主義”就要徹底變革基本的政治制度。就不得不墮落成反社會主義反無產階級專政的右派了。

林希翎想在一棍子打死我們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再一棍子打死我們黨。她說解放後的共產黨是由“老爺、混蛋和那些沒有思想的人”構成的，還由此提出建議要大批清洗和群眾選舉與罷免黨員。林希翎完全暴露出她不是在幫助黨整風，而是惡意地污蔑黨、毀滅黨。我們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絕大多數黨員都是好的，大批清洗一定是使黨毀滅，群眾選舉與罷免的結果也只有把黨降為無所不包的群眾團體，而不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因為群眾是多種多樣的，按照林希翎的建議，那麼，資產階級群眾也可以選舉共產黨員組織支部和黨委了。

林希翎特別攻擊黨的領導，這是在“反對以黨代政”的名

义下进行的。她反对“以党代政”就是認為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不應由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提聯合候選名單，共產黨不應向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草案和建議，在各級國家機關中不應有黨、團員，誤這就是宗派主義；黨組也不應該研究機關工作和提出建議。試想一想，把這一切都取消的話，還有什麼黨底領導呢？林希翎與章伯鈞、儲安平不是一丘之貉嗎？

她還攻擊黨底統一戰綫政策，說民主黨派是形式、點綴品，因此應該取消。這又是用“左”的詞句來取消黨的領導，因為民主黨派是共產黨聯繫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上層以及他們的知識分子群眾的紐帶，如果象林希翎所說的，把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人民代表大會都取消掉的話，那就是使黨脫離群眾，孤立起來成為光杆司令，從而也就是取消了黨的領導。

林希翎否定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以後，要把我們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她說：資產階級兩黨制可以給我們起點刺激作用，黨員從這個黨出來了可以進那個黨，執政者也可以由這個黨換那個黨。同志們，這是什麼道路呢？全世界的歷史都証明了這樣一條馬列主義的根本原理：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建立，而工人階級只能有一個黨，即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沒有建成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更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林希翎到處吹噓她是永遠不滿現實，永遠向前看的，但是她所看中的和用以代替現實的却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兩黨制。如果硬是要在中國實行兩黨制的话，共產黨一下台，其結局必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因為中國的歷史事實早已表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是行不通的。誰叫囂以第三條路綫來代替社會主義道路，誰就

是反革命。

1957年6月13日

(原載“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批判林希翎的兩個根本性論點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 張培森

今天我們如果要回答對林希翎的發言應該抱什麼態度的話，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認清林希翎發言的性質，從而來分清是非。為了要搞清楚它的性質，也就必須抓住林希翎（以下簡稱林）發言中的根本性的論點和主張，唯有對她的這些論點和主張作一番實事求是深入地分析，我們才可能回答這樣一個目前尚有重大分歧的問題；究竟林的發言是否是為了社會主義和為了幫助黨整風。直到目前為止，還有許多人認為林發言的出發點是好的，那麼，也就是說不能和葛佩琦、王德周等這一類公開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相提並論，否則就有些太冤屈了林的“好意”了。我認為不能把林的發言和我校絕大多數善意的幫助黨整風的意見來相比（儘管這些意見不一定全部正確，或者某些人情緒有所偏激）。雖然有些同學同意和支持林的意見，但是大部分由於沒有弄清楚林的觀點的性質，因而模糊了的。因此，分清這個是非，不但會使我們思想上提高一步，而且對我們進一步“鳴、放”，也有相當好處。

林提出的論點很多，但我覺得在她幾次發言的整個精神中，一直貫穿着兩個最重要的根本性的論點：

第一，她認為：我國的政治制度已經不適合於我國現有經濟基礎，需要徹底的改革，並且她建議採用煤破的方式。

第二，她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現狀，已經處於基本上腐朽癱瘓的狀態，因此她建議大批清除這些“腐朽”的黨員，用群眾選舉的方式來改造我們的黨。

現在先讓我們來分析她的第一個論點，政治制度當然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國家的政權，因而顯然可以看出，她的這一論點是針對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的。既然她認為這個制度已不適合於我國現有的基礎了，自然她對我國的政治制度抱有“與眾不同”的看法。她的看法究竟是怎樣的呢？她把我國現在政權機構說成是全部的官僚機構，把我們國家和黨的領導人員說成是統治者，並且和過去剝削階級一樣都有局限性，罵周揚等人是宮廷女人，和國民黨官場上吹牛拍馬、捧上壓下的官僚沒有兩樣。在她列舉的幾個具體制度中，把按勞取酬的級別制度，說成是和奴隸社會一樣的等級制度，把文化思想方面的政策，說成是欺騙封鎖，沒有民主，“一切都看中央臉色辦事”。總而言之，她把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形容成漆黑一團，暗無天日，甚至某些地方比國民黨有過之而不及。特別是她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原故”；她又說“三害產生的原因，我認為應從社會制度來找”。基於這樣的看法，她所得的結論就是要觸動“三害的根基”，要進行徹底的改革，改良是不行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本質上不同於一切剝削階級的專政，在這個政權下面，人民得到最充分的民主。在短短的七八年內，我們的國家為人民做出了中國歷史上任何統治階級所從沒有達到過的成績。工人和農民們的最近發言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任何人所不能抹煞的。用不着我們來多說。但是我們要和林希翎爭辯的

是这样的一个問題：就是三害的根源是否是产生于制度的本身。这和她的根本論点的依据有关，是一个必須辨清的問題。要回答这个問題，我觉得最好重新温习一下我們党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在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中，一方面肯定了目前苏联的經濟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經濟基础的需要。同时也認為在这种情况之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間、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間，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这些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接着下面就談到这个問題說：“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調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質的矛盾（按照辯証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證不发生錯誤了呢？問題沒有这样簡單。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着重点是引用着加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證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錯誤。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問題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沒有这些，人們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錯誤，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不良的事情。”^①特別当文件中具体分析到斯大林錯誤的历史条件时，作了令人信服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文件这样說：“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之所以会遭到某种破坏，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党在领导国家方面是缺乏經驗、新的制度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新制度的巩固过程和旧影响的消失过程，都不是直綫的，它們的某种波浪式的起伏現象，在历史的轉变时期是屢見不鮮的）；国内外的緊張

^① “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斗争对于某些民主发展所起的限制作用；等等”^①。从这两种分析中，说明了犯错误的原因不但不是制度不好，相反的，却正是制度遭到了破坏的结果，而新的制度之所以遭到这样的破坏，正是由于它还没有巩固到足以抵抗一切旧时代影响的侵袭。我们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因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思想影响；我们的国家机构还不够完善，也确实存在着机构重叠的现象；“三害”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这种残余思想的影响（我在这里不打算来论述“三害”产生的全面原因）。因此，显然的我们这种认识是和林所认为的“官僚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基础改变了，但思想仍是以前的”这种看法有着根本原则上的区别。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制度本身是新生的，它才诞生了七年多，已表现了它无比的生命力。代表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结合中国实际的运用已经引起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赞誉，如何能把我们的这种新生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或蒋介石统治的官僚机构同样比喻呢？又如何能说我们今天思想和以前仍旧一样呢？显然，我们之所以能够大规模的公开地开展揭露自己缺点的整风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它说明了我们的肌体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和健康身軀所不相容的东西，这就是“三害”，经过诊治，就会使我们更加健康。一个本身已经腐朽了的制度，就象一个病人膏肓的人一样，再高明的医生也无能为力。而我们新生的制度本身，就具备了克服一切旧的残余影响的能力，才能提出象今天这样的整风运动。

有人会說，林在談到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时不是一再地指

^① “再論无产階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出，她要維護公有制的基礎么？難道這點也能說她不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嗎？但就我看來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詭辯。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們國家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建立，首先是由於我們工人階級從國民黨反動派那里奪取了政權才得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和發展，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國家機器的推動和管理是不可能實現的。拿我國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和平改造來說，連資本家本身也不能否認，這首先是由於工人階級掌握了政權；另一方面，若光是建立了公有制，而沒有強大的人民武裝和國防力量的保護，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們翻一翻這一時期以來黨外人士的發言，除了大多數善意的批評和許多積極的建議外，抱有和林同樣論點的也不止一個。他們一談到“三害”，就喜歡在“三害”的根源上大做文章。他們得出的共同的結論（明顯的與不明顯的），都是要根本上解決制度問題。試問，為什麼他們這些人對這個問題這麼感興趣呢？還是他們自己人把這個謎底揭穿了。民盟有一個叫陳新桂的，他在民盟中央小組會上，贊成儲安平關於“黨天下”的發言，但他認為儲安平沒有把話說完，他補充說：“在延安整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會越反越多。”這正露骨地道出了他們的惡毒企圖。可是，今天任何企圖削弱我們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妄想都是行不通的，有這種妄想的人，有如螳臂當車，不過是自取滅亡罷了。

第二個論點是針對我們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首先她對我們黨的現狀和面目作了根本的歪曲和惡毒的誣蔑，從中央的領導人員到廣大的基層黨員，她都一概加以謾罵和攻擊。特別把解放後入黨的黨員，罵成是“一大批混蛋”，

并且把他們分成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向上爬的”，另一种是“沒有思想的人”。因此她認為必須動員这些人退党。另一方面，她把我們党和群众的关系，形容成是尖銳的对立，把一些个别地区的罢工斗争情况，形容成是我們党处在危机四伏、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关头。我們承認我們的党是有大大小小的缺点和錯誤的，要在六亿人口的大国中建設社会主义不犯一点儿錯誤和缺点，那是神仙也办不到的事情；我們也承認解放后某些黨員的資產階級思想有一定的滋長，甚至个别黨員或基層組織已經完全蜕化變質了，这种个别情况以前有过，以后也可能发生；但这到底是个别的情况；我們也承認，領導与被領導关系間存在着矛盾，由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而造成某些地方的党群关系上的隔閡。但是决不能因此就看不到事情的基本面貌；我們的党基本上是健康的。去年匈牙利事件對我們党就是一次很好的考驗，連外國通訊社的記者在報道中也不能不承認“北京中國黨的穩固”。正因為我們的党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为首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因此領導与被領導的矛盾，某些地方党群之間的隔閡，这种种矛盾都是在兩者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情况下的矛盾。就全林所特別指出的解放后入党的黨員来看，他們大部分都是直接在广大的基層組織中勤勤懇懇地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單有中央的正确領導，沒有这些广大基層黨員的努力，要使得党的方針政策得到正确的貫徹，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們工作有缺点，應該說，也是次要的。最近广大工人、农民的講話，最有力地証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有些工人說：“誰要是想取消共产党的領導，我就要拿生命來和他拚。”他們不但看到共产党过去領導人民推翻三大敌人的

胜利，而且也看到今天党领导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他们不仅看到中央的正确，也看到绝大多数党员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事实；他们看到我们党的一些缺点，同时也看到我们的党是如何地对待这些缺点。因此，人民对党是拥护的，对绝大多数党员也是爱戴的。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将会更加提高。

最后来分析一下她的所谓用群众选举的办法来改造党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她说“入党入团应该有70%以上群众表示同意，入党入团不仅是要党团批准，而对不起作用者，群众还可以罢免他。”我们吸收新党员工作中是否存在缺点呢？在被吸收的新党员当中有没有个别脱离群众或者群众关系不够好的同志呢？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这些毕竟是个别的缺点。我们党既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党，事实上在考察一个同志入党条件时，群众关系当然也是考察的一个方面，并且需要加以具体分析。但是，如果按照林希翎的办法来“吸取党员”或“罢免党员”的话，那结果就是我们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政党的根本性质完全丧失，就是抛弃了列宁建立的建党原则，而这个原则的正确性不但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所证明。列宁当时在俄国建党时，就曾经在这个问题上与孟什维克作过严重的斗争，这是每个读过苏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列宁所坚持的原则是：这个党首先是一个先进有组织的部队，同时又是联系广大群众成为工人阶级一切组织形式的最高组织形式。列宁特别指出不能把党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他说：“忘记先进部队与趋向于它的一般群众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底经常责任是要把愈益广大的新层提高到这个先进水准，那就只是欺骗自己，故意漠视我

們的巨大任务,縮小这些任务了。”① 列宁这里还只是指的工人群众,如果按林希翎說的各种阶层“群众”的話,那我們的党就决不会是領導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工人階級先进部队了,而是資產階級的聚斂会和知識分子的俱樂部了。这样的党也就是当初和列宁主張根本对立的馬尔托夫所要求的党:成分复杂,組織涣散,和沒有定形的党。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我們的党。这种取消党的論調,出現在这次整風运动中,不能認為是一种偶然的現象。这里暴露了一部分人要想借整風运动来达到取消党或者削弱党的目的。这次給盧郁文写匿名信的人,他在信中道出他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得到“匿名勇士”支持的譚惕吾的意見是些什么內容呢?我們不來研究其意見的全部內容,但其中有一个主要意見也同样是指到党的問題。她說“党領導國家大家承認,但用什么方式值得研究,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党内又有一套機構,这是‘双軌制度’。”她又說“既然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为什么自己專政的機構不用,而要削弱其職權,另在政權之外來搞一套党的系統呢?我希望中共中央考慮这样做是否合乎中国国情!”接着她似乎就党領導國家的方式問題,提出了具体建議:“主席办公室應該扩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機構要充實,要發揮它的作用,共產黨員到这个权力机关來監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產党内各个部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的各种委員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內可以設黨組,吸收党外人士參加工作。”(着重点是引用者加的)。把党的領導機構說成“不合中国国情”,这种話簡直和美国之音的合众

① “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文出版社,65頁。

社論調沒有兩樣，表面上看來似乎和林希翎一樣採取“建議”的姿態，“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幫助黨整風”，試問黨的機構都取消了，黨外人士也可以參加黨組，這又如何來實行領導！這不是取消是什麼呢？總而言之，這類論調和那些把我們黨員說成是“便衣警察”、“特務”，把黨的匯報制度說成是“情報制度”的公開露骨反黨言論實質上沒有兩樣，他們的目的是非常明顯的，是要取消中國人民的核心，或者孤立這個核心，要把這個核心連向千百萬群眾的綫加以切斷。然而這是工人階級所不能答應的，也是全中國人民所不能容許的，工人們憤怒地告訴他們：“我們和黨是一條心，一條命。”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但看清了林希翎的根本論點的性質，而且看到她所強調的問題也是當前一些社會上右派分子所強調的問題。用中國一句古話來說，這就叫做“物以類聚”，儘管他們所表現的有多種形式：有的杀气騰騰，有的把自己扮成向社會主義獻花的小姐，然而剝開來一看，無非都是一套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只能欺騙那些忘記了我們目前還存在階級鬥爭事實的人們。

1957年6月12日

（原載“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斥“肅反擴大化”和“沒有法制”的說法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 張燕魯

我想就林希翎（程海果）攻擊我們“肅反擴大化”及我國“沒有法制”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林希翎攻擊我們肅反擴大化的主要論據有三個：（1）理論

前提是錯誤的；(2) 杀得太多了；(3) 我們沒有法制必然会造成肃反的扩大化。

我国的肃反斗争是不是受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规律的理论影响，要具体分析。我国第一次镇反运动是在1950年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正紧张进行的时候，反革命势力在国内外反动派的支持下向革命猖狂进攻，企图复辟。由于部分干部在1950年10月前的大半年中存在着太平麻痹和小资产阶级的仁慈观点，产生过“宽大无边”的偏向，引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所以当时要巩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第二次肃反运动是在1955年正当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最紧要的时候，那时反革命势力又有些抬头，想与革命力量较量。以上说明这两次肃反运动都处在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情况下，而第二次肃反运动，一开始就提出“有计划、有分析、实事求是”等精神，这正是根据我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所以，不能认为我国肃反斗争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

党中央一贯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所谓严肃就是只要有反革命存在，就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不把反革命肃清，决不罢手。所谓谨慎就是在肃清反革命的同时，要坚决保护好人。在采取一系列谨慎措施中，有决定意义的是对捕、杀反革命采取严格的控制。在延安时就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捕。”1951年镇反高潮中规定：凡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可杀可不杀的就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1955年肃反运动中，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凡牵涉到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十个方面內部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置，坚持了比社会上鎮反运动更加謹慎的方針。对反革命分子的处理采取德办与宽大相結合的总政策，具体的說，就是首惡必办，胁从不問，坦白从寬，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分別对待的政策。为了將死刑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对死刑的执行，規定了特殊的程序（1950年人民法庭組織通則就規定批准权屬省人民政府，后来，在人民法院組織法中也有規定），并且在鎮反运动中制定了死刑緩刑制度，給予那些本來罪該处死，但还未到非杀不可的反革命分子以改造的机会。这完全是根据工人階級改造人类的歷史任务，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的。在审查反革命嫌疑分子时，是遵循重証据不輕信口供的原则和实事求是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使反革命分子能正确的定罪，也使一些只有政治历史問題沒有反革命罪行的人得到正确的处理。这里必須把肃反运动中个别偏差与肃反扩大化区别开来。肃反运动中怀疑錯了一些人，造成錯誤和偏差，这是和肃反是与隱蔽的敌人作斗争的复杂性分不开的，問題的关键在于最后的結論是否正确。

以上說明党的政策是肃反斗争得以正确进行的根本保証，这是鉄的事实，如果林希翎不是別有用心，是不难看到的。

是不是杀得太多了？林希翎說：“我感到扩大了（指肃反）……杀了77万人，不少啊。”我不明白她所謂多、少的客观标准是什么。难道对那些罪大惡极、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不該杀嗎？这些人不杀，人民能站起来嗎？匈牙利事件是血的教訓，我們不杀这些人，他們会来杀我們。这个道理很簡單。杀好杀坏，杀多杀少，就看林希翎是站在什么立場上罢了。

是不是沒有法制？林希翎惡毒地誣蔑我們說：“以党代政

的問題存在，共產黨是執政黨，實權都在共產黨手中，法律是形式主義的……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根據審判員的意志，說了就算……律師法官都是黨員，至少是團員，象三堂公審一樣，實際上是形式主義。”從以上看她所謂沒有法制有兩點“理由”：（1）沒有完備的刑法典，（2）實權掌握在共產黨手裡，法官律師都是共產黨員，法律成為形式。

按照通常的理解，法制包括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兩方面。說沒有完備的刑法典就是沒有法制，這是非常不全面的。沒有法？我說有，開國時就有共同綱領（臨時憲法），隨着群眾鬥爭經驗的總結，頒布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各種條例、辦法在憲法頒布前就有 3000 多個，僅刑事法規方面就有 80 多個。這些法在消除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拿懲治反革命條例來說，就是鎮壓反革命的法律根據，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共同綱領的發展，憲法的頒布，奠定了我國法制的基礎。如果說沒有法，乃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立法的不完備是事實，但這不是共產黨專橫不要法，而是如劉少奇同志所說的，“在這個時期，鬥爭的主要任務是從反動統治下解放人民，從舊生產關係束縛下解放生產力，鬥爭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眾直接行動。”過分地強調法律就會束縛群眾的手腳；同時也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出更多的法。就拿刑法典說，與犯罪作鬥爭還沒有提供足夠的經驗，犯罪的情況也變化很大，而我們又不能閉門造車抄襲別人的東西。現在當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上結束，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護人民民主權利，黨的八大提出健全法制，並作為目前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就是有力的證明。以上說明，作為上層建

筑一个部分的法，也是随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基础的发展而发展。人民的法制是人民在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斗争中自己创造的。这是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的根本原因，林希翎的看法不仅是形式主义的，也是脱离实际的。

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是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使法律成为形式。大家知道，在我们这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里，法律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意志的表现，是用来镇压敌人和保护人民的工具，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强有力的武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其领导。共产党的领导与法制不仅没有任何矛盾，而且始终是努力加强对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的领导，教育党员遵守法律来加强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真正的法制。资产阶级虽然在革命的时期以法制反对过封建专横，但是资产阶级国家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法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是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是用来镇压人民、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武器。尽管有一整套法律，而且宣布人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资产阶级法律精心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对侵犯私有制者给予严厉的惩罚），对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好处？何况通过资产阶级的法院——“无情镇压被剥削者，并且保护钱袋利益的忠实而狡猾的工具”（列宁），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就连形式上的法制也破坏了。

在我们国家里党所领导的国家机关对一切关系到国家生活的重要问题，都是按宪法办事的。在司法机关的活动中，有法依法，没有法律就依据政策处理案件。党的政策是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是法律的灵魂，在法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这

样做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的，这难道能说没有法制？在程序方面虽然还没有诉讼法，但在司法机关内部作了许多规定（实践中也这样做），如为便利人民群众行使诉讼权所作的规定，为了保护公民不受非法侦查和逮捕、搜查所作的规定，为了保护被告人辩护权所作的规定，都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这难道能说没有法制？

律师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律师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从事实和法律上替被告辩护，与担任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相对立，通过法庭辩论，帮助法院更好地弄清客观真实，正确地运用法律，根据北京市各法律顾问处的统计，在经过辩护的1057个案件中，有50.9%变更了控诉的罪行（无罪或减轻），但是林希翎否认这些活生生的事实，硬说由于律师、法官都是党、团员，就使律师制度变成了形式，难道在国民党统治下律师包揽诉讼，勾结反动法官，颠倒黑白，从而取得大批赃款的做法，才不是形式吗？

有一些干部的确存在着不重视法制和某些违法乱纪的现象，但是决不是象林希翎所说的，都是“自觉不自觉继承过去统治者的做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1956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动对肃反案件的全面检查，结果证明，绝大多数案件的处理是正确的。违法乱纪的现象在我国从来都是非法的，对于错误，司法机关抱着极其严肃的态度。二届司法会议后，曾经查三错；三届司法会议后，又对1955年1月以后的反革命案件案案检查，总的方针是有错必纠，对错了的进行慎重的处理，做到当事人和群众都满意。这是只有共产党领导、把人民利益放在一切之上的国家才能做到的，这是一种真正法制的表现。

我們千万不要忘記人民民主法制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一把銳利的鋼刀，若是刀把子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中，就是鎮壓敵人、保護人民的工具，若是刀把子掌握在一切剝削階級手中，就是殘殺人民、保護剝削者統治的工具，這就是林希翎從法制方面向黨進攻的實質。

林希翎的言論是和其他右派分子相呼应的，請看她關於肅反和法制問題的言論與譚惕吾、黃紹斌有什麼不同。而且據了解他們之間是有聯系的，他們到底是在搞些什麼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完全有權利要他們作徹底交代。

1957年6月21日

（原載“教學與研究”，1957年第7期）

林希翎論戰手法的批判

中國人民大學講師 許征帆

近幾天，許多同志在“自由論壇”上的發言，從理論上批判了林希翎的反動觀點。我這一次的講話，着重分析林希翎樹立自己論點的手法。

我們都知道，在這次整風運動中，有一部分人趁機向中國共產黨、向社會主義制度發動了猛烈的攻擊。但是，由於黨在群眾中具有不可動搖的威信，再加上近幾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不容抹煞的輝煌成就，就決定了這種進攻只能是通過極其狡猾的手法來進行的。因此，要搞清楚這些人在整風運動中的立場與觀點的本質，就迫切需要對他們五花八門的手法作深入的探討。這就是我所以要在這裡談談林希翎的手法的原因。

我們有些同志，很佩服林希翎的“独立思考”能力，說她在理論上有許多“創見”。我的看法倒有些不同。我認為從理論上說，她的演講“大雜燴”，把種種反動的奇談怪論拼湊在一起，談不到什麼“創見”。而她的論戰手法，却的確有許多“独到”之處。這些手法是多種多樣的，據我個人的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兩面派手法。空喊擁護黨、毛主席、社會主義制度，而又具體地加以抨擊、否定。用革命的詞句掩蓋反動的思想。

自從在北京大學參與論戰以來，林希翎已經初步地積累了一些經驗，她很了解隨便攻擊黨、毛主席、社會主義制度，是必然要碰壁的。因此，她口口聲聲“擁護”黨，“歌頌”毛主席，“贊揚”社會主義制度。然而，按照“聽其言而觀其行”的原則的要求，光聽林希翎的一大串空洞的“宣言”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進一步考察她的主張與行為。

林希翎不厭其煩地說明自己“擁護”社會主義，然而，跟着這種空泛的聲明而來的，是一大堆荒唐的言論。她不顧我國的社會上層建築幾年來在經濟基礎鞏固與發展中起巨大作用的事實，竟說現在我國的上層建築是不適合於經濟基礎的，現在制度是產生“三個主義”的根源，因而要消滅“三個主義”，就必須對現存制度進行根本改革，甚至於爆破（讓我們提醒大家一句，對社會制度進行爆破，就是流血的革命）。這些說法，豈不是與她自己的所謂“擁護”社會主義的態度互相矛盾嗎？

林希翎再三再四表白自己是“愛護”中國共產黨的。但是，在這種愛護的幌子下，她又主張按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黨。據她的描繪，黨是漆黑一團，黨是由“混蛋”、“傻瓜”、“老爺”這三類黨員組成的，而且黨的贖買政策、

肃反政策、干部政策、文艺政策、新聞政策都存在着极严重的錯誤。請問林希翎，如果党竟象你所刻画的那樣，又怎能博得你这个自命为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良心”的人的爱护呢？

林希翎用了英明的、偉大的等等形容詞来形容毛主席。然而，她又一口咬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員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們竟敢于批判“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一句話就把我們敬爱的領袖勾画为胸襟狹窄、意气用事、无法无天的“小人”。这还不够狠毒嗎？对毛主席进行这种人身攻击，我們是絕不能容忍的。

同志們，历史上以及日常生活中无数的事实告訴我們，具体的抨击、否定是比空洞的贊揚和肯定有力得多。举例來說，如果我贊美張同志是个品德高尚的人，紧跟着又誣蔑他昨天在百貨大樓偷了別人的皮包，这岂不是最大的侮辱？同样的，当林希翎对党、毛主席、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惡毒的攻击之后，她那些廉价的贊美詩，不正是最大的諷刺与嘲弄嗎？

其实，說得透彻一点，林希翎对党、毛主席、社会主义的贊揚，并不是出自內心的热爱，而是从策略观点上考虑的。原因是这种搞法有如下几点好处：首先，利于掩盖自己的言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并挂起革命的招牌；其次，便于迷惑和爭取中間群众；最后，能够先发制人地堵塞左派进行反批評的言路。一句話，林希翎运用这种手法，不过是企图更阴險地实现向党进攻的战略計劃而已。

第二，敌視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与階級分析的方法，并混淆不同性質的东西，来抹煞我們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

在辯論的过程中，林希翎多次地提到馬克思主义教导我

們的在观察問題时应有的历史观点与階級分析的方法。然而，口头上虽然这样講，而一接触到实际問題时，她又加以歪曲或唾棄。最典型的例子有三个：

第一个例子，林希翎把現在社会里因社会分工或因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則而形成的工資級別与职別，以及党员、团员、群众由于政治水平发展不一致而出現的政治上的这种差别，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級混为一談。甚至得出这样的結論，說現在等級制度已深入各方面，与奴隶社会相比，不知多了多少倍。

很明显的，这种看問題的方法，是既談不到历史观点，也談不到階級观点，而是血口噴人。列宁曾經指出过：在奴隶所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社会的階級区分是帶着等級区分的形式的。屬於某一等級被認為是繼承的。每一等級都有其一定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这样，階級的划分也决定了居民的等級的区分，而与階級的划分一起，同时規定了每一階級在国家中的特殊的法律地位。因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階級，同时也是特别的等級。反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全体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等級的划分被消灭了（至少在原則上），因此階級不再是等級。对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资产階級社会，社会分成为階級都是共同的，但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有等級的階級，而在最后一种社会中存在的则是无等級的階級。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个結論，林希翎把下面兩個不同范疇的东西混为一談了：一个是現在由于人們的才能、劳动、分工而形成的不同的級別与职別，一个是过去人們由于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与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的不同以及由此反映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區別而形成的等

級。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啊。第二个結論，等級这种东西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消灭了，而林希翎居然硬說消灭了剝削階級后的新中国，等級制比奴隶社会还厉害；用暗示的手法來說明我国經過了兩次革命的結果竟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倒退为連奴隶社会还不如的新中国，并全盤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林希翎，这未免太狠毒了吧！

第二个例子，林希翎認為，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是剝窃胡风的“对文艺問題的意見”的。理由是在这个意見書中，早已主張文艺上的自由竞争。林希翎責备党不但沒有接受胡风集团的意見，反而把它当作反革命組織对待，并坚持了一家独鳴的政策，因而給文艺事业帶來严重的損失。林希翎提出这个問題，值得我們思索的有这么三点：首先，林希翎不看具体的历史条件，用今天党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针攻击了过去党的文艺政策。順便說一句，她常常运用这种手法，否定党的过去的政策的正确性。其次，林希翎在这里又把以下兩個在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問題混为一談：一个是无产階級政党所提出的、在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为目的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一个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那种解散文艺界統一的組織、分裂作家的团结、取消集体领导、停办現任的文艺刊物而代之以在文艺思想上有“基本性質的分歧”的个人办的报刊与杂志、进行資本主义市場式的自由竞争的主張。如果胡风这种阴谋实现了，就必然会使文艺界四分五裂，脱离无产階級思想领导，人工地培养出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与集团，为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的广泛傳播打开方便之門，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扫清道路。最后，如果林希翎

的確對追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發明權有興趣，那麼我可以告訴她，早在一九四二年黨就已提出過“百花齊放”的政策；而從形式上看，“百家爭鳴”這個口號，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出世了。因此，即使姑且脫離階級分析來談發明權，胡風也還是戴不上發明者的冠冕的。

第三個例子，根據林希翎的意見，反革命分子也可以幫助黨整風，因為據說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提出種種值得我們考慮的意見。同志們，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按照這種建議，把蔣介石集團從台灣請回來和我們一起搞整風運動，那場面將是怎樣的呢？說句笑話，這樣一來，整風一定搞得很“徹底”，因為中統、軍統的特務，再加上蔣幫的幾十萬軍隊，一定會把我們殺得干干淨淨。腦袋一落地，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自然也就隨之而完蛋。謝謝林希翎的這個別有用心的“建議”，可惜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同志們的生命負責，我們不但不準備採納她的建議，而且，對這種血腥的主張，要堅決加以駁斥、粉碎。

林希翎不僅自己在觀察問題時，敵視階級分析的方法，而且痛恨與她論戰的對方對她的觀點進行階級分析。誰如果一接觸到她的言論的階級實質時，她就大罵這個人是教條主義者，是條件反射。理由是現在階級已經消滅了，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用不着談什麼階級立場問題。這裡我們不得不向林希翎講些社會科學的起碼知識。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在使用“人民”這個詞時，是把它當作社會學的一個範疇，是指階級社會中的某一部分居民，這一部分居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是由不同的階級與階層組成的。既然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包含由於階級、階級差別而引起的矛盾問題，那

么我們在观察、处理这些矛盾时，仍必須有立場。何况，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人民内部矛盾外，还有敌我矛盾呢？林希翎所以对談立場的人表示深惡痛絕，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立場！

第三，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代替整体，否認我国的光明面，夸大現社会中的黑暗面。

林希翎在自己的几次发言中，不断地譏笑她的对手是主观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并夸耀自己的“唯物辯証法”的素养。但是，十分遺憾，我們領会不了她那种“辯証法”。因为用捏造或者片面地夸大某些事实来树立并論証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只能叫做“詭辯法”而已。

捏造、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这是林希翎常用的手法。我要举出一个例子来証明林希翎的不高明的捏造手法的破产。林希翎一口咬定，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只容許作家写工农兵，这种人为的限制，严重地阻碍了近几年来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同志們，我們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頁，馬上就可以看見毛主席这样写道：“……我們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为农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軍。第三是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資产階級劳动群众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們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产階級的立場上。”誰都知道，“毛泽东选集”不但不是絕版書，而且我們差不多都是人手一冊的。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文艺

應該為誰服務的指示，在書上是白紙黑字，寫得一清二楚，只要不是文盲，都看得懂的。而林希翎竟在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面前，居然曲解毛主席的看法，這一方面說明她實在很大膽，另一方面也說明她確太欺侮人了，把我們當傻瓜看待。同志們，看透了林希翎這種手法之後，我們又怎能不對她所提供的一大串“事實”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呢。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林希翎慣於從極其個別的事實，得出一般的結論。例如，她看到石家莊法院判錯一個農民，人民大學在肅反運動中斗錯了個別的人，她馬上就得出了我國肅反擴大化的結論。甚至捏造了所謂無辜錯殺了七十二萬人的聳人聽聞的數字。辯證法告訴我們，一般是存在於無數的個別（特殊）之中的，為了得出一般的結論，對大量的個別事實進行具體研究，當然是十分必要的。關鍵在於林希翎並沒有認真考查大量的個別事實，而只是企圖從一個二個局部的，有時甚至是不確切的事實上，得出一般的結論。這種手法，那有唯物辯證法的气味呢？

林希翎不僅善於把個別誇大為一般，而且在必要時也善於把一般縮小為個別。當談到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某些缺點時，她運用前一種手法。而當她不得不面對現存社會的種種優點時，她就運用後一個手法。舉個例子說，新聞系雷凡同學，曾在青島市公安局工作了七年之久，他用自己的無數生動的事實，駁斥了林希翎的所謂肅反擴大化的謬論。但是林希翎說，雷凡同學所在的機關是模範，如果全國的公安機關都是這樣，那天下就太平了。三言兩語，就把這種有代表性的公安機關，描繪成為個別的，以襯托、誇大缺點與黑暗面。對林希翎這種做法，我們怎能不憤怒，多卑鄙無恥的手法啊！

为什么林希翎要采用那一种抓住个别来说明一般与整体的手法呢？大家自然而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因为：首先，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她那些荒唐的理论观点是来自实践，有事实作为根据，以增加其迷惑力。其次，暗示人们，反映我国社会面貌的“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公式是站不住脚的。

同志们，片面、偏激、见树不见林的方法，是要不得的。而且这种毛病有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的危险。打个比方，过去我们学校曾有一个坏学生，在王府井偷人家的东西，被失主当场抓住。如果人们因此而片面地得出结论，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都是扒手，我们同意吗？当然，我们不但不同意，而且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同样的，林希翎死死抓住极个别的事实和一些无中生有的东西，得出我国上层建筑不适合于基础，因而必须加以爆破的结论，这种结论我们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不是帮助党整风，而是对敬爱的党、亲爱的祖国的诬蔑与诽谤。我们怎能不坚决加以回击呢？

第四，偷换概念，模棱两可、增加明辨是非的困难。

论点上的模棱两可，概念上的混乱，可以说是林希翎整个演讲的重要特征之一。这里准备举出三个例证来说明：

例证之一，林希翎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划了一个等号。我们知道，现在社会里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问题。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却是敌我关系问题。林希翎把主要领导干部之外的群众，都名之曰被统治者，向他们提问是否真的当家作主了，享受过民主权没有；并说享有特权的党员在对他们实行愚民政策，把他们作为工具。言外之意，是我国九亿被领导者都成了专政的对

象。这种挑撥性的說法的居心何在，实在值得我們想一想的。

例証之二，林希翎罵我們的政权机构是官僚机构。而官僚机构的含义是什么呢？她又不加以明确，并把官僚机构与机构龐大混为一談。任何一个学过一点馬克思主义的人都了解，官僚机构是指机构的質、内容；而机构龐大，是指机构的量、形式。我国的政权机关是人民的代表組成的，其职能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它与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权机关，有着根本的区别，絕不是什么官僚机构。林希翎抓住我們机构的組織形式的某些缺点，就一笔抹煞了这个机构的社会主义本質。这种惡毒攻击的存心何在，也是值得人們三思的。

例証之三，林希翎說我国的制度是不适合于經濟基础的。这里的制度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也只有上帝和她本人才知道。忽而說是指个别制度，忽而說是指总制度和根本制度，忽而又說是指个别制度的个别环节，究竟指的是什么，大概在她本人来看，主要是看論战中如何自圓其說而定。怪不得別人說她是根据“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的原則在运用概念的。

林希翎是法律系四年級的学生，她的拥护者把她描繪为“聪明与智慧的化身”。这位“聪明人”，对众所周知的概念，竟会理解得如此差勁嗎？对自己的观点竟会表述得这样蹩脚嗎？我想是不会的。其所以会产生这种現象，是因为凡是与真理风馬牛不相及、而又冒充为真理的各种观点，的确很难用明确的語言来闡述的；因为一明确，就免不了要露出馬脚，只好以模稜兩可、不明确性作为自己的原則。其次，其所以要采用这种手法，是因它方便于林希翎在辯論中机动地进攻或退却。她常常在論战中，出其不意地指責批判她的人不了解或者曲解了她的思想，就是有力的証明。同时，观点上的模稜兩

可，也造成了听众对她的演講的論点有着相距十万八千里的互不相同的理解，引起听众彼此的爭論、激动。

同志們，在整风运动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种不同的态度与方法。第一种是誠誠懇懇地大胆揭发三害，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人的发言，也可能有偏激、片面之处，但我們应本着“言者无罪，聞者足戒”的精神，加以接受，并感谢他們对党的关怀，爱护；第二种是捏造一些东西，或者片面地夸大某些事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巧妙的手法，提出了否定党的領導权（甚至是党本身），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張对現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系統的反动理論观点。如果讓这种主張泛濫，当然不利于整风运动的开展。打个比方，如果說前一种态度与方法为救火，是打扫房子，那么，后一种态度与方法，就是拆房子，放火。作为房子主人的我們，怎能对那些趁机要拆我們房子、燒我們的房子的种种主張，默不作声呢？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林希翎在整风运动中的态度与方法是属于上述第二类的。因此我們在“自由論壇”上，与她的观点进行斗争，就不是象某些人所說的是“收”，会阻碍整风。而是寓爭于鳴之中，是为了使整风运动更健康的发展。这种爭論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注：在会上发言时，我还分析了林希翎的一些補助性的論战手法，如：先发制人，出奇制胜；胜则留，败则溜；分化群众，爭取同情者；吹嘘过去的所謂“光荣历史”，掩蓋今天言行上的錯誤等等。因为那是针对当时会上辯論情况寫的，所以本文把这部分省略了。）

1957年5月31日

（原載“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附 录：

林希翎在中国人民大学 5 月 30 日的 辯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社会制度問題

社会制度問題，实际上是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問題。

任何社会現象要从社会制度本身来看，这是一个基本原理，馬列主义教导我們研究任何社会現象，都必須从社会物質生活本身找答案，社会制度的概念定义是經典作家所能做的事，所以我是不能下定义的。但可提出看法：社会制度应分二部分即基础和上层建筑，我国的經濟基础，現在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搖的，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比私有制前进一步，所以有人提出定息二十年應該坚决反对，因为这是私有制的繼續，取消定息的时机完全成熟，应该成为公有制。

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經濟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經濟基础的緣故。目前我国哲学、文学、艺术各領域都表现 教条主义非常厉害。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我想談一些具体的制度，如 人事制度，等級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特别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是官僚机构。

人事制度：不合理現象、宗派主义反映在此明显，并不是以德才衡量一个人，而是看資格，看是否是党员、团员，許多不合理的現象，不仅要看現象本身，而且要看这些現象的受害者 and 产生这些現象的条件。有些人把不好的东西归于旧社会，但是就是在新社会里，青年提高也很少，青年希望求知，想听报告、看材料，但有等級限制，为什么青年中存在虛荣、名位，和現存制度有关，有些党员是为了享受特权，而跑到党内，不入党就沒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团，說你不入党入团，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决，我听了很生气，要这样我一輩子也不入团。

等級制度：干部发桌子，紙簍都分等級，等級制度已深入到各个方

面……

产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这些小的制度（等级、人事、保密扩大化）組織了总的制度，具体制度本身产生了三害，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适应的，是私有制的产物。

我国教条主义的统治在这些方面只是宣傳光明的一面，现在有些人还說夸大黑暗面，有人說：“我們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嗎？”这样使單純的青年到了社会，看到这些問題会大吃一惊，甚至会苦着臉而消沉下去了，教条主义害人一点也不奇怪。

基础改变但思想意識仍是以前的，三害和过去的封建性、买办性、法西斯性有关，如宗派主义和封建性、法西斯性有联系，教条主义与买办性有关。买办是媚外崇美，对苏联的学习也是如此，当然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誼不可破，但把苏联东西乱搬就太教条主义，有人說：“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大蜂窝”，我看“是教条主义策源地、大本营。”苏联是教条主义策源地。老师講話就象个打字机，苏联医学就未超过中国的协和，組織疗法害人不少，无情分娩法现在也不用了，这都是由于处在迷信的状态。

我不贊成改良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封建思想、法西斯思想，甚至奴隶思想也出现了，要在巩固基础的条件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中央现在也認識到这点，如現在的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相結合的根本制度，但这不是唯一方法，这不是根本解决，羣众不一定是需要他們来干活，而是需要他們来办好事，当然整风是良好的开端。

关于統治階級的局限性

統治階級都有共同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客观規律，我研究很久，在以前不敢講，现在也还不成熟，提出大家討論。我說这是客观規律，在社会上存在階級时，这个規律便起作用。

对现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局限性如何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規律是仍起作用的，当階級存在时仍起作用，不过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規律可以被人来利用，存在克服这个規律的可能性，但这可能变成

现实性是要有主观能动性，在许多条件中政党起决定性作用。

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我认为领导与被领导就有矛盾，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矛盾是看问题不一样，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发展下去，由量变到质变会爆发成对抗性，要看到现实生活中这个规律在起作用，领导有一定的局限性。假如不加主观能动性克服的话问题就会发展。不同的地位产生看法不同，本来是被统治者，但一旦爬上统治（工人爬到厂长），说话口气也不同了，一切也就变了。

在青年报上有文章说小资产阶级看问题有偏见，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害怕小资产阶级片面地反对官僚主义。我看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有偏见。主席没有偏见还革不了命，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偏见吗？工人罢工没有偏见吗？工人最有偏见。工人对不合理的事情非常不满。我国五亿多小资产阶级，五亿人不反对官僚主义，什么人反对官僚主义呢？五亿小资产阶级总比官僚主义好的多吧，五亿人总是宝贵的，除开五亿，剩下一亿，这一亿中真正的产业工人没有许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联系，这样归根到底只剩了领导者。这个论调等于不让大家反官僚主义，我说：反官僚主义人人有责，甚至是反动的人。

关于“对现实不满”

谈一谈对现实不满的问题：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满足现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灵魂的复活。黑格尔有绝对观念。现在有些领导也成了黑格尔。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这个“最”字就是形而上学的。将来会有更好的社会。如果我生活在五百年以后的“X”社会，我也会不满，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猴子要满意现实的话，那么我们现在都不会变成人。对现实不满是应该支持的，而现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价的赞美诗，成天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向后看不向前看。教员讲课也是和国民党、资本主义比较。

有人說不滿现实会失去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看这不对。当然我們現在歌頌是需要的，真正的歌頌是好的。但不能要公式化的歌頌，吹牛的歌頌，这样会败坏人心，真是害人不少。要把现在有什么問題老實的告訴人民。

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存在，統治者是局限性的客观規律也存在，因为公有制为基础，領導者与被領導者之間沒有根本对抗，所以領導有可能認識这个規律，党一系列的措施都可見党認識了利用了这規律，克服这局限性，从党过去，现在和將來准备实行的措施都說明了这一点。

这些問題如何办？

要把真实情况告訴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发动人民来討論，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只是党员的，應該讓全民尽情的提意見。现在的“鳴、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說，为了巩固他現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鬧翻，要广大羣众討論提出意見，再綜合起来，这是理想的。

法制問題

以党代政的問題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大，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虛假，苏联有法制組織，实际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說了算。如肃反問題，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說沒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駭人听闻的。中国杀了77万人，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肃反的理論根据也是錯誤的——罗瑞卿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階級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錯誤理論的指导。

胡风問題：这个問題很棘手。

现在看来胡风假如偵察当中沒有其他新的材料，只是提意見，这是好的呀。所以我同意赶快解决，这方面我向主席进一言（主席这里是有錯的，但也沒有关系）。常委会决定对肃反大檢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涂改过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檢查。很讓人气憤，法院审判的結果都是党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貫”的現象在这里太多。

你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组织，反组织就是反党，反党则反人民，反人民则反革命，用这个公式来定罪的，这完全是斯大林的方法。

下层领导者他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完全不完全的继承过去统治作法，继承了地主恶霸的作风。可惜中国没有这样的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有错误呢？多少人被害呀？

改革措施

用什么措施来改革？如果党完全是共产主义者，不要政府亦可，完全以党代政，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形式。团、妇联、人代会、工会这些纽带都是形式。实际上，公民得到多少权利？选举是安排好的，劳民伤财的布置工作和会场。

根本的改革要发挥群众智慧，要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团中央应该在整风基础上抓紧整党、整团。整党问题不仅是党内的事情，人民也要管。因为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是人民的命运，所以每人都要来过问。要真正发挥党的作用，必须保证党的质量，清洗一大批混蛋，特别是解放后真正为共产主义入党者有多少？向上爬者倒不少。这是由许多等级制造成的。还有一批中等的人不坏也不起作用，没有什么思想，过去的党员强调“老实”，给爱人写信也要汇报，成天谈思想，我看这些人可真没有思想。对于不起作用者，应该动员他们退党、退团。

入党、入团不仅要党团批准，应该有70%以上群众表示同意，而对不起作用者，群众还可以罢免他。党团不应有任何特权，他的特权应是人民给的信任，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要在物质上给以特权。这样使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入党多好？否则，他可以不入党。

在干部问题上，现在报上登的职工代表大会我很同意。把企业交给职工，这是很好的。

应该叫人民作主。同志们：过去你们感觉到作过主吗？我没有作

主，我沒感到是主人。

干部的提拔一定要羣眾同意。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資格吃飯。資產階級國家的部長們可以辭職，可以罷免。我看這好。我們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過去下放往往好像是犯了錯誤，升上去就高高在上，這樣繼續向上升，還能都當毛主席嗎？干部經常換一下也好，資產階級的兩黨制倒可以競爭一下，在我們國家里，當然這不需要，但這說明能多提意見是好的。部長們調換一下和人民一起參加勞動是很好的。

林希翎在北京大學5月23日的 辯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人民不是阿斗，採取改良主義的方法，向人民讓步是不行的！我不反對社會主義，但要真正的社會主義。現在是否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有懷疑。我給它起個名字：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我們的目的很明確，為了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為了過真正的“人”的生活，不是發發個人牢騷！

我認為今天社會里的所謂“運動”，會造成人們精神狀態的不正常。例如，南京在肅反運動中，法律機關無根據地按照各單位提出的百分比來發逮捕証。結果一夜間逮捕了二千多人。

林希翎在中國人民大學6月13日的 辯論會上的發言(摘要)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還是好的，但是沒有保證實行。現在人民代表大會有些不象話，民主是真正貫徹的嗎？瞪眼說瞎話。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但是看看實際情況，他的權力是不夠的，不相信你在生活中觀察觀察，是黨代替一切，以黨代政，明明是客觀存在，何必閉眼不看呢？想了一想，覺得混淆了一個問題，我們也好，蘇聯也好，社會主義都沒有建成，都談不上是社會主義。現在社會主義僅僅是政治

上的名詞！這根本不是什麼新的道理，我一下子意識到這個問題。馬恩講得很清楚，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生產力水平要完全超過資本主義，上層建築要非常民主，根本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過渡時期的，我們現在是過渡時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蘇聯 1936 年斯大林宣布社會主義建成，這是錯誤的，也是自欺欺人，蘇聯不是社會主義，還說向共產主義過渡？到現在我還不同意。蘇聯無產階級專政還存在，怎麼能是社會主義呢？

斯大林的理論：在一個國家內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他推翻了恩格斯的理論，斯大林不是發展了馬列主義，而是歪曲了馬列主義。恩格斯是正確的，世界上沒有大部分國家取得勝利時，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

反共就是反革命

——駁斥“岂不令人深思”

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社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社论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右派分子罗里波（数学分析研究室研究生）联合了三个立场模糊的同班同学，化名“阿欠伯等”贴出了一张标题为“岂不令人深思”的大字报，全文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仇恨，是一篇彻头彻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必须以严正的駁斥。

一开头，罗里波就在“作品”中使了一个诡计：他一方面提出了向党进攻的“反共就是反革命吗？”的议题；同时又向拥护党的广大同学暗地里投了一枪，说什么“考虑到那些没有头脑的读者断章取义，也怕那些稿费爱好者把头砍去领赏”，因而采取了“岂不令人深思”这样“不太醒目的标题”，想以此堵住大家正义的声音。我们要正告罗里波，你这诡计是骗不了、也吓不倒人的。我们坚决地要把你贩卖的反动货色全部剥开来。

让我们先来看看罗里波在“作品”中举的两个例子吧！他说：“首先举一个不太客气的例，设想英国工党说：‘反对工党

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这是很可笑的。但难道英国工党不正是如此宣传的吗？难道他们不能找到一些工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他们这一论点吗？’

显然，这个右派分子在暗示人们：中国共产党也同英国工党一样，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反革命，‘这是很可笑的’。

这对我们的党是多么严重的诬蔑和歪曲！

我们不必引用关于英国工党的具体材料，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工党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者，它们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决不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它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得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只有一小撮右派分子，才是口头上拥护共产党，暗地里却在干反共的勾当。“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说得对：“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象在共产党的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同志说：“谁反对共产党，我就同他拚命！”这是真正人民的声音，这就是给右派分子罗里波的回答。

罗里波大概知道，所谓英国工党的例子，是不堪一击的，紧接着他又举出了有关苏联的例子。他在咒骂了我们伟大的朋友苏联人民和斯大林以后，下结论说：“‘反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来已是可笑的了，但在当年却奉为天书，谁敢说个

不字。”

誰都知道，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錯誤，但对待斯大林的錯誤有兩種立場，兩種态度。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为消除斯大林的錯誤的后果，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們，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糾正錯誤的努力。然而西方資產階級、修正主义者却借反斯大林或者反所謂“斯大林主义”为名，来反对无产階級專政和馬克思主义。他們以反对斯大林为幌子，实际上是反对斯大林曾領導人民保卫过、建設过的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分裂无产階級的国际团結。斯大林虽然犯过严重的錯誤，但他仍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只居于第二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只是批判和糾正斯大林的錯誤，并不是“反斯大林”。“反斯大林”是国际舞台上的牛鬼蛇神所主演的。

罗里波举斯大林为例，除了表明他同西方資產階級、修正主义者同一鼻孔出气以外，还暗指着中国共产党也犯了象斯大林那样的錯誤。因此，他要說反对中国共产党不是反革命。

这同样是荒謬无稽的。我們党的工作尽管还有缺点和錯誤，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們的党并没有犯过象斯大林后期那样严重的錯誤。即以肃反來說，我們党的路綫方針政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既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又保护了好人。当然从斯大林后期的錯誤中，我們的党吸取了十分重要的历史經驗。但右派分子夸大我們党的缺点和錯誤，企图搞垮党，这种阴谋詭計，必須彻底粉碎。

由此可知，罗里波所举的兩個“例子”目的都在于攻击我們的党，煽动对党不滿、立場不穩的人起来反党。照这个右派

分子的“理論”，反共不是反革命，那当然是“革命”了。这就是罗里波沒說出来的本意。这同有些右派分子把整风运动說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革命运动”沒有兩样。右派分子同人民沒有共同的語言，他們总是站在同人民相反的方面說話。人民說是反革命，他們說是“革命”。他們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他們的謔言都是互相合拍的。

二

罗里波举了兩個“例子”攻击共产党还不滿足，他更进一步从党的性質、任务，从党的历史等方面来歪曲我們的党，制造所謂“兩种共产党”的謬論。下面还是拿出这个右派分子的原話来看看吧。

“‘共产党’就其观念來說有兩種：抽象的絕對正确的共产党和具体的在某一時間由具体的人組成的人组成的共产党，抽象地給共产党下定义时，总是用着漂亮的字眼：‘工人階級先鋒队’‘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党’‘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的共产主义者的战斗联盟’等等。这样漂亮的党，我們干嗎要反对？美好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我們何必离开它？面对如此理想的党，整风岂不变成‘无的放矢’了嗎？但在某一国家具体到某一時間，由一定的人組成的人组成的共产党，并不象他的定义那样單純。”

請看，右派分子罗里波居然这样狂妄地嘲笑和攻击我們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

我們認為，“抽象的”共产党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共产党是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結合的产物，是由具体的人即工人階級的先进分子組成的，而不是什么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在我們的国家和各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共产党正領

导人民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领导工人階級进行反对压迫者、剝削者的艰苦斗争。正是罗里波認為不“那样單純”的“具体的”共产党，为人类发展前途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今天，以各国“具体的”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經是一股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洪流，使历史車輪迅速向前滾动。共产主义已經不是美丽的幻想，而是不久就会来到的现实。讓右派分子和一切共产主义的敌人去哭泣、去发抖吧！

我們的党是始終同人民在一起的，而罗里波为什么要把共产党分为“兩种”呢？他的阴谋是：

第一，攻击我們党的綱領，歪曲我們党的性質。我們党的总綱一开始就規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階級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階級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罗里波却誣蔑为仅仅是“漂亮的字眼”。为实现我們党的綱領，无数共产党员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我們的党还要繼續艰苦奋斗，团结广大群众，把中国建設成为一个偉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一步实现共产主义。右派分子是害怕这些事实的。他們陶醉在资产階級“理想王国”的美夢里，以至于蒙瞶不醒，白日說夢話。

第二，借拥护抽象的党为幌子，反对正在领导我們事业的共产党。右派分子都要尽花招，以掩盖自己的丑惡的嘴臉。罗里波也正是这样。他假惺惺地說不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实际上这个右派分子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正有深仇大恨。

罗里波还說：“据我目前的知識来判断，在1927年說‘反党就是反革命’是正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初期，共产

党的确接近于定义。”我們用罗里波颇为得意的句子來說：“这是很可笑的。”

1927年，我們党还是在幼年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綫，使党和革命遭到了巨大的損失。反对陈独秀的路綫，不但不是反党，而正是符合革命利益的。从罗里波的反动立場看来，他当然欣賞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从遵义會議以来，我們全党的馬克思主义水平在同“左”、右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党团結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圍，使革命事业迅速向前发展，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但罗里波認为抗日时期，解放初期，共产党只“接近于定义”。这又是多么惡毒的誣蔑！照这个右派分子的“邏輯”，三十多年来，共产党走的是“下坡路”；到目前，共产党已不符合它的“定义”。因此，他認为反共不是反革命。这同样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場，他是站在同人民完全相反的立場上来看事情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開幕詞中說：“在两个革命的實踐中，証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現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綫是正确的，我們的党是一个在政治上成熟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們的党現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結、更加巩固了。我們的党已經成了团結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核心力量。”正告罗里波和一切右派分子，你們的誣蔑和歪曲是徒勞的。

我們的党要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不断揭露、批判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錯誤。整风正是为了提高全党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而罗里波却用整风說明党不符合“定义”，說什么“面对如此理想的党，整风岂不变成‘无的放矢’了嗎？”企图歪曲共产党，歪曲整风运动。右派分子都有一种阴

險的企图，只要有空子可鑽，凡事都想用来証明共产党“糟透了”，但往往弄巧成拙。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整风运动恰恰証明了党的偉大、堅强。因为任何剝削階級的政党，都不可能也不敢开展这样一个批評自我批評的运动。

罗里波还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来为他的反动的“两种共产党”的謬論作証。說什么“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党在去年十月前，就說它很符合共产党定义的要求，很难說反对它就是反革命。”我們知道，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領導犯了严重的錯誤，但除了少数象納吉那样的叛徒外，大多数劳动人民黨員并没有背叛社会主义。“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劳动人民的不滿，来反对劳动人民党，企图推翻无产阶级專政。罗里波虽然先立一块“此地无銀三百兩”的牌子，裝成不贊成“十月暴乱”的样子，但他的“反共不是反革命”的“理論”，正为霍尔蒂之流的反革命分子洗清血手。

由此可見，罗里波所謂“两种共产党”，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反共謬論。

三

右派分子罗里波在举了“例子”、提出了“理論”根据、暗示出了“反共不是反革命”的荒謬“結論”后，就直接攻击我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給我們党加了几条莫須有的罪名；如果罗里波之流統治天下，那真是要杀共产党員了。讓我們看看他是怎样进行造謠誣蔑的：

第一，他說：“很多报上的文章用共产党的光荣的过去来証明今天及以后也和过去一样正确，这是很自然的，但都很不对头……看到了黨員的見解便認為是群众的見解，看到了工

人的見解便認為是農民的見解……”

右派分子是仇恨我們黨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我們黨的偉大的成就，就是他們的可恥的失敗。正因為這樣，他們發出“一團漆黑”“只許講缺點，不許講成績”的叫囂。羅里波也正是這樣。我們黨總結革命歷史經驗，指導今後的工作，在他看來就是“用共產黨光榮的過去來證明今天及以後也和過去一樣正確”。我們黨進行革命傳統的教育，教育黨員和人民群眾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在他看來就是“念念不忘過去”了。右派分子和我們是沒有共同語言的。我們黨的偉大，光榮，正確，是事實證明了的，誰也抹煞不了。我們黨並不滿足於已有的工作成就，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黨員如果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應該予以批判、教育，但這和羅里波的惡意誣蔑毫無共同之處。

羅里波還歪曲、挑撥我們的黨群關係、工農關係。按他的說法，我們的黨只听黨員的話，我們的黨是脫離廣大群眾的。這純屬捏造。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這就決定了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根本路線是群眾路線。儘管有些黨員還有脫離群眾的不良作風（這是必須改正的），但是，我們的黨是始終一貫地和人民群眾保持着緊密的聯繫的；我們黨的政策是根據群眾利益，集中群眾智慧制定出來的，我們黨不但听取黨員的意見，而且也听取群眾的意見，不但通過黨員來反映群眾的意見，而且还直接听取群眾意見；我們採取了多種多樣的方式和方法來听取群眾的意見。顯然，羅里波惡意攻擊我們黨不听

取群众意見，是毫无根据的。我們党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这正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工农联盟是我們国家的基础；工人階級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我們的党听取工人的意見，同时也听取农民的意見，他們的見解基本上也是一致的。右派分子誣蔑我們党“忘了农民”，似乎只有資產階級甚至已被推翻的地主階級才能代表农民。但是，农民反右派斗争的事实（如广东农民反击右派分子罗翼群的斗争），反地主、富农倒算的斗争，却正給右派分子一記有力的耳光。罗里波的“見解”虽然沒明說，但也充分表明他是站在誣蔑我們党“忘了农民”的右派分子一边的。这些右派分子之所以这样叫囂，其目的是要挑撥我們党和农民的关系，瓦解工农联盟，从而妄图达到破坏我們国家基础、破坏人民民主專政的阴險目的。

第二，說我們党“在各种副职的名义之下总攬一切特权……”

这同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有什么区别呢？按照右派分子的“高見”，黨員通通要从領導崗位上撤下来，甚至連副职也不能担任，否則就是“总攬一切特权”，就是“党天下”。換句話說，无產階級專政“要不得”，共产党应“下台”，應該讓資產階級專政，讓右派分子“上台”。这正是右派分子的白日美夢，但可惜，那是永远不会實現的。

在实际工作中，也可能有某些黨員对党外人士的职权不够尊重，这是應該糾正的。但小部分人的缺点和錯誤能得出“总攬一切特权”的結論嗎？

还必須指出，罗里波对北京師大的党委进行了惡毒的攻訐，說什么“純粹由……之流所組成的党”，反对它“怎見得是

反革命?!”要知道，罗里波之所以如此仇视师大党委，如此狂妄地公开叫嚣，他的企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煽动人们反对党委，来威胁党放棄在师大的领导权。当然，他的这种恶毒企图同样是不会实现的。

第三，所謂“魚米之鄉吃南瓜而肚子脹，吃草根而餓死農民”。

这里罗里波把我們新农村的面貌繪声繪影地勾成了一幅非常可怕的图画。他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也狂叫我們的农村“一团糟”。但是这种反动謊言是經不起事实的反駁的。

誠然，去年广西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某些领导干部的严重失职，致使灾区一些农民餓死。这当然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但是必須指出，这种現象，在我国只是个别的現象；其次，我們党和政府本着对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对于有关失职人員都給予了严肃的应得的处分。因此，如果把这种个别的現象夸大為普遍的現象，說什么竟連“魚米之鄉”也餓死人了；这显然是別有用心地對我們今天欣欣向榮的农村的歪曲；也是對社会主义制度的直接挑战。就以尽人皆知的黃泛区人民的今昔生活來說，就可以明白右派分子是怎样睜开眼睛在說瞎話。黃泛区人民，从一九三八年万惡的国民党反动派挖掘花园口，决了黄河堤以后，就連年遭水灾，过着顛沛流离、飢寒交迫的生活，其中冻死餓死者不計其数，易子而食者层出不穷，演尽了人間慘劇。但是，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黃泛区人民翻了身，河堤修好了，大大战胜了水灾的威胁。他們和全国农民一道建立了农业合作社，过着幸福安樂的生活。黃泛区人民的生活由昔日之地獄变成了今日之天堂，这一个偉大的变化，不正是有力地証明了我們党对于灾区人民、对于农民的高

度关怀么？铁的事实是誰也抹煞不了的。

由于長期遭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殘酷剝削和統治的結果，我国农村破产，农民一直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在这样一个极端贫困的基础上，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要想使农民生活提得很高，这是不可能的。广大农民的生活，在今天还不很富裕。但比之解放前，则大大地改善了，而且还在繼續提高。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的生活才得到了保障。社会主义才是农民幸福的源泉。而罗里波却偏偏要把我們的新农村描写成一幅可怕的图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很清楚的。右派分子之所以那样热衷于为农民“叫苦”，无非是想否定我們党的农村工作，否定农业合作化的偉大成就，为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制造借口。可見他們为农民“叫苦”，实际上乃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他們是农民凶惡的敌人。

四

右派分子罗里波所販賣的反动貨色已經十分清楚了。他巧妙地用暗示的手法，惡毒地攻击我們的党，宣傳“反共不是反革命”的謬論。彭真同志曾經指出：“右派集中力量攻击党，要党退出領導或暂时退出領導，是一个很毒辣的阴谋詭計。”他又說：“殷鑒不远，1927年蔣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在‘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以前，甚至在大規模地公开地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以后，不也是說他們只是反对共产党嗎？不也是把他們自己标榜为‘真革命’嗎？希特勒不也是以反共起家的么？連日本帝国主义当日本侵略中国，不也說它只是为了反共嗎？右派分子也和蔣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一样深深地知道，搞垮了共产党，取消了共产党的領導，人民

就好对付了，社会主义自然就搞不成器了，资产阶级右派妄想的反共阴谋就容易实现了……我们应该同陈独秀‘宽洪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吗？绝对不能。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所有右派分子当蒋介石、汪精卫对待，而是说右派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的性质严重和恶劣，以及手段的毒辣。”（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代会上的报告）罗里波的“反共不是反革命”的谬论正是阴险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理论”。我们认为反对共产党，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实质上就是反革命。

人民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人民的铁拳将粉碎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共阴谋。我们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日益蓬勃地向前发展。右派分子只有及早回头，否则将被历史所抛弃。

附 录：

岂不令人深思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呵欠伯等

我本想用“反共就是反革命吗？”来做标题，但考虑到那些没有头脑的读者断章取义，也怕那些稿费爱好者把头砍去领赏，因而采用这个不太醒目的标题。

首先举一个不太客气的例，设想英国工党说：“反对工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这是很可笑的。但难道英国工党不正是如此宣传的吗？难道他们不能找到一些工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他们这一论点吗？也许以英国工党比共产党不大雅观，我们另举一例：当年斯大林在没有头脑的人的“乌啦”声中，岂不也是神气十足，有多少由于反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见解而被当做反革命砍去了头（“胜利者代表大会”

參加者在会后兩年之間被砍去了一半，選出的中央委員70%被殺了頭)。“反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來已是可笑的，但在當年却奉為天書，誰敢說個不字。

“共產黨”就其觀念來說有兩種：抽象的絕對正確的共產黨和具體的在某一段時間由具體的人組成的共產黨，抽象地給共產黨下定義時，總是用着漂亮的字眼：“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全人類利益的黨”“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共產主義者的戰鬥聯盟”等等。這樣漂亮的黨，我們手嗎要反對？美好的共產主義的道路，我們何必要離開它？面對如此理想的黨，整風豈不變成“無的放矢”了嗎？但在某一國家具體到某一時間，由一定的人組成的共產黨，並不象他的定義那樣單純。據我目前的知識來判斷，在1927年說“反黨就是反革命”是正確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初期，共產黨的確接近於定義。（我不得不如此贅述）匈牙利的勞動人民黨在去年10月前，就說它很符合於共產黨定義的要求，很難說反對它就是反革命。（某些敏感的讀者，會在這里嗅到了似乎我贊成十月暴亂，如此我勸他快去領賞，但他犯了明顯的邏輯上的錯誤。）很多報上的文章用共產黨的光榮的過去來證明今天及以後也和過去一樣正確，這是很自然的，但都很不對頭，同樣的一個黨如果也象斯大林那樣念念不忘他的過去，看到了黨員的見解便認為是羣眾的見解，看到了工人的見解便認為是農民的見解，在各種副職的名義之下總攬一切特權……這樣純粹由張剛、張斧、彥平、孫偉、金鏗、郭琪·之流所組成的黨，那便很難說它符合共產黨的定義，請問反對這樣的共產黨怎見得是反革命？！

也許有人問：是否應該反對目前的共產黨呢？共產黨不領導又由誰來領導呢？請同志們不要閉着眼睛回答。雖然最近幾天報上“工人”說話了，“覺悟的”工人羣起而應戰，大叫“這是為什麼？”民主黨派的意見正在偷偷撤退，然而在魚米之多吃南瓜而肚子脹，吃草根而餓死農民的消息，確有所聞，報上却只字未見，豈不引人深思。

（1957年6月11日）

* 這些同志大部分是斯大黨委負責同志。——編者

駁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破壞社会主义 國家團結的謬論

外交學院研究生畢業班集體創作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利用整風的機會，向黨和全國人民發動了猖狂的進攻。他們在國內問題上，反對黨的領導，反對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在國際問題上，反對國際團結，特別是反對社会主义國家的團結。

他們企圖把中國人民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拖回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為此，右派分子不僅對我們黨和社会主义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而且針對社会主义國家的團結，特別是中蘇兩國偉大的團結，大放厥詞。

聽到或看到這些破壞社会主义國家團結的謬論，令人萬分憤慨。為了維護黨的領導、捍衛社会主义的道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会主义國家的團結，本文想着重針對我院右派分子在國際團結問題上所散布的具有代表性的反動言論，給以堅決的反擊。

*

*

*

右派分子把社会主义國家的關係描繪得漆黑一團，亂七八糟。他們硬說社会主义國家的關係是“不平等”的；說什麼“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在蘇聯面前是一副奴才相”；“蘇聯扼住了中國的脖子”；“十二年後，中國強大了，可以獨立，與蘇聯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中國應當成為“東方的南斯拉夫”等等。

顯然，在這裡，右派分子對於我們社会主义國家的對外政

策以及它們之間的关系，进行了惡毒的歪曲和攻击。因此，完全有必要首先弄清楚这些問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給各兄弟国家帶來什么好处？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階級国际团結的基础上的。具体地说：这种关系所賴以建立的具体原则就是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領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而偉大的共同的目标又使它們能够实现亲密无間的团結和合作。同时，它們之間的关系也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質所决定的。所以，对于一貫忠实于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则的工人階級国家來說，在它們之間建立这种关系是完全自然和合乎规律的。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就預見到：“社会主义秩序的建立將基本上不但改变一个民族內部人与人的关系，也將基本上改变民族与民族之間的关系。”——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質出发，才得出这个科学的結論的。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曾經指出：“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是真正从民主主义立場出发的，它标志着各民族的平等，主張民族自决，主張各民族自由的結成同盟的原则。”。

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终于在俄国实现了！从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不但在自己的国内实现了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②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編“列宁論民族問題”，第283頁）。

完全的民族平等，而且在国际上也为反对民族压迫和剥削，为争取和世界各国民族建立真正平等、互助和合作的关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四十年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出发，支持和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从而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正是由于苏联的鼓舞和支持，使得一系列的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此，在世界上才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新型国际关系。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预见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大家也知道，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上是互通有无，促进共同的经济高涨；在政治上是团结互助。这种关系不但丝毫不会伤害这些国家的独立，相反的，它却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独立，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中国的例子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例如，苏联帮助我国建设一百五十六项重大工程；给我们数亿卢布的贷款；把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交给我国；把新疆中苏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全部移交我国；帮助我国建立谷物农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用头等技术来帮助我们进行建设……所有这些，不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突飞猛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么？正如李富春副总理所说：“苏联的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是我国能够迅速地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帮助我国设计新

企业和供应我国建設所需的設備，以及对我国的其他一系列的援助，表现了最偉大的和最崇高的国际主义。”^①

自然，右派分子是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的。他們只顧睜眼說瞎話！他們硬說“苏联專家滲入中国各部門，連教育部門也如此。我們的机密他們了若指掌。这是很危險的。”这里，右派分子故意把苏联派遣專家帮助各兄弟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进行建設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与帝国主义国家借派遣各种所謂“顧問”（实际上是特务、間諜）去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行为混为一談。右派分子这种論調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之流所唱蓋了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調子又有什么兩样呢？这除了是对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惡毒的攻击和污蔑以外，又能說明什么呢？

社会主义国家間的新型国际关系除了表現在經濟上密切合作以外，还表現在政治上的团結和互助，例如締結友好互助的条約和協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先后与其他兄弟国家締結了这种性質的多边和双边的同盟条約。在我国建国第二年，即一九五〇年，苏联和我国就簽訂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这些条約不但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女誼，保證了它們的民族独立，有利地抗击了侵略者，并且也鼓舞和支持了其他国家爭取民族独立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斗争。

可是，右派分子却硬說什么“中苏友好条約是針對日本的，所以影响了中日人民的关系。”我們不禁要問，这里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日本？条約本身已經明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① 李富春：“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報告”。

在条約的序言中写道：中苏兩國要“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結的国家之重新侵略。”^①原来，条約所反对的并不是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而是被重新武裝起来的、富有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它的支持者。我們同时也要看到，这个条約不仅是远东和平的支柱，而且也是日本人民爭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支柱。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特别是中苏兩國偉大的团結，使得日本日益蓬勃发展的爭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强大的鼓舞力量。这些便是条約所具有的偉大历史意义。由此可見，右派分子那种說法，显然表明他們企图歪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的历史意义，并对中苏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进行惡意的挑撥。

右派分子不仅敌視社会主义国家亲密无間的团結，抹煞和歪曲苏联对兄弟国家大公无私的援助，而且也极端仇視苏联之成为这个陣营的首腦。他們說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不一定永远是苏联。”他們还公开这样表白：当他們发现兩個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发表的某些公报中沒有提到“以苏联为首”等字句时，就感到“高兴”。

其实，中心不中心的問題，正如“再論无产阶级專政的历史經驗”一文所指出的“不是任何人为地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現社会主义国家，是必然的規律。而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建成，則首先具体地体现了这个規律。因此，我們才說苏联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老大哥。

① 新华时事叢刊：“中苏友好新条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以苏联为中心，除上述原因外，也因为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建設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程上，走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累了具有普遍性質的寶貴經驗。这些經驗是：要有党的領導，要經過革命斗争夺取政权，要建立无产阶级專政，要有計劃地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和社会主义文化，并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后，要坚持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我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都驕傲地称苏联所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的道路，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凱歌。”。

当社会主义陣营出現以后，由于苏联是这个陣营中最强大的工业国和最富有斗争經驗的国家，因此，它能够給各兄弟国家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以最大的援助。这也是它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弟弟向这样好的哥哥学习，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那些仇視我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会把这些好事說成是坏事。同时，他們害怕强大的苏联对各个兄弟国家所进行的大公无私的援助，会繼續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因此，他們极力丑化苏联对兄弟国家的援助，顛倒黑白。他們满怀惡意地把苏联对中国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和美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援助”混同起来，煽动那些認識模糊、立場不坚定的人，反对苏联和它在社会主义陣营中的領導作用。

現在，在鉄的事实面前，在真理面前，右派分子已經無理

⊙ “再論无产阶级專政的历史經驗”。

⊙ 同上。

級国际主义和資產階級狹隘民族主义在根本性質上的对立，反映了社会主义立場和帝国主义立場的根本对立，也反映了兩種根本不同的世界觀的对立。为了徹底粉碎右派分子在国际团结問題上所散布的謬論，杜絕右派言論的市場，扩大并巩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陣地，完全有必要进一步揭露右派分子破坏国际团结的言論的階級實質，同时指出它的危害性。

我們知道，資產階級民族主义是剝削制度的产物。資產階級的民族觀——資產階級对于民族的看法和处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从資產階級的階級基础和狹隘的階級利益出发的。它“在自己的国内，要使整个人民的利益服从于它这一个階級的利益，把它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层階层的利益，放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并企图由他們壟斷‘民族’这个名义，宣布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为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时，在国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层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企图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压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为牺牲……”^①这种民族觀对于比它强大的国家，就表现为狹隘民族主义；对于比它弱小的国家，就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

右派分子呢？他們断言，我們向苏联学习并接受苏联給予我們的各种援助是“沒有民族气节”，是“殖民地气象”，因此，他們就說什么“十二年后，中国强大了，可以独立，与苏联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等。現在看来，这些謬論真是不折不扣

^① 刘少奇：“論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第3—4頁。

地表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伟大的列宁曾经把具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为“精巧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它在最漂亮与最好听的名词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的分裂。”^①今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提出民族主义的主张，是十分反动的。因为它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提出这样一些主张的人，企图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下，牵着无产阶级跟他们走，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这种作法会使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遭到破坏。在今天来说，他们就是借用反苏的口号，企图把中国拖出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伟大的国际团结，特别是中苏两国的团结，从而使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侵略的面前，处于束手待毙的地位，使全世界进步人类也处于同样的地位。由此可见，今天，右派分子所狂吠的什么中国应成为东方的南斯拉夫的问题，也正是在反苏和企图瓦解、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伟大团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各兄弟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努力，使得在争取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方面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今天，在某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南斯拉夫已经和其他兄弟国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且也相应地采取了某些步骤来改善彼此的关系。

最后，必须指出，右派分子之所以大肆宣传南斯拉夫与其他兄弟国家某些不一致的作法，是有着极其阴险的目的的。我们只要看看这些右派分子一方面在拼命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对中苏友谊，另一方面却在费尽心机，大肆宣传什

^① 列宁：“以精巧的民族主义来欺骗工人”（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列宁论民族问题》，第103页）。

么“美国是年青力壮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有“完美的民主和自由”之类的谬论，便可察其真意了。说到这里，关于右派分子究竟企图把中国引向何方的问题，难道还不明白么？

今天，谁要是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中苏两大盟邦的友谊，谁就是准备犯下破坏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滔天罪行！

全中国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必须以坚决的态度来保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决不允许右派分子把中国拖上一条灭亡的道路！

論个性解放

——駁右派言論

外交学院1957年本科毕业生集体创作

緒 言

在这次党整风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次全面的猖狂进攻。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猛烈地抨击了我国的现存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企图在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方面燃起一把邪火，作为他们全面进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部分大学生面前，恶意地举起他们反动的“个性解放”的旗帜，歇斯底里地叫嚣什么“我们的精神仍然被残踏着”，“我们不仅要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个性的彻底解放”，企图以此煽起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对现政权和现存制度的仇恨心和反抗心理，并进一步把他们团结在自己“个性解放”的旗帜下，来支持并跟随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这在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識青年的思想領域方面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一場資產階級反动派与无产階級爭奪青年的激烈战斗。因此,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的领导,我們不仅要从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坚决粉碎資產階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而且要在精神思想領域方面扑灭他們燃起的邪火,砍倒他們的反动的“个性解放”的旗帜,保持和发揚中国人民和知識青年的社会主义精神面貌。因此,从理論上来彻底駁倒他們的反动謬論,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論意义,而且有着更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那么,什么叫做个性呢?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形成的学說告訴我們,个性乃是生存在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一定具体社会下的具有自己的一切品質的具体的人;而在階級社会里,这种具体的人必然是一个階級的人,这就必然具有階級性。刘少奇同志指出:“一定集团的人們,長期站在一定的階級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長期的生产着,生活着与斗争着,即产生他們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們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与其他集团的人們不同,或者相反。这就形成了人們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階級性。”^①因此,任何人的个性,在階級社会里都必然是具有一定階級性的个性,而沒有超階級的个性。不仅如此,而且階級性还是个性中最重要、最本質的东西。不同階級的人的个性固

^① 刘少奇,“論共產黨員修养”,第九十一頁。

然如此，就是同一階級的人的個性也不例外。所以階級性是個性之內核，個性的其餘部分則都處於從屬的、依附的、被決定的次要地位。

既然個性帶有強烈的階級性，則“個性解放”的口號也必然帶有強烈的階級性。在階級對抗的社會里，存在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統治與被統治；這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不平等，就必然造成個性解放問題上的不平等；要就是統治階級的個性解放，要就是被統治階級起來推翻統治階級而取得個性解放。歷史上從來沒有存在過包括對抗階級在內的全社會的個性解放。和民主、自由一樣，在階級對抗的社會里，個性解放作為一個階級特權而存在。

個性和個性解放的階級實質第一次為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第一次為共產黨所繼承和掌握，成為共產黨觀察和對待個性與個性解放問題的有力武器，並從而對一切人們的個性和所有社會的個性解放問題提供了一個最科學、最真實的認識方法。

然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却故意將階級立場問題掩蓋起來（這樣可以模糊一部分青年學生的認識），而實際上又最露骨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提出抽象的“個性解放”問題。他們戀戀不忘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把資本主義社會說成是人人都有個性解放的王道樂土，而又回過頭來埋怨我們中國沒有經過“文藝復興”時期。說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們沒有得到“個性解放”。但是，“個性解放”的口號從來就具有強烈的階級性，這一點我們已經從理論上給了足夠的論證；我們還可以從整個階級社會發展的歷史上給予更有力的證明。

在奴隶制时代，奴隶阶级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存在，根本没有什么个性解放的问题；在封建时代，农民成为王权和神权的牺牲品，世代地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又何言精神上的个性解放？及至十五、十六世纪的封建末期，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但当时教权和王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顽固地束缚住新兴资产阶级的这个要求，因而产生了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于是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思想内容的人文主义的思潮流行起来了。这个思潮反对人们隶属于宗教的意识形态，要求人类精神能力的解放，歌颂摧毁一切外在的障碍而体现个人意志的英雄性格。就这样，作为封建神学的对立面——个性解放的口号被提出来了。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口号，把一切反封建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追求本阶级的利益，为建立本阶级的社会披荆斩棘，直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因此从反封建来看，这个口号在当时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是必须指出，这个口号一开始就带有它的阶级局限性，因为它所追求的只是一个阶级——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

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口号，在以后继续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到了产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个性解放的口号被解释为全体人民已获得的成果这一点，就明显地成为谎言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尖锐地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则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①

及至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则连自由、民主的一

① “马克思文选”第一卷，第二十三页。

点残余也被消灭干净了，帝国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全面的反动。至于法西斯主义，则这个字的本身的含义就是棒斧，就是暴力和威权的象征，它是“最反动、最主张民族沙文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财政资本家底公开的、恐怖的特政”。在此特政下，哪里有什么人民的个性解放！

以上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部分知识青年所炫耀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个性解放”。

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帝国主义分子诬蔑社会主义要消灭个性，说社会主义者想以创立一种人人一样的平凡的集体来代替鲜明的个性；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个性。他们骄傲地声明说：“从劳动再不能变为资本、货币和地租的时候起，简言之，从它再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即从个人财产再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说道：“那么，你们也就是承认说，你们认作个性的不外是资产者……而这样的个性确实是应当被消灭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指着资本主义关系说：“资产阶级却说消灭这种关系就是排除个性和自由哩！它倒是的，是的，正是要排除资产阶级的个性，要排除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②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我们要排除和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而根本不可能给它以个性解放。

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来说，却是个性能够得到彻底解放和充分发展的社会，他们摆脱了剥削，第一次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参与管理国

①、② “马克思选”第一卷，第二十四页。

③ “马克思选”第一卷，第二十三页。

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設社會；他們能最充分地發揮他們的才能、特長和愛好，來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們的空前高漲的勞動熱情，創造了無數的奇蹟。不僅如此，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意識地培養和發展人們的優美個性，正如高爾基所說：“我們關心的，是要創造一種明朗的社會主義的個性。”蘇聯著名教育家馬卡連柯也贊揚社會主義制度下個性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說：“只有在對個性有全面認識，動員它的一切品質去努力完成擺在它面前的任務的條件下，才能使個性達到正常的發展和解放。”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不存在抽象的個性解放，而只存在着階級的個性解放；所不同的只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個性解放，在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個性解放，而是千百倍地優越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個性解放。這不僅表現在享有這種解放的人在數量上占社會的絕對多數，而且表現在它不是以一個剝削階級的個性解放來代替另一個剝削階級的個性解放，而是以廣大勞動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的個性解放來代替過去一切剝削階級的個性解放，同時還表現在它將把整個人類引向個性徹底解放的大同世界——消滅了任何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在中國也得到了同樣的體現。幾年來的封建統治，封建禮教和倫理道德把人民特別是青年緊緊地捆綁在封建牢籠上，得不到個性解放。1919年“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舉起了民主、自由的火炬，爭取個性解放的口號震撼了千萬顆受壓迫的青年的心，他們衝出封建牢籠，向腐敗的軍閥制度舉起了投槍，他們要求尊重人民的權利，要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和不平等的思想，要求人格上的平等。因此，

当时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等口号在唤起人民的觉醒，在反对封建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在国民党残酷统治的年代里，民主、自由、个性解放更成为泡影，白色恐怖籠罩着整个社会，失学、失业、飢餓、警棍、水籠成为青年学生的經常的遭遇。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和教育了中国人民和青年，它給中国人民和青年指出了一条道路：要争取个性的解放，首先要争取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解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社会的解放，因而也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个性解放。广大劳动人民一旦从个性被束縛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就奔放其他們空前高漲的革命热情，在党的领导下，着手建設自己的美滿社会。

二

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无视这一鉄的事实，歇斯底里地叫嚣“我們的精神沒有解放”。外交学院的一个学生在一次关于个性解放問題的座談会上发言說：“这反映了一个根本問題，即青年的个性解放問題。”接着他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青年人的个性不能完全解放呢？”至于西北大学的馮增烈則更象煞有介事地說：“这次整风运动相当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个性解放。其所以是个性解放，因为中国未經过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即意味着个性解放）。所以这次整风运动就有补课性質。”总之，他們否認中国人民已經获得个性解放这一事实。

但是第一部分所叙述的历史已經說明了，中国人民的个性解放問題，已是一个在根本上解决了的問題。为了更进一步

駁斥這一右派言論，我們還可引舉解放前后的更多歷史事實。首先我們要問：在解放以前，中國共產黨人是不是主張中國人民的個性解放呢？早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就回答了這一問題，他說：“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其實是不對的。”^①毛主席進一步指出：“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殘酷地來束縛着中國人民的個性發展……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任務，則正是解除這些束縛和停止這種破壞，保障廣大人民能夠自由發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個性。”^②毛主席甚至把個性解放問題提到這樣的高度，即認為：“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③（着重點是引用者加的）這說明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一直就把“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問題視為自己光榮的革命任務。中國共產黨在實際上正是按照這樣做的。正是由於中國有了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並且取得了這個革命的勝利，所以就實現了“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歷史正是這樣證明的。解放後，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參與了政權的管理，憲法規定了人民的廣泛的民主權利；在經濟上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和正在實現着社會主義工業化；在文化上貫徹着為工農兵服

①、② “毛澤東選集”第1081頁。

③ “毛澤東選集”第1083頁。

務的方針；最近，黨又提出了文化、科學、藝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所以現實又是最好的證明。在目前，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個性，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而且我們要促進其發展。張明山、王崇倫、李順達、黃繼光、丘少雲等不都是只有在解放了的中國才能出現的具有優美高尚個性的人嗎？我們不也是正以他們的優美個性來教育廣大人民嗎？廣大人民不也是實現着自己的願望、在以高度的積極性建設着社會主義嗎？特別是青年，得到了黨和政府最大的關切。憲法明文規定：“國家特別關懷青年的體力和智力的發展。”在此關懷下，中國青年得到了健康的成長，他們的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個性都得到黨和政府的培養。1955年召開的全國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大會的一千多位代表的模範事跡，就表現出中國青年在各行各業中的英勇勞動。其中就有不少知識青年的代表，特別是有一位青年數學家，由於他從小熱愛數學，在這方面表現出他的特別愛好和天資。於是就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和大力培養，結果在短短幾年內就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在解放前的舊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的。

新中國的教育事業也貫徹了個性全面發展的方針，這方針在以前的任何社會包括右派分子所最贊賞的資本主義社會都不可能實現。封建時代的教育方針大體上說就是個性束縛的方針；資本主義時代的教育方針則是個性的個人主義的放任和放縱，青年的個性得不到正常的健康的發展。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里，才可能真正培養青年在德育、智育、美育、體育和綜合科學技術教育上的全面發展，才可能用無產階級的優美個性來改造其它階級的個性，來豐富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的個性。解放八年來，中國的教育事業在這方面已經

獲得了輝煌的成就。

這些所列举的事實，徹底粉碎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沒有人民的個性解放的謊言。至於馮增烈的所謂“理論”，一方面只能說明他對歷史的十分無知；另一方面則是說明他最露骨地追求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

中國廣大人民得到個性解放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但右派分子却歪曲事實，發表了許多右派言論。這些右派言論，可歸納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個性與階級性關係上的問題。例如有些右派分子說自己自解放後“就此打下了十八層地獄”，並說“我的血冷了，我的心死了”。外交學院右派分子孟思訓則說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張新田則說：“我們只有順的自由，這還有什麼自由呢？”等等。我們從這些右派言論中聞到一股濃厚的反動階級的氣息。試問：在今天的中國，是哪些人“被打下了十八層地獄”或感到“血冷了，心死了”呢？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等等。而廣大勞動人民則認社會主義為天堂，他們的心則隨着社會主義祖國的步伐的前進而跳躍，他們的血則充滿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廣大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並沒有“噤若寒蟬”，而是在歌唱自己的祖國、歌唱共產黨。但是，我們並不諱言：社會主義社會下廣大勞動人民的個性解放，是在排除了一些反動階級、反動分子的個性以後才實現的。可見，這些人們的階級嗅覺是多麼靈敏哪！這些人們的階級立場是多麼鮮明哪！他們站在反動階級的立場上，作出垂死的呼喚，他們對自己感到“不得志”。而對別人呢？把忠實於社會主義、忠實於黨講成“唯唯諾諾”“百分之百的順從”，“思想僵化”；把對反動階級、反動分子的堅決

斗争講成“冷酷无情”，“沒有人情味”；把优美的社会主义个性說成是“封建奴性”等等。他們仇視我們的專政，他們叫喊：“我恨，我恨那失去人性的人，恨那沒有人性的人！”多么刻毒的階級仇恨！他們把我們对反革命的鎮压，講成沒有人性。多么反动的人生觀！甚至他們不仅要呼喊，他們还要行动，他們要“推开身上的压土”，折断“這头的棍棒”，要“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叫嚣“这賬是要算的”等等。这一切不就更加暴露出他們的本来面目了嗎？解放后，我們把压迫人民、剝削人民的罪該万死的家伙如黃世仁、四霸天之流送进了坟墓，人民拍手称快；但現在右派分子却代他們說話，表示要“推开身上的压土”，从坟墓中爬出来，对我們的人民政权要怒、要罵、要打，还要杀，甚至要“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即要消灭現存的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事实上，他們不正是把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展开的猖狂进攻認为“阴云在消散，阳光將普照大地”么？他們不正是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看作“个性解放的补课”，看作“东方的文艺复兴”么？尽管他們的說法多种多样，但其反动本質只有一个：对社会主义反对到底，对资本主义瘋狂追求。这就是他們所要求解放的“个性”！这就是他們在个性解放旗帜掩盖下的猙獰的面貌。很明显，实现了这些人的“个性解放”，广大人民就要遭殃。

这就进一步証实了个性与个性解放帶有强烈的階級性。在我們的社会里，站在广大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立場上来看，我們的个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解放；但站在反动階級的立場上来看，則是被剝夺了个性解放。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反动階級和反动分子不滿和反抗这一事实，而广大人民首先是

劳动人民却要坚决保卫这一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类，个性与民主自由、組織性、紀律性、集体性关系上的問題。

在右派分子的武庫中还有另外一种言論，即認為党和政府沒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因此也就沒有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或由于他們的资产階級个性受到了抑制而認為我們的社會不民主、不自由；于是他們就以“民主战士”的身份出現，要求中国青年繼承“五四”的傳統，帶着“叛逆精神”来爭取所謂“民主自由”和“精神解放”。

馬列主义認為，在階級社會里，民主和自由是作为一个階級的特权而存在的，它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我們社会主义社會，民主是人民用来建設社会主义的手段，建設社会主义需要民主，事实上我們也存在着这样的民主，但这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主席說：“民主是对集中而言。”因此，我們的國家采取了民主集中制。

但是，右派分子們硬說我們的社會不民主，例如他們說，我們的宪法所規定的民主权利是“不存在的”，是“一紙空文”，是“名存實亡”。这是誣蔑。我們的宪法給予并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的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是前所未有的；但它确实未給予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权利，并且要对这种行动加以取締。宪法給予人民言論、出版、集会、結社的自由，但确实未給反动派以言反动論、出反动版、集反动会、結反动社的自由，而右派分子所要的正是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民主，对于这种民主来講，确实是“不存在的”。但不是“名存實亡”，而是根本就沒有許諾过。

右派分子又誣蔑說“民主实即党主”，但是我們則認為我

們的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人民坚决要求党的領導，認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爭得了現在的民主，也才能保持住这个民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图推翻党的領導，取消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而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但实际上，資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才是真正的資本家主哩！

右派言論家也同样說我們的社会不自由，例如外交学院就有人說什么我們的国家“只有面包沒有自由”，或者是只有“順的自由”，而这不能算自由等等。于是他們要为解放“神圣的人权和自由而斗争”！

其实，毛主席說过，“自由是对紀律而言”。絕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階級社会里，它首先是階級的特权；有革命者的自由，就沒有反革命者的自由。在我們中国也是如此，有建設社会主义的自由，沒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自由。对社会主义来講，确实“只有順的自由”，而沒有逆的自由。“只有面包沒有自由”的說法是一种誣蔑，在我們的国家里，既有面包也有自由；中国人民經過几十年的革命，推翻了剝削階級，取得了暖衣足食。这就是最大的自由。而在資本主义社会，連面包都沒有，何談自由？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要求民主自由为名，猛烈地攻击我們社会主义的組織性、集体性、紀律性，把它們說成是束縛个性解放的障碍。例如他們把我們的組織、集体說成是“大大小小的框子”；錢偉長則說是“划地为牢”，說我們这个集体中的“生活气息使人感到悶塞”，是“暮气沉沉”，是企图培养“个性清一色”。他們不滿意我們人民的团結，說什么“过去我国人民被人称作一盤散沙，解放后，我們都成了粘在一起的混凝土，一动也不能动，失去了个性和自由。”这一切，他們都是以戴

着資產階級右記的有色眼鏡來觀察現實的，以至把光明說成黑暗，把我們的集體看成為“牢”為“框子”，把我們祖國工業的飛躍發展，農業的大丰收，文化的繁榮，我們祖國面貌的偉大變革說成“暮氣沉沉”、“使人感到悶塞”。是的，這些確實使資產階級反動派“感到悶塞”，帝國主義分子也同樣“感到悶塞”哩！因為，我們正是依靠了這種堅強的集體、組織，依靠了黨的堅強的領導，才推翻了國民黨反動統治，並且仍舊要依靠它來建設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認為組織性、紀律性、集體性是自己的優美個性，這種個性非但不準備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因為無產階級認識到組織性、紀律性、集體性是力量的源泉，是打敗敵人的保證。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們，對集體、組織、紀律有着一種出自他們階級本能的仇視，這是一點不足為奇的。

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原來出身於小資產階級，他們習慣於自由散漫，個人主義，嚮往抽象的民主自由；他們要求極端民主，絕對自由，認為民主就是說了算，自由就是為所欲為，隨心所欲，實際上就是要求無政府狀態。他們把個性解放理解為極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而否認一切紀律。這種思想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根本不相容，它的危害性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社會主義的組織和集體，最後導致社會主義的瓦解，資本主義的復辟。所以小資產階級的這種思想在今天反動的。如果他們堅持這種錯誤，並採取行動，則將會淪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總之我們認為，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集體、社會主義的紀律，這是我們社會主義生活中的原則，它們與社會主義的個性並不違背而是一致的。沒有集體主義思想，就不可能發

展优良的个性。人們生活在集体里而不遵守集体的制度和紀律，那就失去了作为发展个性的各种有利条件。馬卡連柯曾說过：“良好的集体能培养出完美的、独特的、具有鮮明的个性的人。”

第三类，个性与客观規律性(必然性)关系上的問題。

具有无政府主义狂热的小资产階級分子要求个性的絕對解放，实即个性的任意放縱，不受任何制約。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资产階級对待个性解放的态度則建立在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或二元論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他們認為精神、思想决定客观存在，或至少應該二者并列，而絕對否認存在决定意識。因此他們認為作为精神、思想意識的个性應該支配客观存在，至少不受其制約。可是客观事实否定了资产階級的这一反动观点。

馬克思主义的哲学認為存在决定意識，虽然人們可以認識和利用客观規律，但是終究要受到客观規律的制約。作为精神、思想意識的个性，也不例外。首先，个性的产生就是客观規律作用的結果。当人类未出現以前，就不存在着人的个性。即使当人类社会形成后，人的个性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各不相同。很显然，社会主义社会下人們的个性大大不同于奴隶制下人們的个性。每个社会有每个社会的不同的人的个性。所以馬克思主义認為，人的个性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人的个性必然受到客观規律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但右派分子却叫囂着要求不要任何制約的个性解放，反对任何“圈子”、“框框”、“公式”。而这些“圈子”、“框框”、“公式”在階級社会里，可以理解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原則、标准，

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客观规律，而反对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恩格斯给我们指出：“自由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即只有认识了必然性，把握了客观的规律，依照一定的法则去行动，才能得到自由。要是企图把“个性解放”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要是企图逆客观规律而行，其结果只能是碰得焦头烂额。

那么，在“个性解放”问题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些错误认识呢？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的原因何在呢？就总的来说，原因在于阶级的根源和认识的根源，首先是阶级的根源。但在此前提下，具体问题还应具体分析。就其右派言论来讲，其实质一样，应一律加以严厉批判；但就其发表这种右派言论的人来讲，则有所不同。

首先，打起这面旗帜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进攻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一定政治背景的右派分子大头目，如章伯钧、罗隆基、钱伟长、费孝通之流。他们打起这面旗帜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阴谋活动，是全面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部署，是故意挑拨青年和党的关系，与党和无产阶级夺取青年，使青年成为自己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打手。例如钱伟长就对青年说，你们的“束缚太多”，青年要“不怕束缚”。其实就是鼓励青年反抗。他们之所以要如此做，是出自他们的阶级仇恨、政治野心，即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对待这种右派头子，我们要坚决斗争，彻底粉碎他们的右派言论。

但是，为什么右派头目提出这个口号就能得到部分青年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呢？这说明青年学生本身也有问题。这又

应具体分析。

首先，在中国目前的大学青年中有不少出身于剝削階級，即地主階級、官僚买办、資產階級。他們的家庭和親屬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后的几次大运动中曾是被斗、被鎮压的对象，在經濟生活上也可能不如以前了；他們本人虽然得到党和政府的很好安排，为他們提供了各种生活的和学习的条件，并給予教育，但他們之中仍有一部分人沒有得到根本改造，沒有叛变自己出身的階級立場，而对党和現政权心怀不滿和仇恨。他們仍然站在原来的反动的階級立場上，以他們那个階級的思想感情来对待我們的社会，以他們的反动的人性观、个性观来体味我們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們得出結論：他們“不自由”，“被束縛”，“个性未解放”；因此他們举起“个性解放”的旗帜，并很快与右派头目会师，成为右派头目进攻党、进攻社会主义的急先鋒。

其次，在中国目前的大学青年中有很多人出身于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动搖于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由于它的經濟地位、社会地位的不穩固，使得他們习惯于自由散漫，并富于幻想和狂热。他們幻想现实中不存在的東西（如极端民主，绝对自由），并加以狂热的愛，狂热的追求。但当现实一旦違背了他們，他們狂热的愛就驟然冷却，然后又发展成为狂热的恨，变成瘋狂的反动。历史不是这样証明的嗎？他們曾經追隨过資產階級的革命，也曾經支持过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这次反右派斗争也是这样証明的。在这次斗争中，少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追隨資產階級反动派，他們聚集到資產階級“民主”、“个性解放”的旗帜下，充当了資產階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鋒。应当給他們指出：在今天中国，小資產階級不跟着

无产階級走，就跟着資产階級走；而跟着資产階級走就是反动的，前途是危险的。而只有跟着无产階級走才是革命的，才有它的光明前途。

除了以上的階級根源之外，对于某些青年学生来讲，当然也有認識上的原因。例如他們知識閱歷淺薄，思想方法主觀片面，社会經驗不够，而又极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目空一切，以至一旦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发动猖狂进攻时，特别是当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以青年的最关心者，以百分之百的馬列主义者的面貌出現时，他們就分不清是非了，認不清敌我了。正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右派分子曾經企图“利用青年学生的缺少社会經驗而在学生中找到同盟軍”。

但是必須指出，認識根源与階級根源有着密切联系，而且，認識根源往往受着階級根源的影响和制約。所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階級根源。这就說明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長期性。

結 束 語

綜上所述，可見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所举起的“个性解放”的旗帜，在今天的新中国是绝对反动的，这表现在，它否定中国人民几十年革命的胜利成果，无视数万万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取得了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取得了个性解放的光辉事实，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地重新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企图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还必须指出：这次提出的“个性解放”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思想领域中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性的

問題。資產階級右派頭目提出“個性解放”的口號只是一種手段，而真正的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個性解放”的口號服務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

他們利用“個性解放”的口號全面地攻擊了黨，攻擊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具體環節和許多政策、措施、運動，還攻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主義團結。例如他們認為，“個性未得解放”的根源在於“共產黨的專制集權”，認為“社會主義制度要消滅人的個性”，認為肅反運動“不講人道，摧殘人權”，甚至更加反動地認為目前“中華民族失去自尊心，失去獨立性，遺棄了祖國五千年來的悠久文化傳統”，而這主要是由於“他民族文化奴役的結果”。因此，他們的結論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要重新調整，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與反面的東西要重新估計、評論與探索……”我們從這些言論中嗅到一股強烈的反革命氣息，看到他們企圖全盤否定、推翻一切，造成社會主義秩序的混亂和人民的新的災難的野心，看到他們對現政權的瘋狂仇視。

由是觀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新中國，由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提出的“個性解放”的口號是徹底反動的，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它不僅具有反黨的和反社會主義的性質，而且還具有民族沙文主義、主觀唯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等等的反動性質。資產階級右派“武士”們從資產階級的历史博物館中竊取出這面“個性解放”的旗幟，但他們褪盡了這面旗幟上的革命的鮮艷色彩，而在人民反右派鬥爭的暴風驟雨中，這面破旧的旗幟又被撕裂成碎片。可悲的是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在這場戰鬥中失足成為他們的俘虜，甚至充當了打手。這對於這些青年來說不能

不認為是一个悲剧。但愿这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希望他們在今后能够自觉改造，重新回归社会主义的行列。广大的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和大多数知識青年却經受住了这次运动的考驗，在党的领导下，坚定而果敢地打退并粉碎了这次进攻，表现出他們对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的领导的千百倍勇气，他們將滿怀着胜利的信心，一往直前地走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脱稿

論独立思考

外交学院 1957 年本科毕业生集体創作

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利用了他們可能利用的一切障地和武器，企图一举推翻党的领导，把广大的中国人民拖回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右派分子的心目中，“独立思考”是誘騙知識分子特别是青年的一个“有效的法宝”。于是，他們便挂起了“独立思考”的幌子，来煽动人們对党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滿，动摇人們对党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信任。并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下，販賣修正主义，以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的目的。为了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我們必須彻底戳穿右派先生們所說的“独立思考”的本来面目，并給予他們以坚决的回击。

一

独立思考要求人們根据客观实际情况，通过自己的积极思維活动，去灵活地掌握正确的东西，批判不正确的东西，从

而加深对客观真理和客观事物的了解和認識；并且根据新的不同的情况，去正确地解决事物的矛盾，从而改造社会和世界，推动社会前进。

由此可见，独立思考是与教条主义及書呆子式的理解和处理問題的方法針鋒相对的。馬列主义的經典作家是一貫地重視和強調独立思考的意义。这是因为馬列主义是一門科学、一門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它要求人們能够根据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去正确地处理所遇到的具体問題，而不是做思想懶汉，生搬硬套和背誦馬列主义的詞句。这正如馬列主义的經典作家所一致強調指出的：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就曾指出：“……必須強調学习馬列主义理論的目的是为了使學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論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問題，而不是为了書本上各項原則的死記与背誦。”^①显然，馬列主义所了解的独立思考，是要求在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上，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辯証的方法，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及不同的時間、地点、条件去認識和处理問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創造性地运用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設事业，便是独立思考的最光輝的典范。

馬列主义的經典作家在提倡独立思考、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有力地回击了披着“独立思考”外衣的修正主义者。列宁和斯大林曾毫不留情地批駁了伯恩斯坦及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理論。

^① “整风文献”，解放社，一九五〇年三月訂正再版，第六一頁。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晚年的錯誤，其錯誤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在批判斯大林錯誤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帝国主义却乘机对共产主义运动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也企图否定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特别在波匈事件以后，动摇、怀疑的情绪有了新的滋长。于是，在世界上便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的思潮。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到我国。一部分青年特别是知识分子在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也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这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进攻，而不利子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此，我們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須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自从我們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后，由于鮮花及毒草的并存，就要求人們在齐放、爭鳴过程中提高鉴别能力，即要求人們以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进行独立思考，善于去辨别是非，以便在討論中，反对和剔除糟粕，接受和发揚精华，把馬列主义的理論、文化、科学、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因而，思想界就如同雨后春笋，独立思考也显得更为时髦。但就在“独立思考”这块招牌下，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却在販賣着另外一种貨色。

整风开始后，資产階級右派分子为了掩盖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更牢牢地抓住了“齐放”“爭鳴”“独立思考”等这些流行的名詞，大耍其兩面手段来混淆人們的視听，模糊人們的思想界限，企图引誘青年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一部分青年和知识分子，由于剝削階級家庭对他們的影响，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未得到認真的改造，沒有对党建立起

真正的思想感情，就容易发生动摇，以至在很多方面与资产阶级右派发生共鸣。也由于他们有狂妄自大、唯我独尊、任意否定一切的思想作风，加以修正主义思潮的侵袭，便自觉地陷入了右派的圈套。这些可怜虫们，就这样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却不独立地做了右派的工具和传声筒，发表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因而，我们就更有必要揭露右派分子“独立思考”的真实面目，看看他们贩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

二

第一，右派说，要“独立思考”就必须彻底“独立”而不受任何“限制及束缚”。由此，他们就推引出这样的结论：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就会妨碍“独立思考”，就会把青年培养成“阿斗”和“唯唯诺诺”的人。如华东纺织工业学院右派分子戴应如就说：“共产党过去吸收党员时，都要求无条件地信任马列主义，无条件地响应党的号召，在这样一个模子里，争论意见，尖锐批评，独立思考，实际上不大可能。”右派分子费孝通也很露骨地说：不能因为相信党的领导就丢掉了自己的主张。这就充分地表明，右派分子把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思想看成是与“独立思考”相对立的。在他们否定了马列主义思想及党的领导的情况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及“定息不是剥削”等等荒谬绝伦的怪论便蜂拥而出。在这些谬论里渗透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仇恨，妄想推翻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从此就深刻地暴露了右派分子并不是那么“超然”不受限制和束缚，他们只不过是在否定了马列主义思想以后，以资本主义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独立思考”而已。

“独立”的右派先生们！你们为什么不敢说明你们是在资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独立思考”呢？这不显然是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吗？当然，你们也难以说出口，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唯唯诺诺地就范于已被埋葬了半截的资本主义制度之膝下！正是你们，做了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任意摆布的“阿斗”！

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思想意识都是作为阶级的思想意识而存在的，想脱离开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去进行“独立思考”，这是一种超阶级的思想，这只能是骗人的鬼话。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不要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来进行独立思考，势必要以反马列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指导来进行“独立思考”。右派分子的真正用意也就在此。所以他们以马列主义思想限制、束缚“独立思考”为借口，向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思想展开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说：“马列主义只有那么几条，不值一学，还不如‘诗经’‘论语’有用。”企图否定马列主义，并以此来动摇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的信任；还妄图煽动共产党员们背离马列主义这一伟大的真理。因为右派和我们的一切敌人一样，他们也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由于得到了马列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中国革命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到推翻三大敌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列主义这一伟大的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结果。右派也了解，假如党失去了马列主义思想，那就不成共

为共产党了，社会主义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了。假如我們接受了不要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导的“独立思考”，就会失掉正确地鉴别问题的能力，就会讓资本主义思想任意泛滥。那样，我們就好象一条航行在大海中而失掉了罗盤的船，随时都可能有撞礁的危險，随时都可能遭到可怕的毁灭。不过我們要警告右派先生們！你們是妄想！你們真是象蚍蜉那样不自量力！馬列主义这棵百年的大树已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扎下深深的根，想撼掉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右派分子咒罵說：无条件的信仰馬列主义，就象一个模子一样，不可能“独立思考”。这只不过是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向馬列主义所做的惡毒的进攻而已。我們說，我們所提倡的独立思考，是必須以馬列主义作为指导原则的独立思考，而且只有在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才能进行真正的独立思考。因为馬列主义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只有在馬列主义的指导下，才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辯証的方法去認識和分析客观事物，才能使我們的認識更全面，更完整，从而才能使我們更正確地去認識真理，处理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才会有利于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由此也就說明，馬列主义和科学的独立思考不但不矛盾，而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右派說，要“独立思考”，就必須站在一种“純粹客观”的立場上，否則就会有“階級偏見”，就不能認識真理。由此，他們就推引出这样的結論：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进行独立思考就会是不“公正”的和不“客观”的。右派分子譚天榮就曾叫囂：“所謂‘階級分析’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談。”在大鳴大放期間，也有人公然提出“不能用立場来扣帽子，来压人。”他們

說，“強調立場會阻碍鳴放。”又公然提出階級分析法已經過時了，運用階級分析法不能掌握客觀規律。他們認為，“無產階級觀點和資產階級觀點都可以加以考慮，各有長短、精華。”總之，他們是讓人們拋掉無產階級的立場和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法，而站在所謂“客觀主義”的立場來“獨立思考”。下面就是他們站在“客觀主義”立場上“獨立思考”出來的兩個問題的結論。

例一，他們說，社會主義民主不如資產階級民主範圍廣，因為資產階級國家中還存在着無產階級政黨，而且可以參加競選，作為反對黨而存在。象英國還有海德公園。而我們國家既沒有反對黨，也沒有海德公園。

毛主席曾經有力地駁斥了這種謬論。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民主。所謂兩黨制只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勞動人民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沒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可享。共產黨的合法存在也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條件的。

那麼右派分子為什麼聲嘶力竭地咒罵和否定世界上最高類型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要求和宣揚已經腐朽了的、虛假的資產階級民主呢？這不是明顯的有一個立場問題嗎？

例二，他們說：“匈牙利事件是一個革命，‘蘇聯出兵不合乎國際法’。如果蘇聯出兵是按華沙條約和經匈政府的邀請，那麼將來東方一些國家，如東南亞國家中發生了人民革命，反動政府也按東南亞條約邀請美國出兵鎮壓時，我們在國際法上就沒有辦法了。匈牙利事件只有一次，而東方國家人民革命却是常有的。所以，蘇聯出兵從長遠利益來看是對共產主義運動不利的。”這顯然是與帝國主義的叫囂同出一轍。因

为，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把匈牙利事件称做革命，把苏联援助匈牙利人民的正义行为污蔑成干涉匈牙利内政、破坏国际法的行为。

人所共知，匈牙利事件是帝国主义勾结匈牙利内部的反动势力，利用了一部分受欺騙的群众而制造的反革命暴乱，目的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匈牙利复辟，并在社会主义阵营打开一个缺口，来直接威胁苏联和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准备挑起新的战争。苏联出兵匈牙利不仅挽救了匈牙利人民的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对世界和平事业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同时，苏军根据华沙条约及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邀请出兵匈牙利，也是完全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因为，华沙条约是一个和平的自卫性质的条约，它与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邀请苏联出兵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权利，这也是必须为国际法所尊重的。而帝国主义国家根据东南亚条约出兵镇压东方人民的革命运动，不仅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在国际法上也绝无立足之地。因为，东南亚条约是一个战争的、侵略性的，而且是奴役弱小国家的条约。其条款和精神是与联合国宪章以及现代国际法中的和平原则、主权原则等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事实既然如此，“客观主义”的先生们为什么拿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与东方人民的革命进行类比呢？为什么又把苏联根据华沙条约出兵匈牙利的正义合法行动与帝国主义根据东南亚条约出兵镇压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非法、侵略行动相提并论呢？这就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服务！这不是又存有一个立场问题吗？

“客观”的右派先生们！看来你们并不是那么“客观”。但

为什么你們又不敢說明你們是站在什么立場上呢？少奇同志說得好：“因为这样就揭破了他們的黑幕。”（“人的階級性”）所以，我們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先生們！你們站的絕不是一块空白的土地，而是滲透了一種階級的顏色，一種发了霉的暗淡无光的資產階級的顏色。

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中，一切的人們是做為階級的人而存在的。”（劉少奇：“人的階級性”）他們對待社會科學、社會現象絕不能離開一定的階級立場，這是由於人們的不同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同時，不同的階級對待客觀事物的態度也是不同的。那麼，那種“客觀主義”立場是處在一個什麼位置呢？譚天榮之流任憑怎樣詭辯也不可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想掩耳盜鈴地否定階級分析，那才是最大的自欺欺人之談。因此，不讓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用階級分析這架顯微鏡來觀察人們獨立思考出來的結論，那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我們還生活在階級社會里，階級分析法也就會過時，而且是認識問題的重要的工具。右派分子是以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會妨礙“獨立思考”的“客觀性”為借口，來否定無產階級立場，讓我們失去權衡人們一切言行的正確尺度。但他們卻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我們發動猖狂的進攻。

我們與右派分子相反，我們就是明確地主張一定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進行獨立思考，而且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才能進行真正的獨立思考。因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是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一致的，也是與社會發展進程完全一致的。這就決定了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觀察問題，不會象任何剝削階級那樣存有階級局限性，而是能夠真正客觀地去

認識問題，能够而且敢于正視真理。这就說明无产階級的党性是与科学性相一致的。所以說，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进行独立思考，得出來的結論才是符合事实的、最公正的結論，真正客觀的結論。

第三，右派說，要“独立思考”，就必须“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看来，这只不过是在同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的灵魂下，打着“独立思考”的幌子，巧扮出來的兩副不同的姿态而已。其最終目的都是要否定党的領導，否定无产階級專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党的一系列政策的正确性。

“百花学社”就曾公然宣布过：“除了公有制以外，其余一切都要怀疑。”

一般地說，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怀疑。馬克思就曾說过他最喜欢的口号是：“对于万物都怀疑。”但馬克思所說的对于万物怀疑，是和“百花学社”的“怀疑一切”的口号及任何怀疑主义者无絲毫相同之处的。馬克思主义是把怀疑当做一种探究真理的方法，它使我們不去籠統地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而是要根据客觀实践，經過反面的疑問和探討，使之更正确地認識和掌握客觀真理。特別在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資本主义制度生長、发展和开始衰亡的时代，这样馬克思所提出的“对于万物都怀疑”的口号就更加有意义。在实践的基礎上，通过怀疑和否定才能对一切客觀事物得出正确的結論，創造和发展馬克思主义理論。而在今天，馬克思主义的一切重要原理，如关于資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关于无产階級革命与无产階級專政是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都是为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經驗所証实

了的顛簸不破的真理，是任何情況也不可能把它改變了的。

在我國憲法上所固定下來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些都是中國人民百餘年來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因而，對於這些東西我們不應該產生任何懷疑。但我們需要正確地認識它，理解它，而不是懷疑它，更否定它。

懷疑主義者與我們相反，他們是無原則地、無根據地去懷疑和否定一切。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它不但無助於獨立思考，相反，只能混淆是非，引起混亂。“百花學社”公然提出“除了公有制以外，其餘一切都要懷疑。”實際上，他們的目的是要以懷疑來否定新社會的一切。至於說他們不懷疑公有制，則純屬一種欺人之談。他們想以這種辦法點綴一下他們那丑陋的面孔，但這却更加令人作嘔了。

右派分子也公開叫囂：“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與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與否定。”“一切都重新沐浴。”（北大“廣場”原發刊詞）

一般地說，馬克思主義並不反對否定。但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否定是和任意否定一切、和右派分子所高唱的“對一切都重新沐浴”有原則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是以客觀實踐為根據，對那些錯誤的和陳腐的東西加以否定，得出更正確、更適時的結論，再以之去指導實踐。因此，否定在這裡是一種尋求真理的方法。而右派分子所說的“否定一切”“重新沐浴”，是在其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支配下，企圖違背客觀發展規律，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的毒辣的手段，是企圖否定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販賣修正主義的陰謀伎倆。

由此可見，右派分子是無恥地盜用“獨立思考”的外衣，以

反科学的怀疑主义和否定一切的手段，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鄙勾当。請看：

(一)他們完全凭主观臆想，对任何事物都先从反面去怀疑，然后再进一步加以否定。有人說：难道中国共产党就真是那么正确嗎？难道党的每一項政策都是那么适时嗎？就是这样通过怀疑的幌子，最終达到否定党的领导的目的。

再如：右派分子污蔑肃反运动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歪曲中央所規定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人的控制数字为“肃反定額”，叫嚣肃反扩大化了，从而达到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績，煽动人民对党不滿的目的。

(二)右派分子还故意把个别的表面現象扩大为一般的、本質的現象，并加以怀疑否定。如：他們把实行党委制过程中个别部門的个别缺点和錯誤夸大为党委制本身的缺点和錯誤，因而大肆叫嚣党委制違反了馬列主义原則。这种叫嚣實質上是企图篡夺党在学校、企业、工厂中的领导地位。

(三)他們还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以从“发展观点”看問題为名，怀疑和否定一切。他們說：一切事物都在变化，过去是对的，現在可能是錯的；昨天是錯誤的，今天可能是正确的。要向前看，从明天来看今天，应从“进化”观点来看問題。于是，他們便打着明天的招牌，向所謂“保守力量”进攻。例如右派分子林希翎說：“社会主义是最新的、最高类型的社会，这个‘最’是形而上学的。將來会有更好的社会……”

我們知道，馬列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論，是建立在唯物主义观点和辯証法的基础上的。而右派分子只不过是披着“发展变化”的观点的外衣，站在反动的立場上，凭其主观的好惡，用詭辯来不顧客观实际地妄图对一切事物进行取舍。在“发

展的观点下进行独立思考”仅仅是一块招牌。林希翎之流的右派分子是从骨子里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他们才极力设法贬低社会主义制度，把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共产党独占领导”的“家天下”，描写成实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的社会。这样，他们就可指望诱骗别人去“向往明天”了；而他们所期待的明天就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

(四)他们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抄襲、偷运和传播帝国主义的反动观点，为敌人帮腔，来攻击我们的一切。例如当日本的反动政客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对日政策时，右派分子立即随声附合，一唱一和地骂我们的对日政策是错误的，说什么日本“在一九四八年要求发展重工业是可以考虑的，日本在一九五一年大搞武装也没有什么危险，连我们的中苏友好条约日本人都怕。我们对日本有工业、有几万武装都反对，那岂不是使日本人感到我们对日本不宽宏大量吗？”很明显，右派分子就是要我们“宽宏大量”地让美国大肆武装日本，抛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我们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面前束手无策。

(五)他们在“独立思考”就是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发自己的光”的借口下，贩卖修正主义的理论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论。

有人認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三个中心：苏联、中国和南斯拉夫。这种論調完全是違背历史的发展的。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苏联，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中心論”恰好是与帝国主义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相呼应。右派先生們到底是在为誰“独立思考”，这就很显明了。

綜上所述，使我們看到右派先生們無論是“怀疑”或“否

定”，其實質都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領導；而“怀疑”只是“否定”的幌子，“否定”却是“怀疑”的目的；最終是通过“怀疑”和“否定”来达到肯定資本主义。

三

从以上分析中，我們看到，右派分子妄图用“独立思考”这件时髦的外衣，来掩盖他們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腐朽的灵魂。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他們集中地攻击了我們党和国家所賴以进行各項工作的理論和思想基础——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了我們正确認識問題所应依据的最重要的前提——无产階級的立場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分析法。而他們却在反动思想的支配下，站在反动的立場上，用散布怀疑主义情緒、造謠、污蔑、歪曲事实以至販賣帝国主义的理論的方法，制造出很多荒謬的論調，以达到他們卑鄙的目的。假如我們用毛主席給我們的鉴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項政治标准給这些謬論做个鉴定的話，就会看出这些謬論是破坏全国人民团結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是反对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是反对共产党的領導的，也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結的。

从此看出，右派所提倡的“独立思考”，是有其极其反动的目的的，是与我們所要求的独立思考針鋒相对、背道而馳的。我們所說的“独立思考”，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辯証的方法而进行的独立思考；我們进行独立思考的目的是为了建設和发展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要进行真正的独立思考，就必须努力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辯証的方

法；就必須站在无产階級的立場上，加緊思想改造，拋棄一切非无产階級的思想意識；就必須積極地參加實際斗争，參加體力劳动，与工农相結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更多地去接触客觀事物，从而才能正確地去認識客觀事物，通过實踐去辨識真理和謬誤，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

只有當我們正確地理解了独立思考的真實意義的時候，才能徹底戳穿右派標榜“独立思考”的陰險面目。

附 录：

編者按：以上三篇論文除了批判下派附錄的右派言論外，還批判了外交學院及社會上其他右派分子的有關右派言論。

外交學院右派學生沈以光的反動言論(摘要)

一 关于个性和独立思考問題

整个社会是复杂的。生长在社会中人的特性也是各異的，不能強求一致。如果干涉过多，就会影响个性自由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來說，是不利的。在老牌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政府对人們管的較松、干涉較少，因而这些国家的人民获得了个性解放，要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充分发挥了才能，給資本主义国家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但是中国数千年来，在封建統治下，个性得不到发挥，使經濟落后。解放后，虽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已得到了解放，但由于缺乏民主傳統，思想統治还很严，若有人不聞政治，要按自己的喜好去发展个性，是不可能的。中学里，总是強調集体主义，一切強調集体活动，斤子大小，限制了个性

的发展。应尽量减少对个人的限制。因此建議：

(一)只要大框框，不要小框框，讓青年在大框框中本著自由发展、自然淘汰的办法，去发展各自的个性，使其潜力得到广泛的发挥。

(二)讓青年去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幻想，甚至对党的政策、方針也可以怀疑。使青年的“原始思想”得到充分发展。

这就使中国每个人的个性得到了解放，各人的特長得到了发挥；那么，中国的前途，將不可限量，統治全世界不成問題。

自从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周总理作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后，以上情况有了好轉。但是最近又强调学习政治，回到老路上去了。

二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中苏关系不平等，中国实际上处在殖民地地位。苏联專家渗透到我国各个部門，对我国的机密了如指掌（幸亏中苏友好，否則不堪設想）。总之，苏联把我国抓得太紧了。

反对学习苏联一面倒。一切都学习苏联，使人看了很不舒服，中国好象殖民地。

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綫，在中国建立“东方的南斯拉夫”。集中西之大成，搞个綜合式的民族共产主义国家。

中国埋头苦干十二年，各方面初具規模后，就可以松一口气，与苏联建立双方平等的新关系了。

外交学院右派学生馮圣傑的謬論(摘要)

我国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是反得太过火了。在对待日本問題上，体会不到中国的寬宏大量，如中苏条约就是针对日本的。

战后两大阵营的市場，主要是人为造成的。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如此密切，将来会造成貿易上的困难，如我国工业化了后，捷克的机器就銷不出去了。

党能领导科学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霍 虹

薛克昌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提出“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就是说，党没有文化，没有技术，不懂得科学。他荒唐地提出，党领导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由民盟领导。其目的是要攻击党对科学的领导，把科学拉向资本主义轨道，进而取消党对整个国家的领导。

一 科学要不要党来领导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阶级斗争都在尖锐地、复杂地进行着。在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党领导科学，使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资产阶级反动派要夺取对科学的领导权，要把科学拉向资本主义道路。臭名昭彰的民盟科学小组提出了“关于科学体制的意见书”，右派分子们（包括薛克昌）也都同声诽谤、诬蔑“党不能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科学不能规划”等等，想一笔抹煞八年来党领导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企图取消党在科学领域中的领导。但除了这一小撮与人民为敌的人之外，六亿多的人民作了正确的选择，宪法庄严地规定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同样，科学要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离开了党的领导，这一切都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1. 自然科学本身沒有階級性，但科学家是有階級性的。不同的階級掌握了科学，为不同的階級服务，也就是科学要为政治、經濟服务。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有組織、有計劃地使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人类謀福利。科学是由党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然社会主义这个机器只有领导全国政权的、能識別前进方向的共产党来领导，那么，作为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就可以不要党的领导嗎？讓民盟中的反动派来领导科学，这就是破坏了党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绝对的、統一的、不可分割的领导，就是断送六亿人民夢寐以求的社会主义。

2. 科学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迅速地发展，科学家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过去的科学家在沒有领导、沒有方向、沒有計劃的情况下，科学的道路是崎嶇的。科学家分散地摸索着干，有时是事倍功半，有时就半途而廢。但在党的领导下，不但有了明确的方向，制定了正确的方針政策，同时使科学家研究的題目与国家需要、个人專長相結合；使理論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結合。这就保证了科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的專長充分發揮。

由此可見，科学必須由党来领导。这就是我們的結論。

二 党能出色的领导科学

薛克昌說，党不能领导科学，因为党不懂得科学；我們說，党能领导，而且领导得非常出色。

1. 科学是有分工的，而科学越发达，分工就越精密。科学家只能專長于某一科学，还没有听说有万能的科学家（錢偉

長現在不是原形畢露了嗎?)，不但精通全部科學的人是不存在的，就是全通一門科學各個分支的科學家也是極少的。如果說只有精通所有科學的人才能領導科學，那麼，這不但否認了政治對科學的領導，也否認了統一領導的可能。所以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將來成為科學家的黨員將會越來越多。我們的黨既然已經學會了階級鬥爭，就能夠學會科學技術。只要我們踏踏實實、虛心誠懇地去學，就能攻克科學堡壘，逐步掌握技術，外行就可以變成內行。我們現在的科學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事實證明，發展社會主義科學事業，辦社會主義的大學，培養社會主義人才，只有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內行。

2. 天地間的學問只有兩門：一門是自然科學，一門是社會科學，也就是階級鬥爭和自然鬥爭的知識。這兩門科學的最高成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它是科學的普遍真理。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世界的武器，它不但改造客觀世界，也要改造主觀世界。以馬列主義所武裝起來的黨，不但領導人民取得了階級鬥爭的勝利，也能領導人民取得向自然鬥爭的勝利；也就是說，黨能領導革命，必能領導建設，並將在各個戰線上取得勝利(包括科學)。

黨以辯證唯物主義做為自己的世界觀。因此能正確地、如實地反映客觀規律，正確地指導科學前進；大多數黨員又能勤勤懇懇，克服困難，在鬥爭中學習，難道不能領導科學、成為內行嗎？我們完全有理由說，黨能夠領導科學。

黨能領導科學，事實也是最好的說明。

解放後，科學研究機構和隊伍空前擴大。近代技術傳入中國是在“五·四”前後，在舊中國才初步建立了科學研究機

構，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而解放后八年，我們就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等大批科学機構；全国各产业部門配合生产建設的需要，也逐步建立了科学技术研究機構。旧中国研究機構約10个左右，專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員約600余人。現在的研究機構有170多个，專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員以万計，仅中国科学院就有4700多人。

解放后还开辟了过去空白的科学領域，有原子科学、計算技术、电子計算机、半导体、自动化和遙远控制、物理学、空气动力学、抗生素等几十种之多。

解放后研究設備也是旧中国所不能比拟的，如物理研究所，自己裝制了第一座粒子加速器。苏联帮助建設的原子反应堆，其功率將成为亞洲最大的一个。

另外，如图書、仪器、經費等的增加，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大力支持，都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由于过去七、八年的巨大成就，为科学的发展、人力与物力、組織协调、思想認識等，都打下了穩固的基础。将来我国的科学，还会更突飞猛进地发展的。

三 党如何领导科学

党对科学的领导，并不意味着讓领导科学的党员做某一項具体的科学研究。不是象教授领导研究生那样直接从事科学研究。党并不強調对业务的直接领导，也并不否認党还不完全了解科学領域中的各分支的專題。党的领导一方面是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的领导，一方面是学术上的领导。

1. 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的领导。以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科学家，教育他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事实上，八年来

党通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号召科学工作者，自觉自愿地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摆脱资本主义教育的束缚，从而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消灭了过去科学界的宗派主义，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没有党的领导，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现在的科学家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党时刻考虑人民的利益，高瞻远瞩，掌握全面，所以唯有党才能指出国家所需要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党采取了广泛团结党内外新老科学家、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方针，依靠和通过他们来对科学、文教事业进行领导。这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也只有大公无私的共产党才能做到。

2. 党在学术上的领导：党在学术上的领导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科学界的自由争论和客观实践，来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发展科学。这难道也只有科学家才能领导吗？

无论右派分子怎样用各种荒唐的论调来诬蔑党不能领导科学事业，而事实上，科学事业必将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取得光辉的成就。而薛克昌所遭到的必将是象“铁臂当车”那样的下场。

高等学校必须由党来领导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張德华 孟怀仁 李睿明

自称集右派言论之大成的薛克昌，在狂叫什么高等学校要取消党委制，由民盟来搞。薛克昌的意思显然是说：民盟内行，要民盟领导，民盟上台；党外行，党不能领导，党要下台。也就是说，要取消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然后，高等学校就可

以在右派分子的把持之下，背離社會主義的方向，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表明了在我們高等學校里，已經開展了一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

高等學校中黨的領導問題實質上是 兩條道路的鬥爭問題

這個鬥爭在黨大，從建國以來一直不斷地在進行着。在教學改革以前，有一些深受歐美資本主義教育影響的教授，反對學校向農工開門，反對學習蘇聯，反對馬列主義思想。而今天，右派分子們所提出的黨委撤出學校，不正是說明這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還沒有平息嗎？這場鬥爭表明：在人民的高等學校里，還存在一小股十分頑固的資本主義勢力，這一小股反動勢力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教育綱領，極力排斥無產階級思想對學校的領導。這場鬥爭關係到人民的高等教育事業的存亡。如果右派分子得逞，就必然會把我們的高等學校從社會主義道路拉到資本主義的歧途上去。所以，為了保證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方向，為了能夠培養出更多更好的紅色專家，就必須加強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這是一項不可動搖的方針，任何企圖篡改和取消這個方針的叫囂，都是反動的。

黨完全有能力領導高等學校

在我們社會主義大學里，黨的領導是絕對不可動搖的，黨是有能力來領導的。因為我們的黨是由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她已經勝利地領導了我們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科學，為什麼這個黨就沒有能力來領導高等學校呢？

解放八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巨大成就，已經無可辯

駁地証明了党是能够领导高等学校的，而且领导的还很出色。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我們一共培养了高等学校毕业生二十八万三千人，相当于国民党統治时期1928—1947的二十年間毕业生的一倍半，其中工科毕业生相当于过去二十年的三倍。如以清华大学來說，解放后八年来，培养出的毕业生比过去10年的总和还要多。解放后，不仅是学生数目和学校数目增加了，还添設了許多新的专业，如远距离自动控制、工程物理、半导体和电子計算技术等。再拿我們学校來說，解放以后的成績也是非常巨大的。昆虫系一九五〇年四年級学生只有三个人，三年級学生只有两个人，这五个人都是在解放以前入学的；而在一九五〇年当年入学的一年級学生就有五十人。从学生的質量来看，解放以前，学生理論脱离实际，工科学生不下工厂，农科学生不下农村。我們学校过去就有不少农学系学生連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楚！解放以后的情况怎样呢，不但在教学上作了很多改革，而且为了坚持理論联系实际、科学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針，把数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提到应有的高度，使我們的毕业生在离开学校之后，不再茫然无措，而真正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上的实际問題。这一系列的事实，难道是說明我們党沒有能力领导高等学校嗎？不，完全相反，我們党是有能力领导高等学校的，我們党是领导高等学校的内行，不是外行！

薛克昌之流高叫共产党不能领导高等学校，以响应民盟中的右派分子如胡秉方所嚷的什么“教授治校”和陶大綱吵着要实行“民主办校”的謬論。現在，就讓我們来看看“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的實質吧！

揭穿“教授治校”和“民主办校”的陰謀

所謂“教授治校”，是“五四”運動以後，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的。當時是軍閥混戰時代。為了避免軍閥對學校內部工作的干涉，教授治校是必要的。可是，在社會主義的今天，教授治校早已成為一種過了時的東西，毫無必要。右派分子所以又把這個陳腐的字眼搬出來，是有了不可告人的野心，他們的目的是想在這個表面看來冠冕堂皇的字眼的掩護下，向黨和人民奪取三權。首先，他們要推翻黨所領導的人事工作，奪取用人權（陸近仁提出的聘任委員會，就是奪取用人權的最露骨的表现）。奪取用人權以後，他們就可以把黨和一切進步力量逐漸排擠掉；就可以擴張右派勢力，最後使整個學校的領導權都淪在右派的手里。第二，奪取財權。只要財權掌握在他們的手里，那麼他們就有可能打亂國家的財政計劃，要挾上級領導和在学校里施展威力。第三，奪取教權。有了教權，他們就可以公開地向學生散布唯心主義的毒素，使青年一代成為他們的俘虜，成為他們反黨反人民的活資本。同志們，右派分子們所提出來的“教授治校”的真面目就在這裡，就是要把黨趕出高等學校，要來扭轉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方向，使資本主義在高等學校復辟！

民盟中另外一些右派分子所叫喊的“民主办校”，當然也是得到薛克昌的贊助的！所謂“民主办校”，言外之意，是我們過去办校不民主。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說得對：“民主治校”在這裡是與所謂黨委制退出學校一起提出來的，好象在所謂黨委制的學校里沒有民主，如果這一理解不錯，那麼在北京大學，至少在我的職權範圍內，完全沒有感到這樣一個問題存

在。相反的，我倒覺得在學校的工作上，我們比過去任何時代都享有更多的民主，在學校的校務上，我們教授比過去任何時代有更多的權力去過問。這難道是我們辦校不民主嗎？不！完全相反，我們辦校一向是堅持群眾路線的原則，集中群眾的智慧，是十分民主的。所以，右派分子們所提出的“民主辦校”，完全是別有用心的，這一點，從陶大綱的所謂民主辦校的綱領里不難看出來。這個綱領規定：由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代表所組成的學術委員會，是學校中最高權力機關，享有學校的一切大權。而黨呢？是處在學術委員會領導之下，只不過是起些“模範”作用吧了。所以所謂“民主辦校”，實質上和“教授治校”一樣，企圖消滅我黨在高等學校中的領導，使資本主義在高等學校復辟！

我們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堅決和 右派分子鬥爭到底

同志們，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高等學校就是為這個國家培養紅色的幹部。如果右派分子陰謀得逞，那麼不難想象，我們的高等學校將是一種什麼樣的高等學校！這種高等學校培養出來的幹部，將是什麼樣的一種幹部！讓這種幹部分布到國家的各個崗位上去，我們的國家將變成什麼樣的國家！我們不難看出，右派分子的陰謀是十分惡毒的。同志們，讓我們緊緊地團結在黨的周圍，為保衛我們高等學校的社會主義方向，堅決和右派分子鬥爭到底！同時，在這裡，我們也要警告薛克昌之流：無論什麼人，只要他胆敢對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共產黨的領導權挑戰，那他就一定被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鐵拳打得粉碎。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並且將要繼續證明這一點！

駁薛克昌“馬列主义过时了”的謬論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 蔣有輝

我們清楚地知道，右派分子向我們发动猖狂的进攻是极为全面的，他們不仅在政治上、組織上反对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企图在思想上瓦解我們的社会主义陣地，讓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坏思想来齧蝕我們青年一代。我們必須給予他們有力的回击。

自称“集右派言論之大成”的薛克昌，对我們党的指导思想——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叫嚣：“社会主义完了。馬列主义这下子完全完了。”又荒謬的認為：“信仰什么是自己的自由……是否一定要改造思想和信仰馬列主义，是个問題。”对他这些謬論，我們必須給以严正的批駁：

馬列主义过时了嗎？

認為“馬列主义过时了”，實質上就是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規律的科学，关于被压迫和被剝削群众革命的科学，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的胜利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設的科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它是永远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

一、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們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的方針，領導着广大劳动人民經過長期艰苦斗争，

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黨領導全國人民勝利地實現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今天正在引導着我們在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上前進。共產黨之所以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黨，就在於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根本的指導思想的。我們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都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指導下進行的，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前途。

黨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科學發展繁榮的方針。毛主席告訴我們，從字面上看這個方針，是沒有階級性的，工人階級能利用它，其它階級也能利用它。所謂香花，毒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們認為是毒草的，薛克昌之流卻認為是香花。為什麼我們和右派分子之間會有這樣根本的分歧？毛主席的六項標準回答了這個問題。只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思想，才能培植出社會主義的香花。薛克昌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上，提出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其結果只會放出毒草，它終久要被人們鏟除的。

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它永遠不會過時。

首先從理論上來論證：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它是最科學的世界觀，它最真實地反映了客觀事物。客觀事物不斷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也就不斷地發展和豐富。

(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指導着我們的實踐，而實踐的發展又不

漸丰富和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

因此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創造性的科学，它永远不会过时；同样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战斗性的科学，它永远經得起考驗。所以，薛克昌認為“馬列主义过时了”，在理論上是沒有任何根据的。

其次从实践上来論証：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看：——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們說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其中有局部的、暫时的挫折、失敗。但是，就总的历史趋势看，它是在不断地壯大发展。

自从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是馬克思主义第一个划时代的胜利。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光輝地发展了馬克思主义。今天苏联正在迅速地向共产主义迈进。苏联近4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設經驗，丰富了馬克思主义的宝庫。

今天社会主义已經越出了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形成了强大的世界体系。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特别是我們祖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使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着我們打倒了三大敌人，完成了民主革命，并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国正在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迈进。在这个过程中，馬克思列宁主义又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鉄的事实。而薛克昌反映了沒落的反动階級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仇恨和妄想，睜着眼睛甘心做反动階級的殉葬人。但是我們要告訴薛克昌，不管你怎样叫嚣，社会主义事业必然会在全世

界取得胜利。

薛克昌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瘋狂的攻击，已經达到了昏庸无知的境界。就看看他提出的这些所謂“論点”吧！

薛克昌說馬克思沒有实践。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紀中叶，当时正是資本主义发展时期，馬克思、恩格斯从观察分析資本主义的經濟細胞——商品出发，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资本主义必定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他們生活在工业中心地，亲身参加和领导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創立了第一国际，开辟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嶄新的一頁。薛克昌却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什么实践”，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謊話？！

薛克昌又說政治經濟学过时了，不适用了。

政治經濟学是关于人們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經濟关系发展規律的科学，今天它不仅沒有过时而且有了光輝的发展。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国民經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規律、价值規律、按劳分配的規律、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規律，不是指导和正在指导着我們祖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嗎？由此可見，薛克昌的論調沒有任何根据，仅仅証明了自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无知。

薛克昌說“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不知道量子力学、相对論等概念。”“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很多地方过时了。”（这里順便提一下，他把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上的相对性原理与哲学上反动的相对論混淆在一起了。）薛克昌的这种論点其实并不新鮮。二十世紀初，修正主义者就曾企图用当时自然科学上的一些新成就來說明“辯証唯物主义过时了”，他們这种謊論早

已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这本书里被批駁得一无完肤了。今天薛克昌只不过是弄不明地又重彈起修正主义的老調而已。

辯証唯物主义告訴我們，世界的本質是物質的，物質是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意識是存在的反映，所以物質是可以認識的；我們應從物質的內在聯系和運動發展中去認識它。物質的發展是對立面的鬥爭與統一，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其中哪一條已經過時了？意識是存在的反映，隨着科學實踐的發展，人的認識更加完善，更接近於物質的本質。愛因斯坦的相對性原理和量子力學的建立，正好說明了人們對於“光”這樣一個物質，隨着科學與實踐的發展，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所以一切科學成果都一次又一次地証實了辯証唯物主义理論的正確性。

二十世紀科學正是客觀上符合了這些基本原理，才得以迅速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就。關於宇宙的認識，關於基本粒子的認識及原子能的利用，不正是說明了這個問題嗎？

今天，為了更迅速地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做為祖國未來幹部的我們，就必須自覺地掌握辯証唯物主义。因為它是普遍真理，只有依靠它，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自然，改造自然。

總之，不論從理論上或事實上，我們都有充分的依據說，馬克思列寧主義過去沒有過時，現在沒有過時，將來也不會過時；即使某些原理只適用於一定的歷史時期，那也只是說明了它的發展，而不是過時。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真理

薛克昌說：“信仰什麼是自己的自由……這是憲法規定

的。”

首先我們不得不提醒薛克昌，你的这种推論方法，在邏輯上犯了很大的錯誤。我們要嚴肅地指出：憲法上規定的是宗教信仰自由。你为什么故意把“宗教”兩字抹去，这难道不是对宪法的惡意歪曲嗎？

薛克昌把馬克思列宁主义与宗教等同起来，这是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惡意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是科学；而宗教是唯心主义，反科学的。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論。正如前面所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客观真理，因此不是信仰不信仰的問題，而是敢不敢承認和敢不敢相信这个客观真理的問題。薛克昌的論調，正說明他仇視馬克思列宁主义，害怕馬克思列宁主义。他說：“我見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就冒火。”这不正是說明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嗎？

關於修正主义

薛克昌不要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他要什么呢？他說：“我贊成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就是否認无产階級政党对工人运动的領導，否認階級斗争，否認无产階級專政。其实質就是要維護资本主义。我們知道早在1895年，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就喊过“馬克思主义过时了”，他偷偷地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可耻的篡改。但历史証明修正主义是反动的。近60多年的历史道路，不正是沿着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方向前进嗎！可是薛克昌今天却还在这里搖旗呐喊：“馬列主义过时了，我贊成修正主义！”

薛克昌不仅露骨地販賣修正主义，并且公开地反对党的

領導，說什麼要讓民盟來執政。他反對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要求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但是我們要正告薛克昌，你這種骯髒的貨色，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中國，是沒有什麼市場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它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它是我們戰鬥的武器，它不斷豐富，永遠發展！

毛主席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最正確、最革命的政治觀點，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指針。可是薛克昌死死地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披着已經發臭的修正主義的外衣，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瘋狂的攻擊，企圖貶低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建設社會主義和改造知識分子的偉大作用。象他這樣具有反動政治觀點的人，不正是根本失去了靈魂嗎？

革命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曾寫道：“他想要一屁股把太陽壓死，但他自己卻被燒成了灰！”薛克昌正是這樣。

駁薛克昌“中國沒有自由”的謬論

北京農業大學學生 甘天箴

薛克昌認為，目前我們國家沒有新聞言論及集會結社的自由。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而且是極其荒謬的。

他這樣宣傳是別有用心的。薛克昌認為，思想問題、唯心主義一提出來就受到批判，這就是沒有自由。

按照薛克昌的說法，就是只許我薛克昌用唯心主義攻擊唯物主義，不許你用唯物主義來批判唯心主義；也就等於說，

只許我打你，不許你打我，你打我就是獨裁。這難道是自由？

自由是有階級性的，是為階級利益服務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只有資本家享受，勞動人民享受的只是紙面上的自由。以舊中國來看，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那些帝國主義者有無限制地壓迫剝削人民的自由，有大肆迫害進步人士及善良人民的自由，有到處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自由，賣國的自由……而廣大人民只有受壓迫受剝削、受欺騙和受迫害的自由，過飢寒交迫、苟延殘喘的生活的自由。然而新中國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國家，所以我們的自由，只能給廣大人民群眾，對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企圖推翻我們政權、破壞我們人民民主專政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敵人，就沒有他們的自由。

我國人民有擺脫壓迫剝削的自由，有當家作主的自由，有真正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及宗教信仰的自由。這些自由還在逐漸擴大，不僅在憲法上得到了保障，而且還由國家供給物質上的便利來保證它的實現。

另外，自由總是和一定限制、一定條件連系在一起，沒有任何限制的“絕對自由”是不存在的。

右派分子所標榜的資產階級的自由，不要組織紀律，它只能渙散勞動人民的意志，而且也是虛假的自由。我國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而且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自由。

我國的新聞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自由

有一個美國學者翻閱了三十年的“紐約時報”合訂本，他統計了這個報刊所登關於蘇聯的消息，87%是全篇謊話或誹謗，只有13%的內容是生活中確實曾有過的事實，但也總都

是附有歪曲原意的注解。可見帝國主義的新聞只有造謠的自由。

他們對有利可圖的就不厭其煩地大肆宣傳，對不利的就來個新聞封鎖。象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就沒有一個資產階級報紙敢全文登載；人民日報關於匈牙利事件的文章，也不會出現在美國的報紙上……。這些現象從階級觀點上看，完全可以理解；資產階級報刊只不過是反動統治者欺騙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即使他們有自由，也只是自由地宣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自由地鼓吹戰爭、反對和平，大規模地報導欺詐、賄賂、自殺、謀殺、淫亂、搶劫等事件，其結果是引導社會道德走向糜爛腐朽和墮落。

可是在我們新中國，只要在鞏固、加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就有對各項問題進行確實討論的自由，有揭發我們工作中錯誤、缺點的自由，有報導工農勞動者及其幹部在勞動、工作、鬥爭中豐功偉績的自由。很多黨派團體也有他們自己的報紙刊物，八月一日民革的機關報“團結報”已經公開發行，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然而在舊中國誰要在報上喊社會主義，喊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反對人剝削人、人壓迫人，就有坐牢或者殺頭的危險。

可是現在對我們全體人民來說，我們有公開宣傳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自由，有反對封建主義的自由，有宣傳消滅階級、消滅壓迫、消滅剝削的自由，有宣傳反對殖民主義、主張民族解放的自由，有宣傳保衛和平、反對戰爭的自由。這些也就是廣大勞動人民和一切正直的愛好和平的人們所需要的自由。我們並不否認我們社會上還有某些錯誤和缺點，因而報上不

但要报导光明的一面，也要揭发缺点和錯誤，而且在實踐中，我們人民的报刊也是这样作的。

有些人認為我們報紙揭发缺点和錯誤較少，豈不知这正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觀的現實；又認為我們報紙很少刊載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反动言論，这也正是我們對群众負責的表現。

我們處理一切新聞必須有一個政治標準，凡是对社会主义有利的就发表，对毒害中国人民灵魂的新聞就剝奪。敌人造謠攻击，我們絕不能充当他們的义务宣傳員。

我們粉碎了敌人對我們的武裝侵略，也絕不能保留敌人對我們的精神侵略。我們打退了國內外反动派的武裝进攻，也絕不能容忍國內外敌人對我們的思想进攻。

我們有言論的自由

言論自由也是为我国广大人民所具有的。只要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論，就可以毫无顧慮地发表出来，可以大談而特談，自由地討論國內外的政治問題，国家的政策、法律問題以及机关团体的工作、工农业生产問題。就拿我們报刊上的讀者來信欄及国务院設的人民來訪接待室來說，就有很多人對我們国家机关及某些領導干部工作中的錯誤进行了揭发和批評，对一些不正确的方針和措施提出意見。广大人民的意見、愿望和批評可以經常在报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不仅人民可以直接这样做，还可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把意見和問題提交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來处理解决。这怎么能說沒有言論自由呢？

每个机关团体甚至小小的商店都設立意見簿或意見箱，來接納人民的意見，接受對他們的批評或表揚。我們國家對

不采纳人民群众意见的机关团体，也經常提出批評和指責。难道在国民党統治的旧中国，能見到这种事情嗎？

在整风过程中，有些人对党提出了极其尖銳的意见，但只與他們是善意的，我們的党就來迎，并且耐心傾听。我們党采取的态度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

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些糊涂思想我們也允許他充分发表，并允許他自己辯論，大家幫助他分析批判。这难道是没有言論自由嗎？

然而，国民党时期，誰能對那暗无天日的統治者哼一声呢？例如，聞一多、李公朴因为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而被杀，魯迅用杂文写文章，还不是因为当时沒有言論自由嗎？

資本主义国家他們的言論自由是不允許超出資產階級利益的范圍的。美国波士頓哈佛大学有一次举行了关于中国問題的辯論会。华侨日报編輯广明照先生談到一些新中国的情况，當場竟被監視起来。这算言論自由嗎？

薛克昌說：“解放以前学生鬧事，因为制度不严，可以天南地北地跑。”这究竟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解放前学生鬧事正是为了爭取民主，爭取自由，为了反飢餓，反迫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当时沒有自由，他們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到处流浪。今天在解放了的新中国，正在乱跑和說我們制度严的人，就是那些罪大惡極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穷凶极惡的逃亡惡霸地主之流。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一方針的提出，充分地体现了我國的自由。凡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即使是唯心論也同样可以发表，这样才有利于促进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使一些是非問題通过自由討論和实践得到解决。我們这样做的目

的无非是寻求真理。

薛克昌認為唯心主义一提出就要批判，不自由。我們要問，是不是只許發表一方面的意見，而不准發表另一方面的意見呢？難道只許發表唯心論而不准發表唯物論才是對的嗎？難道只許有放毒草的自由而不准有拔除毒草的自由嗎？右派分子不是對爭鳴理解得不夠，而是別有用心，是企圖借此向黨、向社會主義進行惡意的猖狂的進攻。

關於我們國家集會、結社的自由問題

凡不是企圖推翻和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任何一人，都有集會結社、宗教信仰的自由。對這種人，我們國家不但給以法律上的保護，並且在必要時還給以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大力的幫助。

我國的工人、青年、婦女，在工廠、宿舍、學校、機關、在農業大學，民盟在黨的幫助下，建立了支部，並由原有的六個人發展到39人。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我們對反動小集團，不管是拿槍的還是不拿槍的，都是堅決加以取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廣大人民的自由。

總之，憲法上規定的我國公民有出版、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是具體的，千真萬確的，而不是抽象的條文。

在我們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里，只有廣大的人民群眾的自由，對那些被人民唾棄的反動派，只有剝奪他們的自由；同時，對右派分子，包括薛克昌在內，也不容許他們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

薛克昌完全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上，為反革命分子及右派集團公開叫嚷自由，他要的是資產階級新聞的自由，他要

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自由，他要的是反动的集会結社的自由。这种自由，在过去、現在和將來，人民是永远不会給他們的。

附 录：

农业大学右派学生薛克昌的右派言論(摘要)

我是集右派言論之大成。

民盟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可以在文化、艺术、科学方面做領導工作。党應該把这部分权利(力)交給民盟，党只要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領導就行了。科学家人多不是共产党员，因此高等学校也應該不讓党员参加領導。

我赞成高等学校取消党委制，由民盟來搞。

信仰什么是自己的自由，可以自由选择，这是宪法上規定的。因此，是否一定要改造思想和信仰馬列主义，是个問題。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不应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我認为社会主义完了。馬列主义这下子完全完了。从目前現象看，馬克思列宁主义到了最后考驗的时期，成功失败都由此决定。政治經濟学已过时，特别是社会科学原理，当时馬克思、恩格斯没有什么实践，原理是否对，是个問題；政治經濟学的理論，只能作为一个遗产来接受，那时分析的是十九世紀中叶的情况，現在經濟发展了，是否适合是个問題。唯物論的根本原则是对的，但停留在存在决定意識这一点是不够的。現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发展很快，馬克思、恩格斯根本就不知道量子力学、相对論等概念，所以不能停留在以前的基础上；应在物理、化学成就方面来概括。哲学体系上不承認爱因斯坦的相对論。

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很多地方过时了，上面的东西都是根据一百多年前的自然科学成就写的。自然科学本身的概念有好多地方已过时，但有人还把根据它写的哲学当圣经读。

我赞成修正主义。

目前我国一切都强调党的领导与集中，没有新闻、结社、言论自由。如唯心主义一发表就要受到批判，思想上有问题一提出来也要受到批判。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不能空谈民主。解放前学生闹事，因为制度不严，还可以天南地北地跑，现在你跑到哪里去呢？

没有武器的反动小集团应该保留，不应取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透視馬云鳳的“杰作”

北京航空學院 劍 芒*

一 黨委制是現行的最好的制度， 我們的任務是要堅決地保衛它！

馬云鳳說：“現行的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正院長是黨員，實際上形成以黨代政。第二種，正院長是非黨員，實際上就是一長制。”

我們認為馬云鳳歪曲了事實。大家知道，我國各高等學校，不管是由黨員或非黨員擔任院長，都是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這個制度保證了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幾年來院系調整、教學改革的巨大成就，證明了黨對高等學校的領導絕不可少，也證明了黨委制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然而，馬云鳳却毫無根據地指責黨委制是“本質上以黨代政的手段”，並且主張在各處取消黨委制，實際上是對黨委制的惡毒的誣蔑。我們知道，“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制度”。在我們的各廠礦、企業、國家機關、學校等都實行這個制度。

針對着馬云鳳着重所提的學校問題，我們也就着重談談學校的黨委制。

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學院的重大問題，包括教學、行政工作在內，都要在黨委會上進行充分的討論，根據具

* 劍芒是在反右派鬥爭中，由北京航空學院學生組成的一個戰鬥隊的名稱。

体情况，依靠集体的經驗和智慧作出決定，然后由院的行政領導同志按照个人負責的原則，負責組織執行。至于日常行政事務和技术工作，則一概由院行政領導同志負責獨立處理。黨組織不僅不加以干涉，并且从各方面給以支持。緊急的問題需要当机立断、迅速处理的，也由院長負責处理，黨委給以支持。可見，实行黨委制不仅不是以黨代政，并且相反的，倒是能够正确地發揮黨的領導作用，能够把个人的經驗和智慧同集体的經驗和智慧結合起来，因而保證了学校領導者在決定重大問題的时候，不犯或少犯錯誤，或犯了錯誤也比較容易糾正。同时黨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能够把黨的決定变为群众自覺的行動，使院行政領導者的命令能比較順利地執行。

由此可見，黨委制是保證黨的領導的最好的制度。

馬云凤武斷地認為黨委制是“以黨代政的手段”，這純粹是對我們黨的惡毒的誣蔑和攻擊。我們黨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以黨代政”的制度。問題很明顯，所謂“以黨代政”就是黨代替了行政工作。這實際上是把黨的工作降低到行政工作的地位，這就使我們的黨不能起領導作用，也就等于沒有了黨。因而“以黨代政”是對我們革命事業有害的，是我們黨堅決反對的。因此我們黨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以黨代政”的制度。

馬云凤為什麼不睜開眼睛看看事實呢？我們要嚴正地告訴他，我們決不允許你誣蔑和攻擊我們的黨，我們要堅決保衛它！

二 馬云凤的“代用品”的實質

馬云凤是在這樣的幌子下提出取消黨委制，繼而又鼓吹

其代用品的“优越性”的：

他說，正院長最后有決定權。院長是黨員，又要服從黨委會的領導，其結果就是“黨說了算”，“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黨委會犯了錯誤，於是受害的不僅是黨內而且是全院”。而實行所謂“有黨代表參加的多數表決制”，如院委會議，則“因為這種機構代表全民（或局部地區的全體），因為全民包括了這個黨，而一個黨包括不了全民，所以全民總比一個政黨犯錯誤的可能性少。”並且他“排除了組織手段（引用者按：指黨委領導）的黑暗一面，再也不會把錯誤的或是群眾不願接受的东西施加在人民身上了。”

大家不難看出他這個“幌子”的實質，也能從這裡看出馬云鳳的手段之毒辣真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了。

馬云鳳自吹他的“代用品”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人民的權力機關——的性質是一樣的。然而馬云鳳忘記了一個事實，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存在，並沒有代替了黨中央，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存在的同時也還有地方各級黨組織存在。而馬云鳳的所謂代用品是指取消了黨委制而言的。這和人的性質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馬云鳳提出的院務會議，是由全院選舉產生的所謂“最高權力機關”。就是說，“正院長是黨員，如果黨委會不同意院務會議的決定，正院長仍要按照院務會議的指示去做。”

我們知道（馬云鳳也是應該知道的），黨內的紀律是每個黨員都必須服從黨的決議，並且要在自己的活動中努力貫徹黨的決議。然而馬云鳳卻要求正院長黨員同志違背黨的決議，不照着黨的決議去做。這實際上就是不要黨員擔任領導幹部，不要黨的基層組織（黨委）存在。而這意味着什麼呢？

难道这样能实现馬云凤口口声声所說的党的思想、政治、政策領導嗎？沒有党的基層組織是无法实现和保証党的領導的。而宪法中就規定了共产党是我們国家的領導者，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違反宪法的。

学校如同国家的其它机关一样，应由国家任命其領導干部，也就是任命院長为国家办事，执行国家的方針、政策和决定；也如同国家的其它机关一样，学校也必須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具体的就体现在实行党委制。

我們还必須把馬云凤提倡的“代用品”的思想挖一挖。

馬云凤是把党的決議和人民的要求根本对立起来。这就是表現在他的害怕“万一”上。要知道，我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我們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絕沒有其它的利益，这就是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我們党“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有正确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有丰富的斗争經驗，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統一的意志和有紀律的行动。”（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我們党的政策、決議是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正因为这样，我們党的決議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的，并且很高兴而努力地去实现它。

馬云凤認为我們的党员在工作中貫徹党的決議是对人民的“强制”，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誣蔑。我們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党从来没有对人民实行过“强制”。对敌人是要实行强制的。沒有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强制就不会有巩固的人民民主專政。

馬云凤的“代用品”就是要求党员要服从“多数”，而不是服从党組織的領導。似乎他認为只要是人民群众的多数，就要

比党更英明些，就要比党犯錯誤的可能性要少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全民包括了這個党，而一个党包括不了全民，所以全民总比一个政党犯錯誤的可能性少。”这种思想的錯誤就在于他否定了党的先进性，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他总想企图把党和广大人民分开，从而使人民群众失去灵魂，失去战斗力。

我們知道，我国历史上有多少次的农民起义，而且参加起义的群众都是众多的。譬如太平天国就有百万大軍，真是声势浩大。但是太平天国革命最后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又譬如辛亥革命，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革命，经过艰苦斗争，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然而最后被袁世凱夺取了领导权，革命又失败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們說，这样多次的革命失败的共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沒有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只有当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取得胜利。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人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今天，人民仍然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容怀疑的。沒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沒有社会主义。这是人民最清楚的事实。人民知道沒有党的领导將意味着什么！因此人民爱护党甚至于超过自己的生命。然而，馬云凤却借着党“万一”犯錯誤而要取消党的领导。馬云凤企图把人民引向那里去呢？

我們党从来沒有說过，我們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犯錯誤。我們党内有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制度，正是說明了这个问题。但是我們的錯誤是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犯的，这与剝削阶级所犯的錯誤有本質上的不同。依靠党的正确的领导

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我們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是可以克服的。我們党的这次整风运动，不是正好說明了这个问题嗎？

馬云凤說，实行他的“代用品”就会比实行党的领导（党委制）犯錯誤的可能性少，我們說正好相反。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最正确的指导思想，取消了党的领导，也就是取消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犯錯誤的可能性必然大为增加。历史早就証明了这点。因此我們可以說馬云凤企图把人們引向犯更大、更多的錯誤！

我們今天要求人民是有組織有领导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要求人民遵守社会主义秩序，这就是所謂“集中”，这样做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为了促进生产的迅速增长，我們要充分地發揮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創造性，这就是民主。它是为了更好地建設社会主义。这和馬云凤要求的“民主”是根本不同的。

总的說来，馬云凤向我們提倡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是“极端民主”，是无政府主义，是要取消党的领导 and 核心作用，是要阻碍社会主义建設。

亲爱的同志們，可要警惕啊！千万別被他的所謂“民主、自由、平等”等好听的詞句所迷惑，別上他的当！我們要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明辨是非，起来和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絕不容許任何人攻击和破坏 我們的选举制度

北京航空学院学工 李如麟

馬云凤在他的文章里，用很大篇幅談选举問題。現在謹

我們来看看馬云凤在选举問題上耍的是什么花招。

馬云凤說：“在我国現行的选举法上規定，50万人以上的工业城市10万人选举一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其他城市和农村則80万人选一名代表。”由此，他就得出了結論說：我国公民选举权不平等，主要是工农之間选举权不平等。我們可要注意！在这儿，馬云凤又采用了他所慣用的打“迷惑”、放烟幕彈的手法：硬把选举代表人口比例的差別和公民选举权平等不平等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企图使得我們搞不清問題的实质。我們可不上他的当！

我們都知道，所謂公民有选举权，就是公民都有权选派自己認為滿意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并且都有被选举权。公民的选举权的平等性就表现在：所有男女公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而且每一个选民只有一个投票权。在我們国家里，公民的选举权是一律平等的，这是事实。这对我們來說不成問題。可是馬云凤却故意不看事实，硬要說工农选举权不平等。在小班批駁会上，我們問他：“你根据什么說工农选举权不平等？”馬云凤回答說：“根据就是工农选举人大代表人口比例不一样。”我們又問他：“工人和农民是不是都只有一个投票权？”馬云凤說：“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因为工农选举人大代表比例不一样，故农民的选票实际价值比工人低，农民的选票只等于工人的八分之一。”在这里，馬云凤是把工人、农民的选票看成資本家的股票，票面額都是一样，但是市場价格不一样，在城市是8票，在农村是一票。同志們！你們看是不是这么回事？馬云凤对待任何問題都舍不得放棄他的资产階級观点，用資本家慣用的計算股票的价格的办法来看我們的选票，这簡直是对我們的侮辱！咱們的农民兄弟可从来沒

有感觉到自己的选票只是工人的八分之一，从来沒感觉到选举权不平等。我国公民的选举权是一律平等的。这是由我們国家性質决定的。这是因为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工人階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因此我們的宪法才能有这样的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凡年滿 18 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才真正是选举权不平等。譬如，自称最“文明”的国家的美国，选举资格的限制就有五十多种。如美国的某些州規定有五百美元财产的人才能参加选举，这种“财产资格”的規定，直接限制了无产者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在美国还有所謂“識字资格”，規定选民應該会用英文讀宪法的每一条文；而美国的文盲就有一千万，只会签名的人又有一千万；仅仅由于这一资格的規定，就把兩千万合理的选举权利排斥在选举之外。就是由于种种资格限制，在美国就剝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利。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完全被壟断资本家所掌握，成为他們維持剝削統治的工具。

馬云凤硬要拿选举代表人口比例的差別来“証明”我們国家公民选举权不平等，結果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这是胡扯。在小班批駁会上，我們問他：“少数民族平均約兩万多人选一名人大代表，而工人是每十万人选一名代表，你說是不是少数民族和工人階級选举权不平等？还有，华侨和人民武裝部队选人大代表也不是按照和工人階級同样人口比例，你說是不是华侨、人民武裝部队和工人階級的选举权不平等，是不是他們的政治地位比工人階級高？”馬云凤回答說：“不是不平等，也

不是政治地位高。因为人大必須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和人民武裝部队代表。”馬云凤已經自己給自己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最后他不能自圓其說了，只得承認我国公民选举不仅是“實質上，形式上都平等”。

馬云凤还说：“按照选举法所規定的人口比例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能通过少数人强制多数人的決議。”我們問他：“根据何在？”他說：“假設人民代表大会有一項決議，有1/4代表不同意，有3/4代表同意，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決議还是能通过。如果这1/4代表恰好全是农民代表，农民在全国占大多数，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全国的大多数人不满意的決議，这就发生了少数人强制多数人。”馬云凤主張我們赶快取消选举代表中所存在的人口比例的差别。他說：“因为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是不應該强制的。”

馬云凤的这种假設根本不能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几次會議，通过了很多決議，其中有宪法，有第一个五年計划等。每次會議上的每个決議，都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都是有利于推进我們社会主义建設的。因此都是全体一致通过，从来沒有发生过不一致的情况，更沒有发生过强制农民的事情。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国是以工人階級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我們国家里，永远不可能发生强制农民階級的事情。馬云凤如此強調我們国家权力机关可能发生不一致，足以說明他是别有用心。并且从这里也明显地暴露出了他是拿资产階級的观点来看我們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因为照他看来，不一致就应无休止的吵架，象在资产階級国家的議會里一样。其实，規定选代表人口比例有差别的必要性、合理性，选举法草案說明上解釋得清清楚楚，馬云凤自己也看

过。那么馬云凤为什么又要要这一套呢？要这一套干什么？馬云凤表面上好象在替农民喊“冤”，說什么工人农民选举权不平等啦！工人强制农民啦！象是在替农民打抱不平。可是馬云凤，农民不会感謝你的，他們从你这些話里闻到了熏人的臭气！农民和工人的选举权本来就平等，可是你說不平等，这不是有意要挑撥工农的关系是什么？农村实行土改，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走向富裕和幸福生活的道路，这都是因为农民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从过去到现在，工人階級从来没有强制过农民，一切事情都是在农民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办的。因为工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是在将来，工人階級也不可能强制农民。馬云凤却硬要說工人强制农民，这不是阴谋使农民离开工人階級領導是什么？

馬云凤自己也知道，选举法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的人口比例不一样，正是反映着工人階級对于国家的領導作用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馬云凤嚷着要取消这种規定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把工人階級从国家領導的地位上拉下来。更可惡的是他打着替农民爭取“平等”的招牌来干这个卑鄙的勾当。馬云凤还企图欺騙农民，說什么农民即使不要工人階級領導也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这种謊話是騙不了人的。农民兄弟他們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痛苦，他們还没有忘記在反动統治下的貧困破产的悲痛生活。他們知道，如果离开了工人階級領導，资产階級就会掌握領導权，农民就得走资本主义道路，永远摆脱不了剝削和貧困。因此离开工人階級領導，这絕不是农民的利益，而是资产階級的利益。馬云凤是代表哪个階級利益說話，这問題就很明显了。馬云凤不仅代表着资产階級的利益說話，而且还为资产階級爭奪領導权，

創造了一套荒謬的理論。這就是馬云鳳偽善面孔底下的反動本質。如果馬云鳳你還要干這種卑鄙的勾當，農民對你就不只是講道理的問題了，農民會拿起鋤頭對你實行專政！這是上一次批判會上農民代表對你的警告！

馬云鳳還說我們的人民代表產生過程不民主，代表是領導“授意”產生的。他特別指出領導是指的黨委，所謂“授意”就是候選人是領導指定的，選舉時大家就得投這些人的票。應該說，這回馬云鳳干得不高明，對我們的誣蔑未免太露骨了。過去兩次選舉我們大伙兒都曾參加過，都知道也都記得是怎樣選舉的。就拿我們航院最近的一次選舉來說！本來只選三名代表，可是一開始就由各基層單位提出了一百六十多名候選人，由各方面的人士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我們提出的意見進行了研究、協商，提出了初步的候選人名單，再發到基層單位討論，最後才根據大多數選民的意見，提出正式候選人的名單，並把這些候選人的情況向大家作了介紹。恐怕大家還記得，三位候選人的介紹就掛在東飯廳前邊。事實證明，經過這樣走群眾路線提出的候選人是大多數的選民所滿意的，是真正可靠的。就是在咱們投票時，也不是非投這幾個候選人的票不可，自己可以自由選擇認為滿意的人。可見我們國家的這種選舉過程是真正民主的。

總起來說，我國公民的選舉權是普遍的、平等的，我們的選舉制度是具有充分的民主性的，充分地體現了我們的國家政權是屬於人民的。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誠然，我們的選舉制度比起蘇聯現行的選舉制度來說，是不夠完備的。大家知道，蘇聯各個時期的選舉制度向來是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制度，特別是在一

九三六年斯大林憲法頒布以後，蘇聯完善地實行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且不記名的選舉制度。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選舉制度。隨着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採用蘇聯那樣的更為完備的選舉制度。”（鄧小平：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草案的說明。）但是，我們規定的這個選舉制度，是適合于我們國家當前的情況的，它能大大增強各級人民政府的工作效能；它能進一步加強人民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聯繫，并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更加完備；它能更加增強全國的團結，并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獲得更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這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的選舉制度所不能夠比擬的。因此，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攻擊和破壞我們的選舉制度。

馬云鳳雖然是打着替農民打抱不平的招牌，但還是掩蓋不了他的反動本質。顯然他是全面地攻擊了我們的選舉制度，而且是那樣惡毒的攻擊！他的卑鄙的目的是很明顯的：就是要破壞我們的工農聯盟，拉下工人階級的領導，反掉人民民主專政；他在攻擊我們的選舉制度之同時，販賣了他的資本主義的私貨，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

馬云鳳對人事檔案的看法 實質是挑撥黨羣關係

北京航空學院學生 劉金鑽

馬云鳳在“組織手段過時了”這篇文章中談到，“行政部門的人事機構不要特殊化、黨化、神秘化。應該和其他行政機構完全一樣。人事檔案和公安檔案不應該混在一起。公民有權

隨時看本人的人事檔案。”

根據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第二條規定，檔案是屬於機密範圍，而機密就是法律。憲法第一百條也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國家之所以這樣規定，我的體會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世界上還有帝國主義存在，蔣介石還在台灣，階級鬥爭還沒有消滅，特務還無孔不入地鑽入我國各個角落。另一方面，人事部門有權利，而且應該保護檢舉人。就拿同志們來講，當你檢舉別人之後，你是否想讓別人知道你的名字；當對方知道了是你檢舉之後，其後果大家會可想而知的。人事部門對保護檢舉人員有重大責任。

既然馬云鳳要看檔案，那我就問看了對誰有利？

在這裡我先肯定這一點，“人事檔案”對我們絕大多數的人說來是不怕看的。先要搞清楚檔案里包括些什麼東西。就我自己所知道的，里面有自傳、鑑定表、各種登記表、獎勵、處分、學習成績以及一些外來資料表。這些表格大都是自己填寫的。就拿鑑定表、獎勵、處分等表來談，也是經自己檢查、大家批評、小組通過的。在某些鑑定中，自己有不同意的意見還可以聲明；如果大家同意就修正，大家不同意則兩部分意見都填進去，然後送人事部門裝進檔案。因此，“人事檔案”本來對我們是公開的東西。可是公開人事檔案一旦形成了普遍制度後，卻對歷史沒有搞清楚的人和極少數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多方便。例如在“三反”、“五反”、“肅反”中曾經有過歷史沒有搞清楚的人，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想知道組織上掌握了他多少材料。當他摸清了組織上的底子之後，他好和組織對抗，使原來很快能解決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這對我們來講當然也是不利

的。馬云凤会說：我之所以要分开，就是为了这个。可是，馬云凤你可知道人民日报曾登載这样一件事吧：上海有一个“女”特务，当組織上沒发现以前，仅从档案里看来是个單純的女人。可是后来群众来信說：“我們发现她腿上有毛，下顎上有一个小疙瘩，看起来好像是个男同志……”后来就根据这个线索查出“她”是蔣特派来的男扮女装的特务。如果馬云凤讓你做这工作，是不是你就根据腿上有毛或下顎上有一个小疙瘩就把群众的来信放到“公安档案”里头去呢？恐怕不那么簡單吧。万一你放在“人事档案”里，按照你給公民所設計的，公民有权随时看自己的人事档案，那就是說他可以随时发现群众来信；一旦他发觉，漏了网，那到底对誰有利！这例子也說明敌人是很狡猾的，往往不能一下子識破。也許馬云凤会这样講，凡是檢举的材料我們都把他放到“公安档案”里。那是絕对錯誤的，因为公安档案是对特务和坏分子的。要是拿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人民，这就叫敌我不分。

馬云凤所設計的人事档案制度，意味着“人事档案”可以自己保管，意味着人事部門沒有存在的必要，他也似乎在为一些思想不开朗的人着想。看来这是一场好事。不，我認为这不是好事，是对我們不利，对敌人有利。我們来看，他为什么会提出人事档案这事呢？这很明显，因为前些日子大字报上提到“人事档案应給本人看”这个問題，又加上有些同学对档案不了解，馬云凤認为利用这个好机会，可以爭取群众，挑撥群众对人事部門的不滿情緒，使群众对党不信任，对党怀疑。这还不講，更惡毒的是，他将公安档案和人事档案兩者混淆起来，使人們产生恐惧而緊張的心情，助長人們以为人事档案决定人們命运的想法。其实不然。（下面再談此問題。）这就更

加說明他利用人事档案來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

人事档案是保衛社會主義的一個工具，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档案的作用可從其內容看出。档案刻劃我們每一個人的德才面貌，也是我們個人的歷史記載。為了使這種反映更真實，我們就不能隨便看。假使可以隨便看，這意味着可能隨便被塗改、撕掉。這種情況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可能有。例如，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間，復員軍人楊克超，塗去了復員軍人證明書上“獎勵和處分”一欄，撕掉了黨員組織關係介紹信上接轉單位名稱部分，企圖進行詐騙活動；要不是中央組織部及時收回這個證明，則將發生和大政治騙子李萬銘到處冒充人民功臣、志願軍英雄等類似的案件。這對國家和人民來說，該是多大損失啊！這就是人事档案和個人打交道的漏子。

最後我要強調：要相信自己，相信黨。前面說過，人事制度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本來就把档案看成為國家的財富。作人事档案工作的幹部，都是非常忠實於黨、忠實於人民的最好的幹部。象鑑定表之類的東西，是學習小組填上意見之後直接送到人事部門並經過人事部門充分查證的。根本不允許哪個領導人給任何人隨便下定論並將這種定論裝入档案袋。馬云鳳竟然對國家人事档案制度進行攻擊，大家想想他的用意何在？況且在分配工作時，決不會完全決定於你的档案，還要根據國家需要，結合本人的志願。

至於外面來的檢舉材料，組織上也決不馬上給你下結論。档案，是要經過反復調查最後得出結論的。

總之，我們相信黨不會搞錯。在這裡我有一個體會，那就是我和大家一樣，在這好多年中，我從來沒有感到档案對我是一個壓力，而且也從沒有要求領導上給我看自己的档案。中

固有句成語：“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

當然我們的人事制度還是有缺點的，我們應堅決克服這些缺點。做人事工作的同志也應該把人事工作做得更好。我們提意見是為了改進工作，而馬云鳳是想利用一部分人對人事檔案工作的不了解，來掀起他們的不滿情緒，借以達到他反對黨的領導的目的。不能將他與其他對人事檔案工作有意見的人混為一談。

附 錄

組織手段過時了(摘要)

馬云鳳•

工人階級對全民的思想領導、政治領導、政策領導應該堅持到階級消滅為止；而用組織手段進行領導，現在過時了，應該立即停止。

我所說的組織手段指下面四個內容：

第一，本質上以黨代政的各種手段。如工廠、學校的黨委負責制，以及許多黨的地方組織直接領導農業生產等等。用這些方法進行領導的結果，就是黨說了算。雖然黨沒有禁止別人提意見，但是只要黨沒有改變主意，不管對的錯的一切仍按原樣進行。如學校中的黨委負責制，雖然存在着基本上代表着教職工的校務會議，但它只是個諮詢機構，院長有最後決定權，而院長個人又要服從黨委會，這樣人們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黨委會犯錯誤，於是受害的不僅是黨內而且是全院。黨委的級別愈高，權限愈廣，這種危害就愈大。

第二，公民的選舉權不平等。如50萬人以上的工業城市的人民，10萬人選舉一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而其它城市和農村則80萬人選一名代表。其它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雖無明文規定，也有類似的情

• 右派分子馬云鳳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

况。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就可能通过，虽然大会上是多数同意，而实际上是少数人同意的決議，也就是說在國內人民之間有发生少数人强制多数人办某种事情的可能。

第三，任命行政單位的領導者时，常常是一定要有几名黨員而不是以才德作根本条件。这样在才德不够的黨員領導機構中，就可能办出錯事来。比如安插德有余才不足的黨員領導者很多，決定有关科学技术問題时他們不仅很难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且采納別人的方案时不敢輕易接收一个而常常是各个方案的折中方案，这样工作盲目性很大，这样造成的損失，小的几十元而大的能几百几千元的也有。不是黨員而才德兼備的人也会犯同样的錯誤，但是可能性就少多了。

第四，政府、学校、工厂等的人事部門有变成党的旁設機構的傾向，人事档案神秘化，这样作就难怪羣众不敢說話了，对离自己远的上級敢提意見，对頂头上司则不敢提，学校中毕业班同学說話比低年级顧慮多。因为今天人人都有兩個影子，一个是太阳照的，再有一个就是人事材料，它不仅跟着你而且很大程度上決定你的命运，不准看本人的人事材料是不合理的。

綜上所述，不难看出，工人階級及其政党的各种組織手段，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就是：不管对的錯的，只要是党的決定就能够加載到人民的身上。所以党和人民之間就会发生一种强制性的可能。在工人階級革命胜利的初期，对人民的强制因素或有强制的可能性存在是必要的，而在敌我矛盾轉变成人民內部矛盾的今天，工人階級解决內部矛盾时唯一的办法是說服教育，不应该有任何强制因素。如果說民主集中制本身就具有强制的成份，那也应该发生在国家和人民之間（上下級、多少数、遵守法律等），而不应该发生在工人階級或政党和人民之間，因为我們睜开眼睛看事实的人都会承認，工人階級政党是先进的，同时也是会犯錯誤的。联共党犯过錯誤，中国党过去也犯过錯誤，誰又能保証我們党从今以后連犯錯誤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呢？危險的是工人階級及其政党犯錯誤时，自己并不認為是錯誤。因而組織手段可能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保証好事貫徹到底，同時也保証了坏事貫徹到底。我

看这是組織手段的兩面性。有人說犯錯誤主要是主觀主義，因而今後主要是加強學習提高思想。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必須同時指出，過去許多錯誤的東西，儘管有許多人反對（如前面說過的保定地委一例），甚至普遍的不同意，為什麼還能貫徹下去了呢？這不能不歸罪於組織手段。它保證好事的順利完成是主要的，但保證不事完成的黑暗的一面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不得不讓我們去思考一種代用品，它既能讓好事貫徹到底，又避免組織手段黑暗的一面。我下面的意見就是由此出發提出的，是否正確，望請諸君指正。

第一，黨委負責制改成有黨代表參加的多數表決制。在任何一種權力機構中（如學校的領導機構）必須有黨的代表。他和其他成員有平等的權力。如果這種權力機構是選舉產生的，當選的人員中如果沒有黨員，則黨有權派一名或數名代表參加這機構。但是只有發言權無表決權。這樣黨的宣傳、解釋教育工作都可以進行，從而在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對全民的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的保證。同時它排除了組織手段的黑暗一面，再也不會把錯誤的或是羣眾不願接受的東西施加在人民身上了。

有人會說：“既然黨犯錯誤，你能保證採用這種制度的權力機構就不會犯錯誤嗎？”我只是提醒這些人注意一點，這種機構代表全民（或局部地區的全體），因為全民包括了這個黨，而一個黨包括不了全民，所以全民总比一個政黨犯錯誤的可能性少。

第二，改善選舉制度。除少數民族以外選舉權一律平等，用競選的辦法產生代表，政府和人民代表、代表和人民之間建立定期的公開的質詢制度。

第三，任命某單位領導者時不要以是否安插上一個黨員或安插上一個羣眾為原則，唯一的原則是：德才兼備。（領導者並不是權力機構，所以和第一條不矛盾。）

第四，行政部門的人事機構不要特殊化、黨化、神秘化，應該和其他行政機構完全一樣。人事檔案和公安檔案不應該混在一起。公民有權隨時看本人的人事檔案。

駁 S. C

清华大学教师 清林 昌謙 藩生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沒落階級，总喜欢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还扮演一个荒唐的小丑角色，表演一出丑剧。右派分子 S. C (鍾杰英) 就是趁着党整风的时期，匆忙披上一件“記史官”的胄甲，一手拿着“超階級人道主义”的盾牌，一手提着“为历史辯护”的長枪，腰里还系了数支毒箭，向党杀將过来。象唐·吉訶德攻打风磨似地刺了几枪，放出几支帶毒的冷箭。真好象能一手遮尽事实、独力扭轉乾坤似的，硬要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搞垮党和社会主义誓不罢休。可是真理的阳光，照穿了 S. C 腐朽的反动本質。讓我們用事实与真理，剝开 S. C 騙人的外衣，看看里面到底藏的是些什么污穢吧。

一 所謂“人道主义”

“人道”这两个字确实給人們以“慈善”“仁爱”等愉快的感觉。但是，在階級社会里可从来也沒有过脱离階級的“純粹的”人道主义。資產階級就怕說穿了这一点，他們自欺欺人地宣揚什么超階級的人道主义，象今天 S. C 所标榜的一样，那只是为了欺騙和迷惑广大人民，企图软化人民的反抗意志，使人民安于現狀，忍受剝削。

人道主义是具体的，一点也不抽象。它对不同的階級，有着迥然不同的內容。要同时“爱”两个敌对階級是不可能的，

“爱”人民同时又“爱”敌人也是不可想象的。不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就必然是反革命的人道主义。对敌人“人道”，必然对人民残酷。这在S.C身上不是已经充分地表明了嗎？S.C自己也不能否認，他并没有“超越”了阶级，不过碍难說穿罢了，这是有他难言的苦衷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所具有的生活权利，簡括地說，就是受剝削、受压迫。资产阶级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用严刑苛法血腥地鎮压人民的反抗。美帝国主义杀死了无辜的罗森堡夫妇；三K党兽性地迫害黑人；在朝鮮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及南朝鮮李承晚傀儡政府野蛮地对待战俘，甚至灭絕人性地用战俘进行細菌武器的試驗等等。这些駭人听闻的事实，都是众所周知、罄竹难书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的“人道主义”！讓S.C去倍加賞識吧。他們的“人道主义”只是为少数资产阶级預备的。那种“人道主义”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的无比残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穿了整齐美丽的衣冠，可是掩盖不了他們身上所沾滿的劳动人民的血迹。这不是人道主义，而是疯狂的兽性。

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是在解放全人类中解放自己的。他們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一体。他們有着对广大人民的最真实的人道主义。他們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天淵之別。无产阶级为了对广大人民人道，可以牺牲一切，而共产党在执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上；又是最坚定的。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儿子斗争地主父亲，在革命斗争中，妻子检举叛变的丈夫，对这些，资产阶级当然是反对的（这是自私自利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而无产阶级却主張这样做，也勇于这样做。因为这正是为了更多的人免受其害，为了更

多的人得到幸福！这才是最高尚的人道主义感情。我們的人道主义就是这样具备着分明的階級界綫的。

在解放战争中，我們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官兵不杀不打，自愿回家的还发给路费。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待社会上的罪犯进行劳动改造，教育他們重新做人；还取消了妓院，使旧社会的牺牲者，能各安正业。这些难道不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嗎？

人道主义有强烈的階級性，我們不能給敌人講任何人道。S.C 显然对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是毫无人道感情的，他标榜的“人道主义”的實質不就很明显了嗎？

二 共产党員的爱和恨

共产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队，共产党員不管出身于什么階級，他們都要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下决心把一切甚至生命无条件地貢獻給党和人民的事业。生活充滿了偉大的理想——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共产党員最愛人民也最愛生活。

S.C 惡毒地誣蔑說党員冷酷成性，不懂得愛和恨。如果站在他的立場，这是并不奇怪的。因为共产党員的爱和恨界綫最分明。我們愛的是人民，恨的是人民的敌人。对人民的事业有利的人和事，我們就愛；对人民的事业有害的，我們就无比地憤恨。今天的右派分子包括S.C，他們危害人民、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行就引起了工人階級及正直的人民的极大痛恨。S.C 难道还体会不到共产党、工人階級和劳动人民的恨嗎？誰說他們不懂得愛和恨呢？我們不会忘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殘酷”“橫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

話。人民和敌人的界綫，就是我們愛和恨的界綫。

共產黨員的愛是偉大的。為了人民的解放，無數共產黨員前仆後繼，同許多愛國者一起用自己的身體鋪不了前進的道路。在炮火彌天的戰場上，共產黨員衝鋒在前，撤退在後。董存瑞用身體支住炸藥，炸毀了敵人的碉堡，开辟了勝利的道路，解放了隆化城內受苦的人民。楊根思為了爭取勝利，架橋時奮不顧身，以自己的生命換取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些強烈地熱愛着人民的英雄舉不勝舉。在我們过着幸福生活的時候，總牢牢地紀念着他們。他們犧牲自己不正是由於對人民的愛和對敌人的恨嗎？在和平時期，在經濟建設的各個戰綫上，也涌現了不少的優秀的共產黨員。李順達帶領山區人民戰勝貧窮。王崇倫刻苦鑽研改進生產工具。趙桂蘭用身體抵住藥品爆炸，避免了工廠被炸壞的後果。在防汛中，不少共產黨員用身體堵住洪水的沖击，挽救了河堤的決口。所有這些，不都表明共產黨員是如何熱愛新社會、熱愛勞動人民和熱愛無數烈士的鮮血換來的今天嗎？

S.C 吃着勞動人民的飯，却把這些故意“忘”了。他竟然血口噴人，無理謾罵，肆意丑化共產黨員的形象。這就是“心房生在胃里”的“記史官”的“無情刀筆”嗎？居心叵測，非常明顯。

當然，個別黨員，特別是非工人階級出身的黨員，在聯繫群眾、關心群眾上，在對人民的無限熱愛上，也會是有缺點的。這種缺點是与黨性格格不入的，這也正是他們党性不純的表現。黨一再教育黨員，在革命實踐中，不斷洗刷自己身上的缺點。這次整風也是這個意思。但我們決不允許右派分子惡意地夸大缺點，以個別黨員的缺點概括成黨的缺點，製造什麼黨

性和人性的矛盾。他們企圖挖去千百万人心目中的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把黨描畫成一副猙獰的面貌。

三 法制——階級鬥爭的工具

S.C 又別有用心、危言聳聽地說什麼法制是彈性背心等，他用否認階級區別的手段把各種法制籠統地扣上了彈性背心的注解，並在這上面大玩而特玩其狡猾手腕，力圖給共產黨的功績罩上違犯法制的烟幕。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就這一問題來徹底揭穿 S.C 的謊言。

(一) 制度不同，法制不同

法制是有強烈的階級性的。法制是為了維護國內統治階級的利益，保持社會秩序和用以鎮壓敵對階級反抗的武器。

剝削階級的法制，例如封建社會的法制，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法制，對老百姓不講禮，對統治者不講法律。隋朝法律規定地主對自己的農民有隨意毆打的權利，打死農民只處徒刑一年。資產階級的法制也是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他們卻又愛吹噓他們的法律是為“大家”服務的，是超階級的。還說什麼“全民民主”“人身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騙人的鬼話。實際上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是統治階級，一無所有的工人是被統治階級。正因為如此，所以資產階級的法律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誰要敢於動搖這個基礎，就會遭到法律的無情鎮壓。1810年公布的法國刑法典中，危害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犯罪條文就有84條。只有資產階級剝削人的自由，沒有工农生存的自由，這就是資產階級吃人的法律的實質。

資產階級知道，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只有利於無產階

級，他們所要的只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自由、平等。但他們如果公開宣布了這一點，就會失去人們的“信任”。因此資產階級一方面要給廣大人民以自由平等，另一方面還要用自由平等的幌子來騙取人民的“信任”，借以維持其統治地位。這中間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他們便不得不任意修改，任意曲解，甚至干脆撕毀法律，為所欲為。這種法律倒真如 S. C 說的是一件彈性背心，隨着資產階級的意志和利益而伸縮自如。

如法國資產階級一取得政權後，立刻宣布工人組織工會為非法，提出增加工資和罷工為非法。資本主義國家可以任意宣布共產黨為非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國家更露骨地用法律來對勞動人民，進行法西斯統治。特別是美國，戰爭剛一結束便於 1946 年初公布了塔虎脫——哈特萊法案，這個法案公開地限制工人的工會活動，而且規定統治階級可以在任何時候以排除共產黨為借口來解散工會。1950 年美國又公布了一個“國內安全法案”（又名“麥卡倫法案”），根據這一法案，任何一個社會團體都可能被指控為“共產黨的行動組織”或“共產黨的外圍組織”而被追進行登記。解放前的中國又何嘗不是這樣。1931 年 1 月，當中國人民的革命勢力不但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削弱，反而日益壯大的時候，國民黨公布了進一步迫害中國革命勢力和中國人民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

資產階級除了明目張膽地公布這些法令外，還利用許許多多秘密的恐怖手段，這就完全無法可循了。如美國的聯邦調查局、三 K 黨……我國解放前的“中美合作所”、“中統”、“軍統”、上海的“飛行堡壘”等等，不都在人民中種下了血海深仇，

現在大家都記憶猶新嗎？

更重要的必需談談S.C所極不“熟習”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

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制是人民自己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保护广大人民的革命成果的。这样才实现了劳动人民的真正的自由平等。这种法制要取消剥削制度，要维护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在粉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构的同时，我们就粉碎了反动派的法制。1949年2月中共中央便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伪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同年9月29日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以此为基础先后制订了婚姻法、土改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

1954年9月诞生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确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我们的国家，劳动人民是主人。我们公开宣布给人民以民主，对敌人专政。我们公开宣布这点，鲜明地表示了我国法制的阶级性，我们根本不需要资产阶级那种“全民民主”的幌子。我们的政府是替人民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宪法上规定的就是人民革命的成果，人民的要求。所以广大人民把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们一点也不需要什么“弹性背心”。我们的宪法和人民之间没有任何矛盾。S.C故意把两种制度下的法制等量齐观，笼统地冠以“弹性背心”，这纯粹是恶毒的诬蔑。

(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法制在执行上应有所改变

我们的法制不需要也不存在S.C所说的什么“弹性”，

当法制訂出后，不論任何人都得毫无差別地遵守，并不因人而异。但在不同历史阶段，法制的具体内容可以經法律手續修改。因为法律是上层建筑，應該随时适应基础的要求，否則就失去了现实意义。譬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定息完全取消时，資本家的帽子摘掉了，那么，宪法中有关資本主义經濟的条文就应做适当修改，这是十分明显的。再則，国内主要矛盾改变，那么法制上的处理方法按具体情况也有所改变。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的。如建国初期反革命活动猖狂，故当时对反革命罪行处理較严。现在，政权比以前巩固了，大規模的群众性的階級斗争的时期过去了，那么对反革命罪行的处理适当从寬，这对人民是有利的。这些改变是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并不是为了某人或某个集团的私利。这些改变的最高准則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越修改越好，越受人民拥护。这和S.C所說的“彈性背心”毫无共同之处，絕不能混为一談。

而資產階級每当人民革命的形势进一步震撼他們的統治基础的时候，他們会毫无顧忌地改变法制內容，減少法制對他們的約束。这种改动違反了客观要求，增加了人民的反抗，从而更动搖了他們的統治。这种惡性循环，最后就促成他們政权的全部崩潰。

(三)关于目前法制尚不尽完善及个別人工作中違反法制的問題

在苏联革命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产階級的法律。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制訂了第一部劳动人民的宪法。我国建国以来不断地頒布了各种法制。但必須說明，建立新法制必須有一个过程，要經過一定的時間，因为法制要总结斗争的經

驗，總結人民的要求。在奪取政權的時候，我們以暴力摧毀了舊法制，但不可能立刻就有完整的新法制來代替它。而且在那個“大風暴”時期，全體人民起來和敵人作直接的鬥爭，如果過分強調法制，只能給革命帶來壞處。所以那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強調法制，而是用正確的政策和指示來指導群眾，這些政策就具有法律的性質。當時是人民積壓已久的情緒的暴發，群眾用革命手段，向反動派鬥爭；當時不這樣做，就不能發動群眾和教育群眾。譬如進行土地改革，如果不發動貧雇農鬥爭地主，而只依法把地主送進監牢，那麼群眾就受不到革命的洗禮，提不高覺悟，就容易產生命令主義和官僚作風，就不能取得反封建革命的偉大勝利。假如S.C認為我們這樣作是用“藍色的手段，達到紅色的目的”的話，那我們需要問一下，S.C是在替“誰”“說話”呢？替敵人呢，還是替人民？要知道“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酷。”S.C為什麼對我們打擊了敵人總認為太殘酷，而看不見敵人是怎樣殘酷地對待我們的？

在我們取得政權後，逐漸訂出了各項法律，各方面工作基本上是依法辦理的。不過在各種大運動中，有些工作人員不自覺地違犯了法制（不是嚴重的違法亂紀），這當然是不對的。不過，我們應該首先肯定這還是人民內部的問題，應該用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他們的這些小的錯誤多半是由於法制觀念不強和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而產生的，是缺乏無產階級組織性紀律性的表現；他們是為了工作，不是挾私怨誣陷好人。（如有這種情況是應依法辦理。）那麼，這些問題為什麼不用批評教育的方法解決，而一定要“起訴”“打官司”呢？何況這些情節一般說來也不能構成犯罪因素。

而資產階級違背法制是無法避免的，他們虛偽的法制和他們的統治往往有矛盾。他們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明知故犯地破壞法制。

我們的法制還是在不斷完善的，不斷地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無產階級是最有組織性、紀律性的，我們反對無政府主義。共產黨員更應該模範地遵守國家法令，這點在黨章中已有明文規定。我們的法律一訂出，就不容許任何人破壞它。

S.C 顛倒黑白、別有用心的無稽之談，已經暴露出他的真面目：我們可以从這種惡意的誣蔑後面，看出他進攻黨的卑劣的目的。

四 歷史前進的足跡

傷天害理、忘恩負義的S.C，又嘔尽心血，搜遍了反動詞匯，竟然說什麼“歷史以堅定的步伐前進，泥濘的路上留下黑腳印……”我們新中國的革命勝利，建設的輝煌成就，通過他仇恨的眼睛竟然變成了“黑腳印”。為了明辨是非，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走過的光榮的道路吧！

(一) 真理的道路，光輝的足跡

從解放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到今天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極不平常的歷史時期。改變了幾千年來的私有制度，這是不能和以前的改朝換代相提並論的。這種翻天覆地的革命，在十月革命前的任何歷史上，都是找不到的。

我們的歷史前進的動力，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領導下的全國人民。我們把暗無天日、人吃人、人剝削人的社會摧毀了，

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种气壮山河的丰功伟绩是不容抹煞的。

大家想一想，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什么世界。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土地，奴役着我们的父老兄弟，劫夺了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同志们，勇敢地牺牲了个人的幸福，有的甚至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向反动的恶势力展开英勇的战斗。三十多年来，革命先辈们走过了艰辛的道路。在革命战争受到挫折的年代里，他们没有灰心，掩埋了同志的尸首，擦净了身上的鲜血，又继续前进了。前仆后继、万水千山，党就是这样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些谁能忘得了呢？

S、G还想用“黑脚印”这种奇异的名词，来抹煞我们党和政府在解放后进行社会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想一口咬定我们，过去用了许多蓝色手段，留下了很多黑脚印、很多错误、很多罪行。我们不怕S、G的叫嚣，我们可以用事实粉碎他这种恶毒的攻击。

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打垮了封建制度，又把全国农民用合作化的形式组织起来，出现了一片丰产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1956年，即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遭受了几十年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有二亿三千万亩农田，七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受灾。但是我们胜利地经历了这个严重的考验，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

前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七年比一百年”的社论。在那篇社论里面，列举了许多数字：譬如解放前，我们只能每年生产几十万吨钢，现在，我们每年生产的钢已将近五百

万吨；我們自己已經能制造飞机、汽車、火車……等等。這都是在解放前所不能办到的事情。难道这不正好說明我們历史是在飞快地前进嗎？！

如果我們不健忘的話，讓我們回顧一下朝鮮战争爆发时候的形势吧：当时美帝国主义迷信他“万能作用”的现代武器，把战火燒到朝鮮，揚言鴨綠江不是中朝边界。在这个緊張的时刻，我們党領導全国人民，展开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与朝鮮人民一起，击败了当时鋼鐵产量超过我国一百倍的凶惡敌人——美帝国主义。当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人說“这是惹火燒身”。但是結果呢，鉄的事实証明我們党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領導，我們今天还能够和平建設嗎？否認党的領導，讓右派野心分子的阴谋得逞，就必然会給人們帶來灾难。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經驗的总结。党留給我們的足迹是光輝的、燦爛的。

S.C自称是“記史官”，如果真的是講客觀和真实的話，就應該在真理的面前低头。

(二)有錯誤，就必須糾正

S.C說我們对待反革命是“赦无杀”“不了了之”，攻击我們党犯了許多錯誤，留下了黑脚印，但是又不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因为为了前进更快，是顧不得这个的。

这是对我們党极大的誣蔑。

我們党和人民从来就是血肉关联的，我們从来不欺騙人民。我們对于工作中的錯誤是不姑息的，一有錯誤，就要承認，就要改正。只有这样，党才能取得人民最高的信任，百分之百的信任，才能从失敗和錯誤中吸取教訓，使我們前进的速

度更快。

只有資產階級的政黨，才不能承認和糾正自己的錯誤。因為他們是為少數剝削者的利益服務的。他們和人民有着根本對立的矛盾，他們只有用各種卑鄙的手段——欺騙、壓榨、武力、捐稅等，來強迫人民作奴隸。資產階級本身的存在，就是導致錯誤產生的必然性，他們要承認錯誤，就要放棄剝削、欺騙和強迫，這就等於否定他們自己。當然，他們是決不願意這樣做的。

在黨的日常生活中，在各種社會改革運動中，我們的工作人員是有可能發生錯誤的。這一方面是由於階級根源——舊社會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給人們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認識根源——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但是我們黨教育所有的幹部，要不斷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盡力避免錯誤；而且，一旦發現了錯誤，就立刻糾正。我們的黨是大公無私的，因而在任何時候也不隱瞞錯誤。

人所共知的劉青山、張子善是我們黨的老黨員，過去在革命的年代里，也有過許多貢獻；但進入城市之後，蛻化變質了。黨並沒有因為他們是老黨員而庇護他們，給予了他們以應有的懲罰。

毛主席說，一九四二年的整風，給我們帶來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今年我們黨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整風，正是為了提高全黨的思想水平。

我們要整風，要改正錯誤。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是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所獲得的偉大成就，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工作中的局部缺點也是完全可以改正的，因為象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等現象並不是工人階

級，共产党本身的产物，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遺留給我們的，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我們对这些并非任何留恋，我們要和这些作頑强不懈的斗争。

五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鉄証如山

对胡风十分多情的S.C.企图用时间冲淡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說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如果証据不足……时过境迁……无法判罪，因此不了了之……胡风是只用笔尖作战……并未藏有手枪……”为了揭露S.C.的惡意歪曲，我們只好往事重提，証明S.C.想为胡风解脫是不可能的。

(一) 一群“历史人物”

先看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这些人的履历史表，就知道他們是披着理論家、作家、批評家、小說家、詩人等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胡 风	曾在江西“剿共”軍中作政治工作； 与蔣介石的王芑生大特务共事（任蔣介石國防宣傳处干部）； 蔣帮之上宾（中統作家王蘭供文）； 与特务陈焯等有密切联系。
阿 璠	任蔣帮胡宗南“战于四川”少校軍事教官、軍統特务。
綠 原	中美合作所特务。
庄 涌	地主、反革命还乡团……
遂登泰	蔣帮特务……
.....

二十年来，胡风一直对革命有着刻骨的仇恨。胡风分子們的私房話中，惡毒地咒罵我們的党和革命的人們。从下列称呼对照表中可以看出，他們对党的仇恨真是不共戴天！

一般人称呼	胡风分子称呼	一般人称呼	胡风分子称呼
中共中央	“董事会”	党干部	“馬褂”“老派”
党	“膿”	革命作家	“蒼蠅”“蚊子” “蛆”
革命队伍	“枯黃的叶子” “腐爛”	革命青年作家	“螻蛄們”
解放軍	“匪軍”	国民党军队	“国軍”

但胡风及其党羽們耍兩面手法，“用微笑包涵着侮蔑和党握手言欢”；要“暗中磨我的劍，窺測方向”；使用“孙行者鑽进肚皮去的战术”，必要时用“橡皮包着鋼絲打囚徒的鞭子”“打悶棍”，甚至于用“集束手榴彈”。

S.C 企图把胡风問題，說成是文艺上的一时意見分歧，看来自然是枉費心机的。

(二) 活动猖狂

胡风干了哪些反革命勾当呢？

(1) 在政治上有反革命綱領：“五把刀子”“三十万言意見書”。要求取消党的領導，取消思想改造，改变为工农兵任务的文艺方針，分裂文艺界的統一战綫，破坏社会主义建設。

(2) 在行动上，有有組織地积极活动，“聯絡人”“爭取人”“建立据点”“开辟工作”“加强实力”，有“組織原則”，“組織原則是保証斗争的武器。”

(3) 有活动策略，这就是所謂“長期隱蔽，待时而起”；伪装进步，“送上入党申請書，应参加的文艺活动和社会活动都

積極參加……不推托不沉默，不對任何人發什麼牢騷……”；“不要在陣地未鞏固前就放槍”；“等待時機，借題發揮”；“打開缺口，進攻失利時，要在忍耐中求重生”，以便“卷土重來”。

（三）罪有應得

由上可知，有以反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反動綱領，有有組織、有策略的破壞社會主義的活動，這就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懲治反革命條例”第2條。S.C硬說共產黨不守憲法，豈非掩耳盜鈴？事實還是事實，不承認也得承認。

（四）時間掩蓋不了問題的本質

胡風反革命的本質是不會因時間而有所改變的。事實具在，不管怎樣“時過境遷”，也不管怎樣“歷經滄桑”，反革命還是反革命。我們和胡風之間是一場階級鬥爭，必須用階級觀點來看問題。至於究竟怎樣處理，是以人民的最高利益為準。這在本文第二題里已有詳述。對於胡風反革命，政府必將嚴正處理。

現在，我們不妨把S.C那些瘋狂的毒言和發昏的鑿語歸納起來，看看S.C到底干了些什麼：

（一）把共產黨硬說成和以往統治者沒有區別，以達到誣蔑黨的目的；

（二）把共產黨描繪成不擇手段、冤枉好人、比別的執政黨更凶惡的政黨，丑化黨的形象，挑撥黨群關係；

（三）誣蔑共產黨員為冷酷無情，不守法制，不懂“愛”和“善”的毫無人性的；

（四）把黨的工作和政綱，說成是“不願抹平”的“黑腳印”，誣蔑黨不願糾正錯誤，以否定革命成績，降低黨的威信。

显然，S.C 是有准备、有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妄想改变现有制度。他还说：“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来的生活。”既然他对党，对现制度如此仇恨，那么就可以知道什么是他要迎接的“生活”了。

右派分子S.C用恶毒的手段，向党猖狂进攻，以便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险目的。这就是结论。

(原载清华大学“旗”刊第五期)

附 录：

为历史辩护

清华大学助教S.C

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都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对付他的反对派——这是由历史本身所证明了的。

如果证据确凿，胡风是反革命，那无话可说，如果证据不够，法律学上不能构成胡风的罪过，那同样无话可说，我的理由如下：

一、胡风的组织发展到几百人，在社会动乱时期霸占文坛，控制了部分出版事业(如臧克家的诗集，要牛汉批准出版)，即使它是文艺流派，但已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绊脚石，野心昭然若揭。因此，执政党可以用暴力的办法拔除它，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甚至宪法)，历史上这种事例数见不鲜，然而崇拜法律的人，看不到这个社会规律，看不到党派及阶级斗争的超法律性。

二、作为统治阶级有它共同的和不同的性格，他的共同性格之一，就是在取得政权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消灭并镇压反对派，以期保自己的天下，正因为迅速而且残酷，所冤死鬼必不可免，如果懂得这一个规律，他们在九泉之下应该欣然瞑目，共产党比任何一个朝代的

統治者都要偉大，因此这个朝代的冤死鬼人数最少，而又是因了大多数人而死的，让人们看看迭更司 (Charles Dickens) 的双城记和雨果 (Victor Marie Hugo) 的九三年，再看看中国史书和西洋史就会摸到革命前程的特性，渾然醒悟，而不至怒发冲冠到帽子都要飞了。

三、政治生活是殘酷无情的，它往往用藍色的手段来达到紅色的目的，他排斥人道主义和人权……等使人糊涂到聳人听闻的說法，請問諸位，听到那位党员说过人道和人权这种話嗎？没有，因为执政党是不相信C.托尔泰主义中“爱”和“善”的意志，而只相信馬列主义的。

四、近年文艺界的改革，似乎是采取了某些胡风的主張（如表演制片小組，刊物独立……都却与胡风意見暗合），但是这是文艺界的自发要求，还是胡风的功劳，或者是故意說成是党的政策，却不甚了解，請提出你的論点。

限于篇幅，不能暢所欲言，請同志开辟論壇，进行辯論（我已看过胡风的材料和某些參考資料）。

5.30

再为历史辯护(摘要)

清华大学助教S.C

政治家、詩人和記史官

政治家对国家和政权負責，有他明确的判断力和正确的政策；詩人对人道和良心負責，用愛和恨来褒貶世事，詩人永远記得××在××××屠杀学生时的鮮血，但政治家为了少流更多的血，不得不請他当部長，而去鎮压罪过小得多的伪保甲長。

記史官負責，历史万岁！把一切都公正的刻在竹簡上，以墓碣、司馬遷为自己的傍证。

政治家——冷靜的头脑，聰明的運智。

詩人——激动的感情，良心和灵魂。

記史官——无情的刀笔，客观和事实。

这三种人对胡风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記史官的看法。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查遍胡风材料及意見書，并未找到他“藏有手枪”的话，他是用笔“且打滚，且作战”的，内心充满了痛恨和仇意，他可能是先天的反革命种子，但更大的可能是列宁說的——遇着他所心爱的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难以为情，便背叛了我们。换言之，是后天的反革命。（姑如此称之，但統称是“政敌”。）

这个結論的获得，我并不打算从胡风的材料下功夫来保卫形式邏輯。因为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从材料的意見書看，他們的确是：“先把自己变成老爷，再和老爷作战”，在政治和文艺理論上，以“打倒”为目的，所以在感情上、在效果上（注意“感情”和“效果”），胡风离开了革命的道路，另行組織一个集团来改变了它。回忆1954年由蓝翎、李希凡发动的和唯心主义的一場作战里，胡风趁机起事，掉轉矛头，所有的笔尖都对准党中央狂噴墨水。他的危害性在于使党中央，尤其是中宣部岌岌可危。胡风政敌的面目已經暴露，你看看那时应该用“和风细雨”还是“暴风骤雨”来对待他更好。

一帮人，有組織、有理論根据、有陣地，有头目，抱着开仗的决心——这是典型的政敌。在当时不逮捕他焉有何法？（这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而是历史提供的可整办法。）

我們今天看問題，需是“此时，此地，此事”，但昨天看問題是“彼时，彼地，彼事”。胡风如果在进攻时注意时间，在情緒上不是那种样子，他就不是政敌。但事实毕竟已铸成。那我們的結論就是：

胡风是政敌的典型犯和过去式。

历史在前进但留下了黑脚印

宁可流一百顆眼泪，不可失去六万万人的心。

政敌被捕之后，就称为政治犯，这种人在法律上有时很难把他們納

入情节里。当时过境遷，歷經桑滄之后，再去判他們的罪，有时很难下手。

因此，凶狠的執行者，过去用“杀无赦”了結，而善良的執政者，則用“赦无杀”来了結。一一也就是不了了之。共产党屬于后者。

历史踏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势必在泥濘的路上留下黑脚印。要回过头来抹平脚印就前进得更慢，要迅速前进就領不得这个。

胡风問題牽涉广，声势大，在人民心目中錄下了深深的印象，人民感到作得很对，如果現在发现当时处理胡风事件时确有不 符合法律約束之处（如私設公堂，私拆信件，文字解釋錯誤等等），我覺得不能反过来加罪于人民及其領導者，要那样做，人民伤心。領導者 元气受挫，得不偿失，有百弊而无百利。政治的天平最灵敏。何去何从，当然判若黑白。

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黑脚印，領導者是伤心的，但宁可掉一百顆眼泪，决不可失去六万万条心！

馬列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統一論者，如果在动机 与效果上是好的，他就那样做。

胡风事件如果将来公开具結，当然欢迎；如果将来不能滿足我們的好奇心，我們当然了解領導者的苦衷。

人权和法制是一件彈性背心。聰明的主妇給嬰兒做衣服還做得大些，以备他日后发育时合身；政治家比主妇更聰明，他請国家和政府穿一件彈性背心，人权和法制是彈性的，它妨碍國家的发育，它是件背心，使心活动自如。

政治家有了远大的理想，在人民政权下使人权逐漸完美，但在历史的每一瞬間，例外的外延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就是人权和法制都有彈性。

一个普通人侵犯了人权，非法审問另一个人，監視他的行动，剝夺他的自由（哪怕是暫时的），他就要受到法律制裁。但肃反 干部犯了同样錯誤时（何东昌說：“肃反的积极分子犯了錯誤”），显然政府不会判他們的罪，至多檢討，深刻檢討就行。反正，这个普通人和 肃反干部作为

“法人”(法律學專用名詞)是完全相等的,但作為“生活的人”則還有所不同。乍一看,這似乎是“只許官家放火,不許民間點燈”。但仔細想想,再想想就明白了:當階級鬥爭尖銳的一瞬時(你能否認切風事件及肅反當時不是階級鬥爭尖銳的一瞬間嗎?),人權和法制是一件彈性中心。

共產黨不是蓄意破壞人權,但是當時不如此,以後沒有辦法,所以彈性中心是客觀存在的。有人以詩人的姿態高呼“人權何在”?一方面抹煞了人權的法制,另一方面掉進了形式主義的陷阱。

事實沉默在時間里,真理的眼睛向前看,手段是目的的仆人,人的心房偏左胸。

俄國民主主義者赫爾岑說:“每一個時期都是嶄新的。他充滿着自己的希望,包含着自己的幸福和悲哀。”(見莫斯科藝術出版社1954年版“論藝術”)

這話的意思很明顯,時代是變化了,生活的前景在今天都比以往更幸福而光明,但寶重提往往令人神經過敏和委區區凡出悲劇有沒有必要呢?沒有!回憶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可以作為釋懷、作為教訓,他的價值連城,倘作為良心、作為怨恨,是戴着有色眼鏡的苦果子的感情。

過去某些事做錯了,是悲哀的事實,最好讓他沉默在時間里,而使真理的眼睛朝前看,迎接未來的生活。因此我同意,小鬼*關於“平反”的意見,但反對“反罪于幹部”的做法。因這種社會如今還為時尚早,小鬼和一些人出來指問人權和法制,這是民主的做法,但情緒過於激動。帶着詩人的心情和劍俠的憤怒,容易失去冷靜。毛主席說:“民主不是目的。”我們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當然只是目的的仆人。小鬼在水利館面前把民主抬得太高了,想要他回到舊時,過頑固的生活。所以只要民主,不要生活,是偏激的,民主不能給人吃飯,不能給人電影和話劇看,而知識分子却常常振臂呼喚這種民主,這是知識分子和工人的差異;這也就是學校整風特別激烈而外界比較太平的原因,君如不信,請三思之。

革命工农羣眾的心房,是偏在左胸的。他們對共產黨更多的信任,

更少的懷疑，知識分子意以為自己的心另長在胃甲，是不偏不倚正中央，說了許多正義的話，有些有節制，有些則是當情的副產品，我認為頭腦清醒，心肝长在左胸邊的人還更可貴，可惜自己做不到這點。少一點激情，多一點諒解——那更好。

• 小鬼是清華大學右派學生章德高的化名。